

长江产经智库学者 解读十九大报告系列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地址：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丙丁楼

网址：www.yangtze-idei.cn

邮箱：idei@nju.edu.cn

微信：长江产经智库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南京大学）

2019年6月

目 录

1. 张明之：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出发点——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体会，1-15.
2. 孙国民：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新要求，16-27.
3. 何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江苏担当与江苏行动，28-35.
4. 张小兰：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理解和认识——对十九大报告的解读，36-43.
5. 刘志彪：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框架、路径和方略，44-54.
6. 刘志彪：新常态经济学：实践特点、理论逻辑和政策体系，55-77.
7. 刘志彪：“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振兴中国制造业，78-93.
8. 刘志彪：均衡协调发展：新时代赶超战略的关键问题与政策取向，94-115.
9. 陈 柳：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116-125.



10. 张月友：建设现代化的服务经济体系，126-136.
11. 沈凯玲：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民生和就业的几个关键问题，137-144.
12. 王建国：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与创新型经济的培育，145-162.
13. 王宇、刘志彪：推动虚实平衡，强化实体经济发展，163-172.
14. 陈东：科学认识新时代“两个毫不动摇”特征及其要求，173-185.
15. 陈志龙：国家总体安全观视角下的金融安全，186-197.
16. 丁胡送、陈东：论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战略意识与策略，198-207.
17. 姜德波、彭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现代乡村，208-214.
18. 林学军：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意义和策略，215-220.
19. 查婷俊：实体经济振兴：以资本市场发展带动产业结构调整，221-230.
20. 凌永辉：发挥城市群带动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231-240.
21. 彭本红、黄倩倩：构建江淮生态经济区的系统治理体系，

- 241-249.
22. 苏晓东：推进绿色发展——新时期国家发展的绿色路径，
250-259.
23. 王修志：中国新发展与全球新机遇——以重构 GVC 助力经济全球化，260-267.
24. 巫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268-279.
25. 张光远：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280-287.
26. 张建华：以自贸区制度创新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288-293.
27. 张立冬：“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提出背景、现实意义与落实措施，294-301.
28. 宋文阁：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论，302-311.
29. 徐宁：建立养老个体信息标准化体系 牵住新时代中国养老的牛鼻子，312-319.
30. 马野青：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320-325.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Yangtze IDEI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Yangtze IDEI



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出发点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体会

张明之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进而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也不能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一新的论断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出发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下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标志着在党领导下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回望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工程，用重大突破、重大进展、成效显著等词汇都不足以完全描绘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伟大工程催生伟大斗争，伟大斗争铸就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所做出的科学判断，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1. 基本国情没有变，但现代化建设阶段转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报告从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民主法治建设等十个方面回顾了五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认为“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但依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生态环境保护不足、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等现实问题，从而决定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基本国情没有变，并不能否定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大踏步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着历史性变革，中国

的发展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得以充分发展，“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社会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历史性变革，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容、形式和特征发生了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建设现代化强国立足于更高的社会发展起点和社会阶段之上。

2. 发展中国家身份没有变，但国家意识转变为“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GDP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30%；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重大进展，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我国科技不断进步，装备生产日益完善，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服务业大国和贸易大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尽管



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但根据联合国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标准，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化进程、地区发展差异等角度来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身份和国际地位没有改变。

从鸦片战争屈辱地打开国门，到改革开放主动迎接全球化，再到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对自身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交往中的方位更加清晰。中国通过自身的艰苦奋斗，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不仅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了贡献，而且“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始终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

3. 社会主要矛盾变了，但“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没有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较之以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更加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

社会生活发展的实际。

一方面，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了经济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可以说，生产力水平实现了较大幅度的跃升，“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由以往的全面短缺转变为结构性过剩，社会生产早已彻底摆脱落后的面貌。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实践者，理应分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增强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不仅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社会治理、民主政治、生态环境、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日益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追求表现为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等特点，然而城乡、地区的收入分配差异导致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由此可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人民需求与社会供给这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可以从社会主要矛盾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形式



与内容等层面来分析与思考。我们正面临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更需要理性认识与科学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而也没有改变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

二、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引世人瞩目。这一历史性成就，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既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成果，在华夏文明史上前所未有；又表现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在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更表现为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是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之上，其叠加的复杂性、多变性、系统性、紧迫性、挑战性，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征程中亦属罕见。因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现实出发点，亦是历史长河中新的起点；而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及其形成的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正成为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逻辑起点。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创设新格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条件、平台、内涵和方式均出现了重大变化，赋予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时代特色。

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条件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获得充分发展，科技创新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丰富多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成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导向；并且，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格局。

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平台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当前建设现代化强国是在人均 GDP 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平台上推进的，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由总量问题转变为结构问题，即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在这一新的建设平台上，既要避免传统的不计资源环境代价的粗放发展模式，也要避免超越发展阶段的盲目发展模式，以发展方式的转变、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优化来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



创新驱动发展。

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内涵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现代化强国的内涵由注重经济总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拓展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意味着建设现代化强国是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

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方式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报告提出，“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分为两个时期和三个阶段，是充分考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挑战和机遇，高质量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现实路径。

2. 社会主要矛盾出现历史性变化为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注入新动能。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表述是十九大报告中令

人振奋的新论断。抓住主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历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建设与治理、社会发展与进步、党的领导与建设等各项事业面临诸多挑战。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只有集中力量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才能目标清晰、方略得当，以重难点问题的攻坚带动全面工作的展开。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指向。经过艰苦卓绝的伟大奋斗，中国人民在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之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人民群众追求的重要目标，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增强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获得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直接动力。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必须“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遵循平衡、充分、共享、普惠的发展目标，“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增进民生福祉”，“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源泉。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



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人民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主体和主要力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道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和各项社会事业，迸发创造活力，贡献智慧力量，赢得社会尊重，实现自我价值。

3. 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新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百年的梦想和宏伟目标。当前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但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做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需要有勇立潮头的气魄和高瞻远瞩的眼界。

国际局势更为复杂敏感，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报告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具体表现：世界经济尚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长期盘整期，全球投资贸易增长乏力，经济总体复苏缓慢；大国利益博弈更加激烈，地缘政治热点频发，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

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为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但“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初心不改。报告认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但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

三、以创新发展的思维看待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出发点

现代化强国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人的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帮助人民实现自我价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的机会。

1. 认识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用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方式来解决。可以说，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既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出发点，也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核心议题。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从如下若干方面着力。

(1)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强国。新的发展理念克服了单一的GDP标尺，有助于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完善创新政策体系和科技体制；注重产业结构、供求结构的协调可持续；注重低能耗经济运行和生态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2) 新的历史方位下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3）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在不同发展阶段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紧密结合起来，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认识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过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



语权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然而，在全球经济政治秩序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话语权和控制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规则、标准的议定与制定的空间还不足，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利地位，西方社会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1) 坚定不移推进现代化建设，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成就，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2)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牵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并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世界各国提供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

(3) 积极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框架中去考虑，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谋求发展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和而不同、兼收并

蓄的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4)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提供力所能及的国际公共产品。例如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中国在节能和减缓 CO₂ 排放方面已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显著成效，充分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及其新要求

孙国民

(南京大学博士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自 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并对今后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全局性、历史性新要求。

一、社会矛盾在发展中发生质量互变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属于供求关系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部转化。回顾建国后的历史，我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总体上是不断转变、不断深化的：1956 年中共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



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是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判断，基本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并因此干扰了国家正常的发展建设，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以博大的胸怀和巨大的勇气“坚持真理，修正谬误”，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正本清源”的立场，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改革开放新时代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撑。2017年中共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判断和表述，科学把握了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党和国家工作都要适应这一个主要矛盾的变化：

（一）目标任务有新变化。即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在



第一个“一百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给出了“两步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二）发展路径有新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时代需要深度地、更加全面地、更高水平地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全新发展理念。新时代的经济建设需要更好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则为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贯彻新发展理念，还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经济体系的发展质量。

（四）坚持全面的发展观。新时代的中国主要矛盾明确了主要任务是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促进全面发展。

（五）实施八大发展战略。坚定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军民融合等八大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而为实现“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持续发力。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发生根本性转变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部的矛盾转化，是更高发展水平上的矛盾关系，需求的内涵得到拓展、外延得到提升，表现为：

（一）需求是变化的、更高水平的。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提出来的，已然不同于过去三十年的需求状况，是更高水平的需求，反映出新时代中国消费需求换挡和升级，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着力推动的供求关系平衡将是更高水平的供求关系平衡。从具体需求表述来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明确了我国今后的“温饱”和“小康”需求出现新变化，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逐渐迈向新时代及现代化的美好生活需求，落实到国家战略上就是要实现第一阶段“基本现代化”和第二阶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需求是动态的、预期趋高的。“温饱”、“小康”和伴随新时代及现代化建设的“美好生活需要”，其标准具有时



代性，因此要用发展和动态的眼光去看待需求，特别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总体上是向前看的，是不断充实和提高的。从关键修饰词的表述上看，“日益增长的”指明了需求的动态性、延展性和提升性；“美好”指明了人民生活的向往，这是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解决的内需错配问题，还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

（三）需求是全面的、范围趋广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全方位的和有质量的，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更是从过去单一性、数量型物质文化需求扩展到多样化、高质量、内容丰富的美好生活需要，实际上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五位一体”的需要，涵盖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方面的发展诉求，是更加全面、更高水平的需要，这从根本上丰富了需求的内涵。

三、供给的不足体现在结构和水平两方面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从供给侧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发展的不平衡”指明了供给的结构性问题。表现

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建设还存在突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具体表现在产品、产业、区域、城乡、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不平衡，如东中西及东北地区、沿海与内地、陆地与海洋、内地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区域内部发展的各种不平衡，还包括发展中的先富、后富及贫困问题，因此区域发展不平衡本质上反映出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禀赋结构及制度供给差异，这些都需要我国逐渐由不均衡发展战略向均衡发展战略转变，全面优化区域供给结构，特别是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总抓手，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创新发展战略，逐步收敛区域差距、城乡差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发展的不充分”指明了供给水平不够高的问题。表现为无供给、低端供给、无效供给、短缺供给及错配供给等在不同区域以不同形式存在，今后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一方面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



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对于发展不充分的欠发达地区，要积极开展精准扶贫，做到真扶贫、扶真贫，切实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增长机制，最大限度减低贫困的代际传递，确保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不让一个人落下。

四、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今后工作提出新要求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一）更加注重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这是时代的叩问，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需要回答的历史叩问。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展依靠人民群众，发展就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所在，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出发点和最终价值追求。

（二）更加注重发展提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供给。过去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生产比较落后，主要解决温饱及小

康问题，但伴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我国生产力发展得到了极大提高，一些科技领域世界领先，生活富裕起来的人民群众需求日益多样化、对质量标准日益挑剔，对产品供给质量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倒逼对支撑发展的高级要素供给体系和结构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这些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集中解决产品的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的问题，多样化、高质量、精准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制度要素的创新和供给，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尤其要加强，发展中的问题往往在于高质量的制度供给不足。

（三）更加注重发展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均衡发展。“美好生活”描绘了人民群众对未来生活的期许，体现在经济、法制、科教、医疗、养老、生态、文化和制度等各个方面的美好愿景，核心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全方面均衡发展，既关注物质财富创造，又要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还要专注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既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又要推动发展与改革成果的共建共享，更好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五、对当前和今后工作的启示

蓝图已经绘就，道路已经指明，航线已经开通，下一步关键在执行与落实。综合全面小康社会及基本现代化发展战略，兼顾当期发展与长远发展，下阶段要重点做好十方面工作：

（一）打赢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攻坚战。对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找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难点和发展短板，查漏补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扶贫与扶志及扶智相结合的方式，多管齐下，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完成第一个“一百年”的庄严承诺和历史使命。

（二）积极推进基本现代化发展战略。按照基本现代化的“两步走”发展战略要求，把国家基本现代化战略全面分解到区域现代化发展战略上来，强化国家发展五年计划与基本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任务相衔接，落实重大举措、重大载体、重大平台建设，并进一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发展路径，形成全国一盘棋的目标管理体系。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实施区域协调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区域协调发展力度，以长江经济带和国家中心城市为龙头，推进城市群建设，

优化城镇体系，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面向“三农”的制度创新，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四）深化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着力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积极构建全球共赢价值链，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中国智造和创造强国。

（五）提升科创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双一流”大学建设为契机，培养造就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学家队伍。强化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完善国家实验室、大科学工程等顶层创新体系布局，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和全球性科创中心建设，把国家科创的高原效应提升到高峰优势上来，积极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

（六）建立严苛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强化全过程环境监管。启用“费改税”的征收办法开



征环境税；创新排污权交易机制，编制温室气体清单，构建排污权及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的统一运作平台，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从而解决排污问题。

（七）再造企业家精神以及工匠精神。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特别是要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对侵害企业家财产权的行为要予以坚决纠正。鼓励“双一流”大学设立工程师学院和技师学院，培育技能型人才。探索设立企业首席技师制和国家“工匠精神”表彰奖，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八）布局健康产业助推健康中国战略。围绕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水平、健康环境、健康服务、健康保障、健康产业”五大建设，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护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健康公平，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健康支撑。

（九）全面深化新时代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五大建设”领域的制度供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要以产权改革为纽带，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强化区域金融风险防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推进资本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给予各

级政府更多财税、行政审批、自贸区等自主权，积极探索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制度；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等。

（十）健全房地产制度实现住有所居。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使其回归消费品功能，使房地产收益回归实体经济平均利润，为制造业降低成本、鼓励创新创造良好氛围。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江苏担当 与江苏行动

何雨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博士、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的新部署，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对于率先发展的江苏省来说，这一衔接期与过渡期，有着鲜明的江苏特点与时代机遇，应科学诊断当前江苏省所处的历史方位，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巨大的行动勇气，谱写江苏现代化事业的新篇章。和全国相比，江苏省的现代化事业在时间进度上，大概有 3-6 年的提前量。建议按照“四个意识”的要求，结合江苏省实际，把决胜期的江苏担当统一到党中央的总体部署中，调整为“聚力创新，聚焦富民，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在行动上，坚持四个“毫不动摇”：（1）坚持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毫不动摇；（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毫不动摇；（3）坚持全面协调的发展观毫不动摇；（4）坚持不断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毫不动摇。



一、当前江苏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方位

党的十九大，站在历史高度与全球视野，对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新的全面部署，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不仅意味着“两个一百年”战略中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完成，而且意味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也即将开启。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两个百年目标的衔接期与过渡期，虽然只有短短几年，却意义重大，不仅关系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成效与质量，而且关系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基调与态势。充分利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不仅需要踏石有痕、抓铁有印的实干家精神，也需要有对第二个百年目标提前谋篇布局、抢得先机的战略家视野。

作为经济总量仅次于广东的经济大省，江苏在我国现代化事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特殊作用，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焦点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江苏发展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江泽民同志要求：“为全国的发展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胡锦涛指出：“江苏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为全国发展探路是中央对江苏的一贯要求。”

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江苏人民牢记重托，不负使命，在现代化事业中走出了一条率先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富民发展之路。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进入新时代，江苏省现代化事业也进入了体现时代特征、具有自身特点的全新的历史方位中。

1. 从全球范围看，江苏省已经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去年，折换成美元，江苏省经济总量大约为 1.103 万亿美元，位于全球经济体中的第 15 位，仅次于西班牙的 1.2326 万亿美元；人均 GDP 为 1.436 万美元，位于全球经济体中的第 54 位，仅次于立陶宛的 1.48 万美元。其中，苏州、无锡人均 GDP 超过 2 万美元，南京接近 2 万美元，和世界上著名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 2.19 万美元的人均 GDP 相当。

2. 从国内看，2016 年江苏省人均 GDP 为 9.539 万元，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5.397 万元。比较发现，早在 2010 年，江苏省人均 GDP 为 5.284 万元，基本接近 2016 年的全国平均

水平。换言之，就现代化指标中的人均 GDP 而言，江苏省现代化水平大概领先全国 6 年。

3. 从实际进程看，江苏省已经在全国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论是按照国定标准，还是省定标准，最迟于今年，江苏省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个指标上达标。江苏省不仅在时间上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在质量和水平上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江苏省已经在全国率先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胜利。

4. 从部署上看，江苏省已经提前调整发展战略应对全新历史方位的新挑战。2016 年，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全面实施“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方略。这一新的战略选择和发展路径，与十九大报告的新判断新要求不谋而合。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江苏担当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丰硕成果，奠定了江苏省在新的历史方位中继续勇立潮头、奋力作为的坚实基础。顺应时代趋势、响应人民呼声，充分利用好率先发展形成的机遇期，才能继续“为全国发展探路”、在“两聚一高”中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与全国现代化建设总体进程相比，江苏省现代



化建设事业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总有一个率先发展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从人均 GDP 维度看，大概在 6 年左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综合性国定指标看，至少有 3 年的提前量。时间表倒逼路线图。江苏省的现代化事业，在行动上，很难与全国保持齐步，必然要率先谋划、率先行动、率先起跑。也只有这样，才是科学、充分、合理利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战略机遇应有的江苏担当。

1. 坚决贯彻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针对主要指标提前完成的情况，自加压力、主动作为，进一步提升江苏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含金量，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2. 提前推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在全国现代化事业中，拥有 3 到 6 年时间率先发展优势的我省，不应等到 2020 年才启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行动，而应利用决胜阶段的相对真空期，作出提前安排与部署。

3. 深化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理解。现代化，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应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则规定了我国现代化的属性，即，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就，属于人民，属于民族，属于世界。基本实现，反映了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程度。对于江苏省来

说，在制定现代化事业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时，应提出更高目标、更严要求。

4. 把党中央对现代化事业的新思想新判断新部署融入到江苏省“两聚一高”的事业中去。“聚力创新，聚焦富民”，完全契合、彰显了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精神新理念；“高水平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也体现了江苏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自加压力、主动作为的精神风貌。但是，按照“四个意识”的要求，江苏省应把自己的行动，主动对接、融入到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中。考虑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成为下一阶段的国家目标，建议拥有率先发展优势的江苏省，把目标调整为“聚力创新，聚焦富民，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江苏行动

高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省需要遵循党中央的部署、顺应时代的大趋势、结合本地的实际，实施符合自身特点的行动。

1. 坚持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毫不动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有且只有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要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地区间、行业间、群体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要通过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提高发展水平、优化发展结构，以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毫不动摇。人民，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社会进步的归宿，要永远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江苏省现代化事业的总目标。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民主意识，发扬民主作风，接受人民监督，当好人民公仆。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要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要大幅提高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要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3. 坚持全面协调的发展观毫不动摇。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物质需求。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更是近年来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中的痛点。应加速“两高一低”产能的退出，推动经济向绿色发展转型；继续推进“263”行动计划，严格环保执法；着力打造重点生态工程，强化山林湖泊的保护，全力打造江淮生态大走廊。

4. 坚持不断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毫不动摇。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培养过硬的治国理政能力，才能面对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标本兼治，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



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理解和认识

——对十九大报告的解读

张小兰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精准定位，深刻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新变化，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显现。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必然要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变为“共同富裕”，全国各族人民都能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表现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首先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全国各族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其次表现为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

领域还不够发达，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深化发展。

（一）不平衡发展的主要表现

不平衡发展指的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集中表现在供需不平衡、区域不平衡、产业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收入不平衡等方面。

1、供需不平衡。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这也是我国当前实体企业效益下滑、工业品价格下降、金融风险加大等突出经济问题背后的根源。供需不平衡一方面造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导致有效供给不足，如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而老百姓对高品质产品、服务的需求，国内又无法实现有效供给。

2、区域不平衡，主要指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促进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区域发展目标，但近年来三大区域的发展差距却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中部地区面临着“经济凹地”困境，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此外，各个区域发展也不平衡，如京津冀地区，北京与天津发展较好而河北发展落后；成渝地区也是成都重庆发展较好，周边城市发展相对落后。



3、产业不平衡。各国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是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制造业和农业，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在 60% - 70% 以上，虽然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50%）超过制造业，但依然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不仅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不平衡，并且在制造业中先进制造业发展也相对滞后。

4、城乡不平衡。城乡不平衡表现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均衡、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存在着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文化娱乐比较落后的现实情况。

5、收入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差距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有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行业差距（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等等。目前公众对收入的不满意，主要体现在对收入不平衡的原因方面。

（二）不充分发展的主要表现

不充分发展，指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资源和能源没有

得到充分利用，原发性的重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太强等等。我国发展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在许多方面的发展是不充分的，比较显著的有：

1、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际上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生产力总体水平依然较低。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这是我国当前的现实国情。

2、科技发展不充分。我国在基因技术、杂交水稻、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的科技水平已经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水平还相对落后，原始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占有率偏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不多，大量的核心技术依然要靠进口。2012年，我国制造业产值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但是，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技术水平依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3、资源能源利用不充分。我国单位 GNP 的能源消费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 4-14 倍，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远远高于工业发达国家。由于资源能源利用率低和人均资源能源拥有量低，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从一个世界能源矿产出口大国变成



了进口大国。此外，资源能源利用不充分，也使得我国环境污染比较严重。

4、民生工程发展不充分。老百姓关心的住房、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问题发展不充分，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老百姓需求不断从生存需求转向享受需求、发展需求，不断从物质需求转向政治、文化、社会需求，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保障和改善民生仍然是我国发展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对策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成为现阶段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1、坚持经济发展。由于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所以我国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为我国的各项社会文化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要：（1）坚持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不仅指经济要发展，而且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也

要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2）坚持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指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区域协调、城乡协调、产业协调，国内外协调，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3）坚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

2、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驱动力，我国要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必须靠创新发展战略，向科技创新要动力、要竞争力，让科技引领未来发展。但科技创新有风险，所以要利用现代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将保险服务业与科技创新有效结合起来，形成政府、金融保险机构和企业联动的良性机制，满足企业科技创新的多元化、多层次融资需求，减少企业科技创新的后顾之忧，加快科技创新发展。

3、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首先应重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引导优势资源流向有竞争力、发展潜力大、集约高效的行业和企业。其次，通过推动科技创新，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再次，挖掘科教文卫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潜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



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充分发挥服务业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从服务传统产业转向服务于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4、补短板，强弱项，实现平衡发展。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各方面的差距，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具体包括：（1）保持东部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促进中西部经济崛起，尤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边疆地区、民族地区，通过精准扶贫和各种扶持政策使其尽快摆脱贫困，踏上快速发展的车道。（2）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3）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税收改革，尽力缩小收入差距。（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现代服务业，缓解资源环境压力。

5、实现全面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发挥政府在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职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在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从而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

展、社会全面进步。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Yangtze IDEI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框架、 路径和方略

刘志彪

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奋斗目标，要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此，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就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十九大报告中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创新性地提出来的一个突出的、具有建设性的重要范畴。如何理解这一新出现的经济范畴呢？过去，我们曾经提出过实现“经济现代化”或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等范畴。其中，前一范畴经常与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等并列或对照使用，主要是指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农业社会向

工业社会转换、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变革的历史和动态过程。而后一范畴则是在产业层面上，特指现代元素比较显著的产业构成，这在经济发达国家，主要指现代服务业发展比较充分的产业构成；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指工业化进程比较健康、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稳定上升的产业构成。显然，十九大报告新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概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经济现代化”和“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

但是与上述两个概念有很大不同的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是指变革的历史和动态的进程，而是与构成现代化强国的其他要素（如现代化社会体系、现代化生态系统、现代化法治体系等）对应，指一种可以定性或定量地描述的经济水平发展的状态、目标和结构；它也不是仅针对产业构成、产业结构而言，不是仅仅用此来描述产业高度化水平，而是指整个国家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系统，在发展总量和速度、发展水平和质量、发展结构和要素、空间布局的性状、体制机制运行、开放发展程度等诸多方面的现代化水平和状态。相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来说，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基础性的建设子目标和内容。



同时为了实现这个子目标，必须以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为重要的物质基础。

根据十九大报告精神，新时代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主要由以下要素构成；

1. 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中国现在已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只要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 6-7%，到 2050 年左右，中国人均 GDP、人均 GNP 或国民收入达到世界现代化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的经济总量就绝对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

2. 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人均水平要超过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中国可以在衡量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的其他指标方面奋起直追，如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预期寿命等方面，中国的进步都十分迅速。

3. 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结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语境下，是指要全面地构建比较稳固的现代农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级化的装备制造业，以及门类齐全、迅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总体要求是技术进步在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得到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得到增

强。建立这样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

4. 现代化空间布局结构和协调程度。指国土资源利用效率较高、要素密集程度较大、生态容量适度、城市群落连绵、区域发展差距较小的生产力布局结构。

5. 现代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并不是西方当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才一定是现代市场经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主要特征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和政府的“两只手”都要起作用，这是中国发展的优势所在。

6. 高水平的开放经济体系。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一定是全方位立体开放的经济体系，是深度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与世界经济之间有着良性循环关系的经济，不仅可以输出商品和要素，而且也可以吸收商品和要素，但绝不是依赖型的输入型经济（如技术依赖度比较小）；不仅可以引进来，而且可以走出去；不仅可以对东开放，而且可以沿“一带一路”向西向南开放。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口的迫切要求，也是在处于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因为：

1. 只有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改变长期以来在赶超型旧体制下形成的速度、数量偏好的粗放型发展特征，才能使供给结构较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和不断升级的趋势，才能真正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经济杠杆，加快振兴实体经济。

2. 只有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大力推进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才能在符合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和新增长点，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同时使传统产业得到更新改造、焕发生机，使落后产业得以淘汰。

3. 只有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鼓励各级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和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和机制，才能不断地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4. 只有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才能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在高水平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创新经济，才能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十九大报告描述了新时代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路径和基本方略。总的来看，需要我们结合实际情况把它们具体化为行动纲领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1.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从供给端看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是供给的结构、质量体系与不断升级的社会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重大的结构失衡”，从而导致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和运转不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纠正扭曲的供需错配，从而缓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具体的路径和方略上，主要有以下要点：（1）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质量优势；（2）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



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并形成新动能；

(3)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4) 加快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促进这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打造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5) 加强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外部经济性”，尤其要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2.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第一动力和战略支撑。从依靠投资拉动为主，转向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汗水经济转向智慧经济、知识经济，最根本的标志在于创新要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选择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第一动力和战略支撑后，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舞台上的角色、功能和地位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角色上，会由追赶者变为赶超者，甚至变为领跑者；在功能上，会由技术标准的遵守者和跟踪者，变成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市场地位上，将由追随者和弱势者，变成垄断者或寡头竞争者。这要求我们掌握新技术的源头，必须经历时间更长、花费更多、风险更大、更艰苦的基础研究和产业

化过程。为此，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同时，要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化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知识产权法、企业家精神的作用。

3. 乡村振兴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环节和基本支撑。“三农”问题任何时候都是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地动山摇，更别论什么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无疑是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有效的的方法和路径。十九大报告在三农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亮点，就在于提出了要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必须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另外，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工作。

4. 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空间布局结构的重要路径。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一个



重要原因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充分，这既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花大力气去纠正的问题，也是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所在。区域协调发展应该根据各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分门别类制定差别化的经济政策：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要用各种扶持政策促进其加快发展；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重塑激励机制和发展动力，使其焕发青春活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对东部发达地区，则应要求其尽快进入创新引领发展的轨道，率先实现地区优化发展，率先启动进入基本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未来应根据“时空压缩、增加密度、减少分割”的经济地理重组原则，鼓励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5.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实践证明，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主要来自于对旧有的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的大胆改革和创新。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方式一是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要通过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的管理，适当地减少干预，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做最有效的事情上；“更好”的标准是不缺位、

不越位、不错位。方式二是要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对权力清单外的事务要多做“减法”。方式三是“放手”不是“甩手”，为市场活动制定规范，并充当监控者和仲裁者，纠正市场自身的失败；非市场活动即非赢利性活动中发挥主体角色，为市场发展提供外部经济性。具体的重点任务主要在三个层次上：（1）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2）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垄断规定和做法；（3）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6. 全面开放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自我强化机制。过去近四十年的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全面进步，中国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取得了巨大的红利。当前，新一轮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兴起，中国要利用自己的内需优势，形成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着力吸收全球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这时候如果国家采取封闭政策，必然会丢失发展的战略机遇、必然落后。十九大报告指出，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不是关闭，而是越开越大，主要是：（1）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重点，引进来和走出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3）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4）通过建立和完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新常态经济学： 实践特点、理论逻辑和政策体系

刘志彪

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内容摘要：新常态下经济学兴起的基本背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干内容之一，新常态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扭转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结构性失衡。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的系列讲话为主线，从理论上概括了这一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经济发展理论，探讨了习近平新常态经济学的实践特点、理论逻辑和政策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的实践出发，不仅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而且基本确定了进入新常态的思想理论、战略重点、工作任务和政策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常态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的战略把握，以及高度的理论阐述和概括，对新常态下怎么看、新常态下需要干什么、新常态下怎么干等一



系列问题的重要指示,是原创于我国的新常态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其中蕴含着十分科学严谨的逻辑,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

新常态经济发展时期构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政策,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常态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认真学习、系统总结和精度提炼。新常态下经济学兴起的基本背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它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扭转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结构性失衡。本文试图从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背景出发,对习近平新常态经济学的逻辑背景、主要内容、实践特点和政策体系等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和考察。

一、新常态经济学产生的现实背景

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新常态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我国经济在要素禀赋、外部条件和环境发生诸多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体内在的均衡状态和演进规律,以及促进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和政策。要素禀赋、外部条件和环境的重大变化,以及这种

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影响、相互作用的机制等问题，是现阶段我们研究新常态经济学的现实背景和基本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适应、把握和引领新常态的基本前提，是必须要关注现实经济中各种内在的因素与外部条件的变化，关注发展过程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变化的方向，这样才能抓住发展的内在逻辑，才能制定出适合发展环境、全面引领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常态特征的有系列讲话精神，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和基本特征：

1.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二位数增长的超高速。即使是增速进入下行区间的 2013-2016 年，年均增长率也为 7.2%，明显高于世界同期 2.5% 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 4.0% 的平均水平。由此导致中国 GDP 占世界总量的 14.9%，比 2012 年提高 3.4 个百分点，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平均 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世界后起国家经济赶超的历史经验证明，连续近四十年的超高速发展不可能一直维持，发展终将会进入中高速的增长期，并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



步进入中低速增长。这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揭示的客观必然的规律。增长速度的换挡，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2. 从结构转换来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都是与持续快速的资本形成和投资驱动联系在一起。过去是短缺经济，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什么低端高端产能都能被消化掉，因此不存在什么重大的供求结构失衡问题；现在进入速度换挡期，需求的洪水冲击相对慢下来，需求的结构在提升，那些相对低端的生产能力就容易变成过剩产能，这些企业如果不能退出市场，就会变成僵尸企业。因此，在缺乏存量自我调整机制即缺乏结构调整机制的条件下，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必然伴随着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同时，也意味着新常态下建立和完善结构调整机制的迫切性，意味着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意味着推进结构转换对于转型升级和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3. 从发展方式看。从规模速度型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迫切要求。我国过去一穷二白，铺摊子、上项目，搞粗放发展，有利于快速满足供需缺口较大的低端需求。现在我国的经济和制造业的规模，都已经跃

居世界前列，2016年人均GDP达到了53817元，其中超过1万美元的省份达到了9个，这时再不追求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不仅国内外条件不允许，也会导致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和更多的僵尸企业，使实体经济进一步债台高筑，并可能发生系统性大规模金融危机。更为严重是，现在我国进入了投资边际效益下降的阶段，增长就不能继续依靠增加投资规模，而是要不断地提升综合要素生产率，就是习总书记指出的“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

4. 从发展动力看。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投入优势，进行出口导向、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动力模式，正面临新的挑战。具体来说，就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即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等过去看成优势的东西，现在不再便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利用西方的市场继续进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正在大大降低。世界经济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货物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达到10%以后，贸易的增速就会自动会降下来。现在我国的货物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12%左右，这意味着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速度拐点已经到来，长期的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势必要转向扩大国内需求方面。



因此，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演化的一种新的均衡状态。我们说它是长期的，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的经济经过几十年艰苦的努力，已经摆脱了“贫困恶性循环”，冲出了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即将进入全面小康的较高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我国的发展要素、发展环境、发展机制、发展动力等方面，已经与低收入发展阶段和发展中国家有重大的区别。另一方面，从现实问题看，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之后，我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仍将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例如，如何通过创新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形成动态均衡，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如何纠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发展失衡，从而振兴我国的实体经济？这些都是我国现阶段形成新发展动能的关键因素。再如，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我国在新常态阶段滞留的时间过长，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都是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需要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新常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工作的主线，也是新常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一研究对象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扭转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结构性失衡”：（1）用改革和创新的办法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

和效率，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纠正资源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要扭转经济运行中日益严重的“脱实向虚”问题，坚决地去实体经济过高的杠杆，同时要千方百计地化解“资产荒”，充分实现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

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及其相互作用的全面综合分析提出来的。它正确地指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是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结构性矛盾的基本判断。“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中央的这一判断，是推进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结构性矛盾，有三个重要特征：

1. 在方向上，并非主要来自需求侧，而主要是来自于供给侧。原因不是缺少需求刺激和购买力，而是供给结构和质量难以满足需求结构不断升级的要求。当前我国的广义货币发行总量（M2）是160万亿左右，相对于一年80万亿的GDP，规模



显然已经不小。经济运行中并不缺少流动性和有效购买力，但许多产业的产能仍然需求不足、严重过剩。这说明，供给结构中存在着严重的配置扭曲，只有把资金运用于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越过商品变成货币的“惊险一跃”，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 在性质上，并非是周期性的，而主要是体制性、素质性的。我国相当多的产能，是过去在推动出口导向战略时期形成的，2008年后因刺激经济，政府鼓励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其规模又有所扩大。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这些过剩产能仅依靠刺激内需是不可能得到有效化解的。另一方面，现今很多产能并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供给的质量达不到消费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往往需要仰仗进口。不解决这种供需结构之间的匹配性矛盾，产能的严重过剩会持续地降低其产出价格，企业盈利水平就不可能提升，财政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也难以持续。

3. 在时间上，不是短期能解决的，而需要在中长期中不断地在供给侧综合施策发力。需求侧、周期性的问题，可以通过收缩或者扩张总需求来解决，这是一个与货币投放或回收现象有直接关系的快变量；而供给侧、体制性、素质性等结构性问

题，由于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等创新手段来解决，因此它就是一个慢变量。当前国民经济不可能继续通过短期量化宽松刺激来实现V型反转，而需要经历一个L型的增长调整阶段。在这方面，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必须启动结构性改革来治本。

重大结构性失衡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可作为性。它的意义在于：

1. 结构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说明中国经济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需要我们在新常态下要有所作为，不要消极地等待经济周期的自然循环，不要指望经济自动复苏、自动恢复均衡并走向繁荣，而是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抓住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最佳“窗口期”，坚定不移地处置各类僵尸企业，避免经济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危及经济社会安全。

2. 既然是结构性矛盾为主，说明宏观上不需要搞什么货币的放水漫灌，不要过于宽松的需求刺激，也不要搞什么顺周期的紧缩，而是要把改善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产出素质作为主攻方向，实现高水平供需均衡。这就决定了在现阶段，要做好打持久战的艰苦的思想和行动准备。



3. 既然是结构性矛盾为主，而最有效的结构纠偏机制，并不是政府行政手段，而是市场的自主调节。这就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要回归政府管制的老路，不是要搞什么“新计划经济”，而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有效调节作用，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资源配置调整。

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主要指各种比例关系的调整，如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投资消费比例调整、空间结构调整等等。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要在适度扩大需求的条件下，从总供给端发力，进行技术创新、结构升级和制度变革。前者主要适用于计划体制，后者适用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把结构性矛盾作为新常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其实跟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体制机制这两个因素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1. 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来看。过去处于贫困的发展阶段时，我国的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增加市场供给，千方百计摆脱生产能力短缺即资本短缺。短缺经济态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1）通过提



升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2）要在收入水平既定的目标下，尽力扩大储蓄率从而扩大资本形成能力；（3）要提高生产能力，从而扩大市场供应能力，缓解长期存在的供需矛盾、满足市场需求。现在，我国经济总体态势已经从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彻底转向了过剩经济，即资本过剩和商品过剩，同时伴随着日益严重的资产短缺，即“资产荒”。表现为一方面现在的产能严重过剩，库存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本寻求高盈利出路，追逐有限的优质资产，由此不断地推高资产的价格，同时伴随着信用杠杆的水平不断地提高。这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1）要由过去努力地缓解劳动力过剩，变成要千方百计地缓解产能过剩；（2）由过去要解决短缺问题，变成需要解决两个过剩问题；（3）由缓解商品短缺，变成了要缓解资产短缺。

2. 从体制性病根来看。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中所出现的资产荒，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都可以通过金融深化等措施得以缓解。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的泡沫经济情况，尤其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问题，说明资产荒问题已经演变为旷日持久的结构失衡状态。助推供给侧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的，一定是内生化的体制问题。如产能过剩除了与经济低位运



行有关外，还是追求 GDP 的政府动员型体制干预的直接结果，另外，父爱型的软预算约束机制，也是大量国有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可以继续消耗或占用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的重要原因。再如，实体企业成本高，并不完全是企业自身效率低所致，而是因为两种成本高昂：（一）制度性交易成本高，各种税费、行政审批、垄断性市场的存在，使实体企业不堪重负；另一种是生产制造成本高，主因是几乎所有的要素价格都在循环累积性上涨。还有，我国实体企业的杠杆率水平比较高，主要是因为我国实体企业偏重于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方式，而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直接融资方式受到体制的金融抑制。最后，改变地方政府不合理的债务结构，防止出现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发生，根本还在于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改变地方政府的职能以及破除土地财政的弊端。

三、新常态经济学要研究解决的重点问题及其内在逻辑

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工作，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因此，“三去一降一补”也自然成为新常态经济学要研究解决的重点问题，它的直接效应或者目的，是要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等。“三去

一降一补”五项重点任务，每一项都需要新常态经济学来仔细地研究。

1. 利用竞争政策去产能。短缺经济条件下，扩张产能主要是通过产业政策来推进。而过剩经济条件下的去产能，必须主要运用竞争政策。具体可以通过鼓励收购兼并重组去消灭僵尸企业；也可以通过竞争让其自生自灭，达到市场出清。当下的政策取向，要鼓励前者，这符合转型期稳定发展的要求。为此，要把对产能过剩的企业的补贴，转为对兼并重组方优势企业的补贴；对产业重点扶持的政策，也应该从对生产者的补助，转变为对用户的补贴，以培育市场需求、扩大市场竞争和淘汰落后企业。需要通过建立产能竞争标准，去淘汰落后产能。这是在去产能中减少行政干预的可行方法。可以把落后产能分为三种并分类施策：在技术层面，它指以落后技术和工艺装备为基础的生产能力；在市场层面，它指丧失了竞争力的生产能力；在政策层面，它指高耗能、高污染、质量不达标、有安全隐患的生产能力。对前两类的落后产能，应该全部交给企业和市场调节。而对第三种落后产能，政府应通过提高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准入门槛来完成淘汰目标，加强规则意识，减少计划意识；加强选择意识，减少指令意识。



2. 因城施策去库存。房地产市场问题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一、二线城市面临的不是去库存的压力，而是急需通过补库存，来缓解房价过快上涨的压力，甚至还必须动用包括限购、限贷等在内的行政手段加码调控。我国的楼市库存，绝大部分分布在广大三、四线城市和县城，这些地区的楼市泡沫表现为存在的严重的库存积压。由于在就业机会、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等方面，这些三四线城市与大城市的差距悬殊，目前人口呈现持续的净流出，从而导致对住宅的需求相对不足。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鼓励各地因城施策、因地制宜，以个性化的办法制定去库存的灵活政策。另外还需要城市群建设战略来配合，大力建设功能互补、产业协调的连绵城市群落，这既可以避免大城市人口不合理的急剧膨胀，又避免了广大中小城市的凋敝。

3. 主动而不是消极地去杠杆。僵尸企业都是靠高杠杆维持的，因此去产能就是去杠杆，去杠杆就是加速去产能。对列入竞争政策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尤其是僵尸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与此同时，我国实体企业的杠杆率普遍比较高，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实际问题，消极被动地去杠杆，容易引发金融风险。

按照国际经验，主动地、系统地降低杠杆率的最佳途径，是加速发展以公司债和股票为主的直接融资。为了使我国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逐步正常化，必须把对投资者权益的充分保护放到首要位置上。

4. 通过制度改革降成本。降成本具有双向调节供求的政策含义。降成本包括降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两块。前者最重要的途径是提升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另外，就是要通过制度改革来降低要素成本。如控房价上涨过快，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制度源头上破除土地财政的副作用。税收和收费是制度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全面大幅度地实施降税的空间并不大，但降费率却是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如降低“五险一金”就有较大的空间。让政府与各种可面向市场的事业单位、中介机构彻底脱钩，让其参与市场竞争，也是可以尝试的重要的降费手段。

5. 全面实施“扬长补短”策略。补短板必然使潜在的增长空间得到有效扩展。过去我们采取“扬长避短”战略，倾斜发展某些重点部门和领域。对于实现全面小康来说，有些短板是避不开的，如农村贫困人口、科技进步水平和生态环境等。因此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就要扎实推进科技创新



和生态文明建设。“扬长补短”的关键，是要补制度创新的“短”，释放制度性红利。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也是驱动创新的主体，因此要把创新制度的供给，当作政府调结构的“抓手”，政府要通过增加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给市场运行主体创造优良的环境。

“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间，不仅在解决问题的先后次序上，而且在任务的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去产能、去杠杆应该就是五项任务中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同时，五项重点任务与防范金融风险、振兴实体经济之间，也可以构成一组内在的、逻辑严密的经济体系。这就是新常态经济学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

以去产能、去杠杆与防金融风险、振兴实体经济的关系来看。如果实体经济中巨量的过剩产能和僵死企业不能顺利地处理掉，而是越积越多，那么一方面这些企业要继续消耗和占用国民经济中宝贵的信贷资源、物质资源和市场资源，继续迫使信贷加大投放，这会进一步提高实体经济杠杆率，增加爆发系统性、大规模经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动态看，也会通过复杂的经济传导机制，进一步加大杠杆率水平：即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增多——行业供求总量和结构关系进一步失衡

——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全行业企业业绩变得更差——无法弥补历史欠账(拖欠的工资、社保、应付账款、设备减值等),无法更新改造技术设备,无法归还银行欠账——企业负债率进一步上升——银行不良率进一步上升、政府财政收入降低、员工工资收入无法改善——金融风险概率上升。反之,如果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削减了行业供给总量、改善了供求结构,那么上述机制传递的逻辑就会反过来,变成良性的正常循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另一个重点问题,也是改革的一个直接目的是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我国经济运行中“重大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之一,已经引起了许多不利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不良后果。众所周知的是,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作为代表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长期以来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但是在最近十年左右,实体经济企业在过度炒作的房地产和金融业的严重挤压下,其动力功能正在逐步衰减,这是导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降低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是房地产的资产泡沫,吸纳了社会主要的资源,挤压了民众消费能力,拉高了利率水平并推高了制造业的成本,已经成为影响制造业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阻碍因素。很多实体企业在由此导致的高



成本挤压下，已经无法赚取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一些企业纷纷主动地退出市场，或被动破产倒闭。

振兴实体经济的问题，看起来复杂，其实也简单：让实体经济能够取得社会平均的回报率。为此一方面要抑制、压缩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另一方面，则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即：纠正行业供求总量和结构失衡关系——提高行业内产品价格——提高行业内主要企业业绩——弥补拖欠的工资、社保、应付账款、设备减值等历史欠账，更新改造技术设备，归还银行欠账——企业杠杆率降低、实体经济恢复竞争力——银行不良率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员工工资收入改善——堵住金融风险上升概率。

四、新常态经济学的理念、工作和政策体系

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标志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常态下，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贯彻新发展理念，习总书记指出，是为了“有力推动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这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优势的战略抉择，是我们党的新常态经济学关于发展理论的重大升华。

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的新动力问题，目标是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综合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工作。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用补短的思路重点解决发展的薄弱环节，目标是增强发展的整体性，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必须坚持发展绿色清洁生产，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顺应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目标是构建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新机制，着力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使人民群众在发展中具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思路，主要是“五个搞清楚”，即搞清楚现状是什么，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搞清楚谁来干，搞清楚怎么办。实践中的工作重点如何转变？关键是要“对标”十个标准，即以“十个更加注重”为标尺，对不上的事不能再干，对得上的事要加把劲干：推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增长，要



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施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区域上，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生态，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改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体系，主要是五个方面的组合：一是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搭配组合，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产业政策要准。政府要在公共基础设施等容易出现市场失败的领域，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责任，最好不要介入竞争性领域的项目。三是微观政策要活。习近平同志讲过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要发挥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关键的少数的作用。企业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舞台的主角。四是改革政策要实。改革政策要一项一项出台、一项一项督导，让各项具体改革举措落实、落地，不要空转。五是社会政策要托底。切实守住民生底线。主要是基本住宅、养老、医疗和教育这四个方面的底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质量、效率和发展动力的三大变革，建设一个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者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主动积极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结构调整要速度、向结构变化要质量，向结构变化要效益，是新时代协调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取向、标志和途径，也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新常态经济学的理念、工作和政策体系。

从供给侧看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是供给的结构、质量体系与不断升级的社会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结构失衡”，从而导致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和运转不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纠正扭曲的供需错配，提高产出的质量和效率，从而缓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重点是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和素质性的矛盾和问题，在具体的政策路径和方略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要重点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抑制以炒房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火、过旺的不良态势。实体经济振兴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避免过度追求数量的倾向，增强我国经济质量的优势。



2. 要把握科技进步的基本方向,重点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并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3. 要运用一切手段鼓励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鼓励企业在经济周期的底部阶段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对购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可以按一定的比例给予优惠税收、贴息贷款的鼓励等等。

4. 要加快发展和迅速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水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就是指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显然,这些内涵更多与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关。这就把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到了极其重要的政策高度。

5. 要重点促进产业集群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打造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企业以集群这种组织方式发展,同时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是当今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过去的问题是我们加入的是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产业集群

的发展整体上组织程度不高。中国未来产业集群升级的方向，就是制造环节的精细化，以及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竞争和收购兼并，逐步形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6. 要重点强化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外部经济性”。

7. 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8. 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同时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重构 与振兴中国制造业

刘志彪

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主席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深邃思考和务实推动，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世界担当和情怀，也是中国面对逆全球化复杂局面更新发展机制、顺势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最重要决心和措施。这一倡议对于启动我国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有助于我国在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中，重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我们应该通过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形成中国制造发展的优良环境和氛围，抓住世界赋予中国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向东开放发展：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制造业的增长机遇和挑战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指向特征，主要是向东开放；而发展的内外联动机制，则主要表现为中国企业主动深度地嵌入由欧美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接受

它们的外包订单进行国际代工。我们把过去中国制造的这种全球化发展现象和趋势，描述为基于加入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有这么几个基本的内容：

（1）在国内收入较低、消费水平低、内需较小的历史条件下，直接把国内增长的市场支撑基础，转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导向上；（2）引进西方的技术、设计和设备，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加工制造；（3）通过营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建设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吸收和利用外资，主要由外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业务；（4）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主要从事“微笑曲线”底部位置的加工、制造、生产、装配等相对较低的附加值业务；（5）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上，运用各种刺激政策推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等等。

在制造业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中国作为主要的生产国，取得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1）加入全球价值链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就业机会，消化了国内丰富的有竞争力的产能；（2）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外包订单，中国企业在被俘获的全球价值链中成功地实现了产品升级、工艺升级，甚至一定的功能升级；（3）通过国际代工的技术外溢和竞争



驱动，中国本地制造企业不仅学到了技术，也学到管理技能和有关国际市场的知识，为自主创新发展和创建独立品牌奠定了微观基础。

基于加入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既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机遇和繁荣，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

1. 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容易出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问题。从事“微笑曲线”底部位置的产业活动，大多具有进入壁垒低的市场结构特征。由此决定了在世界市场需求高速增长时期，大量蜂拥而入的低端产能，很容易在需求浪潮退去的时期形成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的态势，从而引起严重的经济萧条。

2. 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容易陷入成本和价格的比较优势陷阱，忽视产业升级。中国现在面临着国内外要素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过去低价竞争的优势，正不断地让位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速度，越来越难以消化掉要素成本上升的强大压力，从而容易导致产业竞争力衰减。

3. 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可能会抑制我国进入自主创新发展轨道的可能性。在这一发展模式下，中国企业

做的是跨国企业事先研发、设计好的外包订单，收取相应的加工费。经常地，这种“合理的”加工费和利润，会让中国企业失去进行自主创新的欲望和动力。而且一旦进入这种代工体系，很容易被跨国企业“俘获”和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底端，为未来产业转型升级自我设置了障碍。

4. 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容易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失衡。表现为：一是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中国制造业，缺少与大买家进行讨价还价的市场势力和必要资源，因而只能获取微薄的加工费收入；二是制造业需要密集的资本投入，在资本所有者为外资的条件下，利润的大头都自动地流向了发达国家；三是过度发展的低端制造业，由此导致的产能过剩和压价竞争，往往会恶化劳动者地位并不利于其收入提升。

总之，目前中国过去攻城掠地、无坚不摧的制造业附加值贸易活动，已经到了难以为继、必须转换发展模式的关键时刻。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破解国内和国际经济结构失衡

转换发展模式、重构全球价值链，既是均衡国内经济结构的要求，也是中国为纠正世界经济结构失衡所做的重大努力。

首先从国内经济均衡的角度看。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



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国内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具体来说主要出在供给侧，一方面表现为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表现为高质量的有效供给不足。究其原因，是我国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在那个时期制造业大力实施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面向中低端市场出口、低端消费和投资，形成了巨大的产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现在全球经济陷入了低增长困境，国内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消费为例，随着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中高端消费需求显著增加，早先的低端产能就变成了过剩产能。如果供给端不能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中高端需求将基本转向国外市场。更深刻的是人口结构变化，2012年以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使住房、小汽车、家用电、食品、服务等消费需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因此，纠正国内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的关键之一，必须要从改变“基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入手，

形成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氛围，面向国内不断崛起的中产阶层的中高端需求，一方面压缩和提升低端产能，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和实施品牌战略，增加高质量有效供给，使中国制造从数量扩张全面转向质量提升，全面重振中国制造。显然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另外，我们从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角度看。在当前开放型经济发展条件下，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还必须能够有助于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恢复有机联动性和动态均衡。虽然我们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消费国和高技术工业国，在过去“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中，也获得了大量的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全球化供应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其生产的技术和设备等，则获得了来自中国市场需求的巨大支持，因而取得了具体的、巨大的实际利益。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中国作为全球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重要的发展中经济体，如果长期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不进行相应的转型升级，不主要面向不断成长中的巨大的国内需求，也必然会使全球经济结构发生失衡。

中国生产、美国等西方国家消费的这种全球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一分工秩序除了会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



等问题外，还会使世界经济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如中国廉价的产品大量输入，会使这些国家的中低端产业逐步失去竞争优势，被迫向国外转移，造成其产业出现所谓的“空心化”趋势；也会使以传统农业和一般制造业为代表的“旧经济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出现利润下滑、失业率增加和社会不稳定。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最近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内顾倾向加重，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战的阴霾笼罩在世界的上空，“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这种风潮虽然具有相应的社会基础，但是它显然会阻碍全球生产要素与资源在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自由移动，阻碍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和使用，从而阻碍全球福利的进一步增加。

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应该争取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放大正面联动效应，防止和减少负面外溢效应。为此他提出了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全球治理的命题，以此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其中，“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世界经济的调整和发展会有曲折性，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目前至少已经出现了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1）出口商品为主可能变为输出资本带动商品就地销售；（2）吸收外资可能变为主要吸收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3）利用别人的市场扩张经济可能变为利用自己的市场扩张经济；（4）以科技园区优惠政策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变为向技术人员提供先进的制度平台和硬件载体。因此可以预言，崛起的中国将会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全球价值链，用自己对全球化的理解，形成自己独到的全球化战略体系，包括一套完整的战略理念、模式、体制和举措等等。

上述分析意味着，我国过去基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走到了尽头，同时，新的全球化战略也正在崛起。习总书记2016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了新的涵义。未来随着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重振，一个更加开放、包容、



协调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将会建立。在 G20 安塔利亚峰会上，各成员国所倡导的建设包容的全球价值链，就是为了构建这种新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对于有担当、负责任的中国政策决策机制来说，包容的全球价值链就是要主动构建全球经济增长结构均衡的新机制，就是要构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

三、沿“一带一路”倡议重塑全球价值链与振兴中国制造业

重构基于内需的全球价值链，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倡导的中国参与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主要含义。这个战略的主要内容，不是要回归过去的封闭经济，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是要以自力更生为目标，简单地搞进口替代，而是要用开放、包容、协调的理念，扬弃过去单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利用自己内需规模名列世界前茅的优良基础条件，承担起自己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相应的责任，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契机和基点，构建以我为主的高水平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以此促进全球经济的结构均衡，促进中国经济内生化发展，并通过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发展，加快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我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竞争的新的动态竞争优势。

我之所以强调重构这种具有包容性特征的全球价值链，不仅是因为世界经济低增长的外部环境的挤压，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国要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必须要从全球现有分工格局的调整基础上推进。建设制造强国需要一个很好的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不仅要从贸易方面着力，更要从生产和贸易一体化的角度上考虑环境和机制的优化。过去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的全球化，使我们成为全球制造大国，现在要寻求建设制造强国的环境和机制，需要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一带一路”倡议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中的一种全新的空间开放观，是我国开放视野、角度和区域的新跃迁、大转变。“一带一路”是开放格局不是地理规划，如果我们不与这种开放观有机配合，去有意识地形成牢固的价值链连接，那么不同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就没有相应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即使有，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纽带来维系。

跟空间指向特征上是向东开放、加入由西方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模式不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以我为主的包容性的全球价值链，在发展上具有下列几个明显的特点：



1.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我们需要向世界输出我们的资本和产能，同时大力引进世界的能源及资源；另一方面，我们的产业在迈向中高端的过程中，需要利用自身庞大的内需优势形成制度化的平台，面向世界各国引进我们急需的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

2.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我们要通过加大技术研发和对市场网络营销的投入，积极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通过价值链的微观治理，来转移我国富余资本和产能，使我们自己的产业逐步迈向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3.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们要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迈进，背靠我们巨大的内需市场、丰富的产能以及巨额的资本形成能力，从事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网络品牌、物流金融等非实体性高端服务业活动。因此，一条崭新的全球价值链，将成为中国高水平全方位开放的新空间、新纽带和新载体，是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中高速、产业发展迈上中高端的基础。

沿“一带一路”倡议构建的、基于内需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怎么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振兴？其内在的机理是：这

种重构的全球价值链，将助推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从而给中国制造壮体强心：

1. 以利用中国巨大的内需、基础的创新促进平台等，广泛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它们是产业升级的基本要素，是促进制造强国崛起的“飞轮”。

2. 可以趁产业资本沿着全球价值链大规模地走出去、走进和走上去的时机，为持续低迷的全球投资与贸易注入动力，为东道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且可以就地吸收和利用东道国的创新要素和人才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

3. 中国企业可以在内需吸引力下，有意识地运用“逆向发包”原理，在发包中把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和人才有目的地为我所用，让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跨越地理障碍，优先进入中国经济的运行轨道，并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服务。

4. 可以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国内需求引导下，通过比较优势的选择，形成新的全球产业分工或产品内分工格局，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这种新型的全球化战略下，着力振兴制造业、实现制造强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发展机制和基本路径，跟过去在全球价



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的方式有本质的不同。顺应全球化大势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开放发展中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次，其要点有：

1. 坚持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消费的基本现代化，将为壮大内需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2. 以不断壮大的巨大的内需为基础，通过鼓励资本市场的兼并收购和资产重组，组建中国的巨型跨国企业，以此价值链的“链主”为平台，广泛吸纳全球先进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在“迎进来”的同时，率领中国企业“走出去”，就地吸收和利用当地人才，开发国内制造业需要的技术和技能；

3. 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依托，在国内重要的全球性城市建立总部基地，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链主”地位。同时，要在沿线主要城市建设全球价值链的节点关系，以此转移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丰富产能，把一些发展中国家纳入我们主导的价值链体系；

4. 除了发展消费者驱动的 GVC 外，这要加入全球创新分工体系，即全球创新链，发展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其中有两个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要实施最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一个是建立面向制造强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前者必然激励创新驱动,后者将重塑工匠精神,提供振兴制造业的高级技能人才。

四、振兴中国制造业的若干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趁着“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通过加快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优化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环境和氛围,抓住世界赋予中国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和机会。

1. 要坚决抑制虚拟经济尤其是房地产业过旺过火趋势,让实体经济企业能够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率。这是实体经济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更是走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基础。

2. 主要利用竞争政策、环保政策而非行政手段去产能过剩,通过资本市场鼓励产业内的优势企业收购兼并,增加制造业企业集中度,增加其调控市场价格的能力。

3. 构建法治化市场营商环境,增加外资、民资等实体经济企业的投资信心,遵守过去给予的优惠政策的承诺,甄别纠正一批侵害民营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精神。



4. 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同时,运用一切手段鼓励传统产业中的企业在经济周期的底部阶段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如在进口设备一次性全额抵扣的基础上,可以按1—2倍的比例进一步给予抵扣,以及实施技改全额贴息等等。

5. 实施“品牌中国”战略,大张旗鼓地表彰中国制造业中为国争光的各类品牌企业、优秀企业家,对在国际竞争中胜出的企业设立“中国工匠”的表彰制度。

6. 技术工人是中国制造业的顶梁柱,是中国制造的未来,必须大幅度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遇,实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励他们持有企业的股份,跟企业共命运、同成长。

7. 为制造业中的民营企业减负20%,尤其是要降低其融资成本、高额的社保负担、不必要的额外的费用支出负担,同时要打破一切为民营企业制造的人为的进入壁垒。

8. 鼓励中国制造企业从全球价值链底部开始升级,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几个重点城市构建企业总部,据此对外适度转移生产、加工、制造环节,以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在开拓内需中形成国家价值链。

9. 尽快实施严厉的知识产权、专利保护法治，坚决打击各种名义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激励制造企业加大自主知识产权的投资，尽快形成核心竞争力。

10. 大幅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把一些优秀的大学改造为职业技术大学，对它们实施比“211”大学更加倾斜和优惠的政策扶持力度，而不是让办学水平较低的“三本”院校转制为职业技术学院。





均衡协调发展：新时代赶超战略的 关键问题与政策取向

刘志彪

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内容摘要：从追求增长速度到追求高质量经济体系，实现速度与民生的双重追赶，意味着中国发展环境和条件将发生巨大的变革，其中将出现以要素价格不断上扬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趋势。这种成本上升的趋势如不能为生产率上升速度所消化，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力将有所衰减。面对新一轮追赶战略所遇到的可能的挑战，转型面对是惟一正确的出路，但是转型必须找准方向和路径。我们需要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主动积极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把握这种变革趋势所提供的战略机遇，并解决深层次发展矛盾。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一直采取的是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这个赶超战略在十九大后，有了一些具体的变化。

按照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从十八大开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到二〇二〇年，我国将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又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的分析，提出了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这表明，十九大提出的我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比邓小平原来提出的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提前了15年。到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的是现代化强国，显然在目标上上了一个新的层级。

如果把我国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迅速发展，作为从贫困走向基本小康的第一轮追赶战略，而把2010年左右到2020年，作为实现基本小康向全面高水平小康的第二轮追赶战略的话，那么十九大提出的实现现代化强国两个阶段战略，就可以分别看成是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和第四轮追赶。

第二轮追赶战略虽然还没有三年时间，但是它已经塑造了世界的中国经济奇迹，同时也给后两轮追赶战略留下了一些亟需解决的、突出的、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表现为经济运行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等现象。十八大全面启动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要求建成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除了要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经济目标外，在生态环境、民主与法治、文化软实力、人民生活等方面明确了更严格的标准，如提出了社会保障全覆盖、收入差距缩小、医疗服务人人享受、严格环保等新要求。

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的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召开前的“7.26讲话”精神，就是指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指中国经济体系的供给方，对上述人民的需要在数量、质量、结构、空间等方面满足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

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新时代即将开启的第三轮追赶战略将面临怎样的发展环境？这个环境对我国的中长期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根据发展条件的变化，改革发展体制机制，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本文的分析认为：

一、从速度追赶到全面追赶：新时代均衡协调发展的取向

中国是愿景推动的国家。作为执政者的重要愿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根据需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追赶目标。如十六大提出追求 GDP 翻番，十七大提出追求人均 GDP，到了十八大提出 2020 年 GDP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 2010 年翻一番，现在十九大在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对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进入现代化强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标准和要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注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注重追求人民幸福的目标，注重人民对发展的获得感，注重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消费水平以及福利保障水平的决心。

值得重视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虽然没有提出定量的经济增长指标，但是继续坚持“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提法。这里的“发展”，当然绝不是 GDP 增长的代名词，而是意味着增长与结构变化、收入分配和制度变革的共生，意味着过去资源过于集中于经济建设领域而形成的非均衡发展格局问题，必须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予以正视并矫正。例如，不解决收入、机会、公共服务等不平等问题，由此产生的严重社会冲突，就有可能使中国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要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使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提前 15 年，至少体现了两层意思：

1. 未来十几年仍然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GDP 增速仍将是中国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逻辑基石，是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量化指标。因为，2035 年要实现基本现代化，人均 GDP 按现在的币值要达到 2 万多美元。这意味着从 2020 年开始接下来的 15 年中，或者在 2016 年 8260 美元的基础上，经济增长得保持 4-5% 的速度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全球只有日本一个国家持续保持了 30 年的中高速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高速成长了 40 年，但如果把 4-5% 左右的增长速度持续到 2035 年，那么就意味着中国要保持近 60 年的中高速增长。这是全球经济增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2. 中央政策决策者虽然认为要高度重视人均 GDP 达到 8000 美元后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但是在远景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却非常地自信，他们认为，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个陷阱会顺利地迈过。这意味着即使党代会报告中没有提到增长的数量目标，政策决策者也不会容忍未来可能进入低速增长轨道。速度问题仍然是第三轮追赶战略中必须高度重视的、

有一定约束力的硬性政策目标。

应该看到，十九大报告说“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说明全党已经高度认识到，未来的赶超战略是追求增长速度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混合体。速度虽然很重要，但是提高收入、增加福利、改善公共设施等转型发展问题更加重要。为此，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过去，我们的非均衡发展采取的是“扬长避短”战略，倾斜发展某些重点部门和领域，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到了“补短板”、“扬长补短”的发展阶段。在全面实现第二轮追赶目标之前，我们的发展工作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据此来看，由基本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特征所界定的第三轮追赶战略，虽然与以追求增长速度为特征的第一、二轮追赶战略相比，在本质属性上仍然属于追赶西方的现代化战略，具有较大的模仿特性，但在战略目标、政策取向等许多实质性问题，其内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变化概括起来，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发展的社会成本有所提高。人口老龄化叠加对美好生活的进一步需要，低生产率的服务业发展，生态环保由相对宽松变为严厉的治理，社会软硬件基础结构建设的迫切性等等，都会导致发展的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进一步提高。只有突出效率导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消化成本上升的影响。如作为过去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正在被重估，价格迅速提升，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高生产率的美国也已经没有多少优势。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迅速，中国制造传统的廉价优势正在逐步丧失。

2. 发展的动力机制要有所转换。过去推动第一、二轮赶超战略成功的动力因素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增量改革的体制红利消失，存量改革举步艰难。过去低成本要素就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现在不仅要产出成本相对地低，而且还要品质高、性价比高，竞争优势和发展动力来自于创新，来自于产品的差异化，为此必须要加大科技投入，要从汗水经济转向智慧经济。再如，出口导向的全球化动力已经基本消失，依靠内生性需求、为全球提供市场的新一轮全球化需要通过基本现代化

战略来塑造，等等。

3. 经济发展的质量要发生变革。过去是商品和资本双短缺经济，导致发展只要数量满足，忽视发展的质量，忽视产品的性能、忽视服务。现在是商品和资本的双过剩经济，商品供给数量充足，竞争充分，开放度高，低质量供给必然导致老百姓把货币转向国外高质量商品，转向寻求高回报的优质资产的理财活动。前一行为会导致国内经济循环不畅，商品进一步过剩；后一行为会推动资产价格迅速上扬，出现严重的“资产荒”，推动虚拟经济泡沫化。两者的问题最终都表现为效率低下以及经济金融危机。这就是说，要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提升商品的供给质量，提供更多的优质金融资产，以平衡经济发展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

4. 资源配置的规则要有所改变。帮扶弱者、精准扶贫、促进落后地区发展，都要纠偏市场效率标准单一起调节作用的经济发展环境，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社会正义和公平环境建设中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把一部分过去按照市场效率调节的资源配置活动，转化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协调和均衡发展要求。这一资源配置规则的改变，必然在中短期内对效率导向的经济增长起到负相关的作用。



二、新时代追赶战略的环境变化与经济变革的焦点

第三、四轮赶超战略将带领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当然，发展进程存在前景的不确定性，也有可能向我们不希望的方向分化。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的增长轨道。2011年全国经济增长率跌下10%平台，2012年则跌破了8%的平台，现在稳定在6-7%左右。未来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我们不得不习惯于长期面对相对低速的经济增长。站在这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对新一轮追赶战略的环境、变革的挑战和问题的焦点要有清醒的认识。

应该看到，新一轮赶超战略面对的中长期问题有很多，我们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清单，例如，国际环境和市场容量等条件，过去可以支撑中国的全面小康进程，但是作为未来一个大国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崛起过程，不可能再次依靠出口导向，我们如何成为内生性需求大国，在全球提供市场的同时，支持创新驱动国家的建立？再如，基本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三农，三农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是城市化，城市化也是创造内生性需求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城市化怎么搞，是搞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并举，还是搞连绵的城市群？城乡居民公共福利怎么均等化？还有，收入分配政策怎么调整，才能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培育基本现代化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力量？在这一串长长的问题清单中，我选择补短板及其影响这个问题进行重点论述。

实施相对均衡协调的追赶战略，其实就是要重新审视过去忽略的东西，重新在资源配置上把过去非均衡发展战略造就的短板拉长，把过去暂时搁置和未付的社会成本重新补偿回来。做不到这一点，短板效应将会引起社会边际成本的急速上升，从而制约发展水平提高。对于实现全面小康来说，有些短板是避不开的，如农村贫困人口、科技进步水平和生态环境、金融安全的制度短板等。因此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就要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扬长补短”的关键，是要补制度创新的“短”，释放制度性红利。如消除二元结构关键在于城市化的制度设计，生态环境保护关键在于实施绿色产业政策，导致金融危机的潜在风险主要在于法治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关键在于融资体制的完善，等等。总的来说，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也是驱动创新发展的主体，因此要把创新制度的供给，当作政府调结构的“抓手”，政府要通过增加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给市场运行主体创造优良的环境。

“扬长补短”的政策取向必然使潜在的增长空间得到有效扩展，同时也会对中国经济的中短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基本的



影响及其效应可以总结如下：

1. 中国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变革正在形成。近年来，中国上游产业掀起了涨价潮，各类能源成本的飙升，用地价格飙升，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现实因素，叠加上中国版的各种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人口数量减少及老龄社会来临后的家庭抚养比率上升、社会福利程度提高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等，不难发现，追求全面均衡协调发展，尤其是补民生工程和社会建设短板，一方面意味着发展重心的转移和重视追求人民幸福，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将在各种内外生因素驱动下，面临着十分强劲的要素成本上扬趋势。由此必将带来劳动、人口、收入、消费、投资、环境等一系列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消费和福利水平增长，民众环境意识的高涨，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内需、尤其是依靠消费需求的关键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回归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基本途径之一。

2. 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一方面倒逼经济转型升级，同时也会产生内在的通货膨胀趋势。前一种情景正是我们过去梦寐以求的发展环境，即经济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推动力量开始形

成，发展进程越来越接近于人本化的本质要求。过去我们推行的转型升级之所以成效不显著，是因为经济变革缺少这样一种内生的冲击力。但是也应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难以被相应的创新和生产率上升所消化，就必然会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如民众收入的不断提高，将推高农产品、服务消费等所有产出品价格水平，同时使产出的机会成本提高，由此带来经济体系中的连锁涨价反应，以及对物价总水平长期上涨的潜在压力。

3. 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可能会下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意味着企业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促进生产率的上升等创新因素，才能够消化掉成本上升的副作用。这预示着中国将全面进入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的快车道，但由此会导致经济增速的降低。因为：

(1) 低附加值出口导向的企业势必会被挤出国际市场，原来某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会被逼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2) 成本高企的企业如果不能适应将会因此而丧失市场竞争力，出现破产倒闭，这是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也会表现为速度降低；(3) 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选择度增加，企业之间竞争消费者的力度空前



提高，企业投资风险更大，投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4）在过渡到以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直接面对发达国家高竞争力企业的竞争，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由此决定的市场差距，将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

4. 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可能会导致经济滞胀。经济将可能较长期地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滞涨漩涡中。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的历史经验看，化解这种两难选择的惟一途径，就是要尽快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这种转变包括三大方面：（1）减少对第二次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过分依赖，转向更多依赖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2）把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将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互相协调，更多地转向扩大内需；（3）把依赖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赖生产率提高上。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资本和劳动的较大幅度调整，由于要素调整尤其是劳动的刚性，社会可能会出现各类结构性失业。如果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不力，发展的社会保障基础不牢靠，中国就极易可能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从而陷入发展的陷阱。

面对新一轮追赶战略所遇到的可能的挑战，转型面对是惟

一正确的出路，但是转型必须找准方向和路径。对政策决策者来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为了应对要素价格不断上扬的压力，要做的事：

1. 货币政策当局需要控制好新增货币的发行量，实行稳健甚至偏中性的货币政策。这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前提。

2. 在前期“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需要消化的情况下，还需要把需求管理政策为主的政策取向，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调整供给政策，以满足国内不断扩张的有效需求，防止需求外溢，回收过度发行的货币。

3. 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还可以与其他供给改善政策相配合。中国物价的变动，极大地受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波动的影响，这不是货币管理当局能够有效控制的变量，如世界油价问题，粮食进口问题，矿产资源进口价格问题等，都是显著地影响中国物价总水平的重要变量，但是它们并不受中国货币管理当局的自主调节。因此需要从供给角度开拓新的多元化的供给来源，或寻找新的替代解决方案。

4. 为了应对低速增长对就业的压力，必须把发展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低一些的增长率不可怕，可怕的是增长无效率。政策决策者应该追求的是“居



民有收入、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收”的协调同步增长。为此未来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要从偏向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偏向于追求直接关系民生的就业、稳定和反通胀上来，建立和完善各类社保、医疗和养老体系，由此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对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企业压力最大，但是也会给勇于创新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表现为：

1. 收入的增长和消费升级，是企业抓住商机变化的重大战略机遇。为此企业需要研究和开拓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在差异化的细分市场中找到自己商机。这体现了企业战略管理的水平和能力。

2. 以收入增长为依托的内需扩大，必将带来具有本地化生产和消费特征的中国服务业的大发展，率先行动的企业将在各类生活类服务业如养老、医疗、健康、家政、旅游等行业中寻求到重大发展机遇，在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保险理财服务、法律财务咨询服务、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找到新的增长点。

3. 消费的升级和差异化，将给企业以明晰的信号，引导企业沿着创新驱动方向发展，从而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消除

工资快速增长的负面作用；等等。

三、新时代追赶战略的经济政策体系：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十九大报告提出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全面、系统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口的迫切要求，也是在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

1. 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改变长期以来在赶超型旧体制下形成的速度、数量偏好的粗放型发展特征，才能使供给结构较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和不断升级的趋势，才能真正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经济杠杆，加快振兴实体经济。

2. 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大力推进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才能在符合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和新增长点，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同时使传统产业得到更新改造、焕发生机，使落后产业得以淘



汰。

3. 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鼓励各级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和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和机制，才能不断地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4. 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才能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在高水平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创新经济，才能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新时代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路径和基本方略，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1.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从供给端看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是供给的结构、质量体系与不断升级的社会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重大的结构失衡”，从而导致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和运转不灵。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纠正扭曲的供需错配，从而缓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具体的路径和方略上，主要有以下要点：（1）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质量优势；（2）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并形成新动能；（3）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4）加快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促进这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打造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5）加强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外部经济性”，尤其要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2.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第一动力。从依靠投资拉动为主，转向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汗水经济转向智慧经济、知识经济，最根本的标志在于创新要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选择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第一动力和战略支撑后，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舞台上的角色、功能和地位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角色上，会由追赶者变为赶超者，甚至变为领跑者；在功能上，会由技术标准的遵守者和跟踪者，变成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市场地位上，将由追随者和弱势者，变成垄断者或寡头竞争者。这要求我们掌握新技术的源头，必须经历时间更长、花费更多、风险更大、更艰苦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过程。为此，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同时，要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化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知识产权法、企业家精神的作用。

3. 乡村振兴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支撑环节。

“三农”问题任何时候都是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地动山摇，更别论什么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无疑是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有效的方法和路径。十九大报告在三农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亮点，就在于提出了要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必须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另外，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工作。

4. 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空间布局结构的重要路径。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充分，这既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花大力气去纠正的问题，也是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所在。区域协调发展应该根据各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分门别类制定差别化的经济政策：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要用各种扶持政策促进其加快发展；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重塑激励机制和发展动力，使其焕发青春活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对东部发达地区，则应要求其尽快进入创新引领发展的轨道，率先实现地区优化发展，率先启动进入基本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未来应根据“时空压缩、增加密度、减少分割”的经济地理重组原则，鼓励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5.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实践证明，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主要来自于对旧有的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



制和机制的大胆改革和创新。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方式一是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要通过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的管理，适当地减少干预，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做最有效的事情上；“更好”的标准是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方式二是要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对权力清单外的事务要多做“减法”。方式三是“放手”不是“甩手”，为市场活动制定规范，并充当监控者和仲裁者，纠正市场自身的失败；在非市场活动即非赢利性活动中发挥主体角色，为市场发展提供外部经济性。具体的重点任务主要在三个层次上：（1）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2）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垄断规定和做法；（3）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6. 全面开放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自我强化机制。过去近四十年的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全面进步，中国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取得了巨大的红利。当前，新一轮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兴起，中国要利用自己的内需优势，形成发展的

自我强化机制，着力吸收全球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这时候如果国家采取封闭政策，必然会丢失发展的战略机遇、必然落后。十九大报告指出，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不是关闭，而是越开越大，主要是：（1）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引进来和走出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3）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4）通过建立和完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陈柳

江苏省社科院 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就要把发展质量放在重要位置，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通过不断改善供给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一、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主要矛盾在供给体系的质量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新常态的判断在内涵上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准确判断。

供给和需求都可能成为制约经济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经经历储蓄和资本的“双缺口”阶段，较

长时间内制定实施了吸引外资和出口优先的战略，外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和主要人均经济指标都有了长足的提升，中国需求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可以预计，对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正迈向中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来说，未来十五年将是我国消费升级的重要阶段，中国需求对全世界的企业来说都意味着历史性的机遇。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中国经济的矛盾表现在供求两个方面，但主要在供给侧。

与此同时，供给体系的数量和增速已经不再是制约我国经济中长期健康发展的主导因素。近五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当前，在纳入统计的 500 多种工业产品当中，我国有 220 多种产品的产量位于世界第一，很多行业现在产能不是不足而是过剩了。所以，十九大报告向我们描绘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三步走的宏伟蓝图时，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数量指标和增长指标，没有按照以往的惯例



再提出一定阶段内 GDP 翻一翻的目标。

从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通过不断提升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构建国家竞争优势，这是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门。也就是说，经济体系要通过提供适应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动态变化的有效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意义，即解决我国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达不到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产品品质要求的问题，需要促进质量上转型升级，在标准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供给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需求。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认为，“一种产品一经生产，从那一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品开辟了销路”。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历程中，每一次生产力水平的跃迁都创造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

二、当前我国供给体系质量相对滞后的原因存在于多个方面

当前，供给体系质量相对滞后存在着典型的表现：企业总体上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产品的附加值不高；在国际分工体

系中，我国处于国际代工的环节较多，国际知名的品牌还很少；企业粗放发展问题较突出、绿色发展不够，由此导致的生态环保压力较大，等等。上述情况形成的直接原因和表现，毫无疑问是供给体系的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但如果把问题下沉一个层次，则发现当前我国供给体系质量相对滞后的原因存在于多个方面：

1. 供给体系依托的要素结构层次尚不够高。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经济发展的源泉来自于劳动、资本、技术三要素。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衰退，而人力资本的教育和培养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提高竞争力而降低环保和安全标准的情况并不鲜见，蓝领工人在提升产品质量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从资本作用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发展存在多种不协调，资本投入的效率在显著下降，金融资源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存在歧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有提升空间，当前普遍存在着模仿性创新过度的问题。十九大报告中对提升要素水平的问题着重笔墨，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2. 供给体系长期形成的外需导向难以应对消费升级的市场。在中国制造业的国际代工模式中，外向型企业主要服务于国际市场需求，企业或者直接为跨国公司生产中间品，或者生产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中低端制造品。这种供给服务结构的弊端在于：企业按照国外订单生产，专注于加工制造环节，事实上并不熟悉国际市场，企业无法锻炼发现并直接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国际市场持续增长乏力，面对总量、结构到质量均在发生质变的市场需求结构，传统国际代工型企业难以迅速完成角色转换，出现市场把握能力和中高端供给能力的双重不足。受制于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推进国际代工企业转向自主经营、适应国内消费市场升级的任务仍然艰巨。

3. 供给体系的新旧动力仍处于转换期。一方面，传统动力边际效用虽然递减但所占比重较高，表现为制造业中的重化工业部分、房地产业的波动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较大。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抓手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区招商大型工业项目等过去擅长的模式。另一方面，

新生动力边际效益递增但总体动能仍然偏弱，一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等新经济增长强劲，一些新型产品与服务表现出极强的市场成长性，正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引擎。但是，经济新动能与旧动能的替代不会一蹴而就，以房地产驱动为代表的传统发展模式占据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对新兴领域的创新创业形成了毫无疑问的抑制；同时，传统产业中的高附加值部分，比如精细化工、精密机械、特种材料等仍然是供给体系的短板。因此，十九大报告指出既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又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4. 需要进一步激发供给体系中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供给体系的主体是由微观企业构成。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顶层设计调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尤为重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管理层股权激励等方式增强国企活力的举措还没有得到全面推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对民营企业来说，财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相对滞后，不利于增强民营企业对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心。



同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领域在对民营企业开放过程中，仍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隐形障碍，影响了这些领域的市场竞争和供给效率。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人的作用将更为重要，充分调动各级干部、企业家、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是被放在优先位置的工作。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这些都体现了激发供给体系微观主体积极性的重要性。

三、要通过推进若干重大举措化解供给体系的瓶颈

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提升经济质量优势，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总体原则，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下一步改革的重大举措：

1. 市场化配置要素资源。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方能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公平承担市场经营的风险和收益，是市场化配置要素资源的一个前提。就资本配置来说，要真正切割各类融资平台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破解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打破刚性兑付，引导资金从在政府荫蔽下获

取无风险收益进入到市场化的实体经济当中。与此同时，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户籍制度、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对地方招商优惠政策行为的规范，打破区域之间的壁垒、减少区域之间分割，促进人才、资本、技术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

2. 在隐形行政垄断突出的领域加快对内对外开放。服务业是隐形行政垄断和管制最为突出的领域，也是供给体系和产品质量提升空间最大的领域。医疗、教育、文化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服务业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存在较大的差距，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只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让更多符合要求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市场竞争将使得这些领域更具效率，经济质量的大幅提升是完全可以期待的。此外，虽然在特殊行业加强环保、安全等管制成为共识，但也要警惕以环保、安全的名义在可以市场化的领域排斥竞争。做到这些，就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通过竞争实现供给质量提升，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通过支持各类微观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3. 以竞争政策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强化环保等标准，在钢铁、煤炭、化工等领域去除部分产能，



很多不符合标准的小企业退出市场，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行业经济效益有了很大的提升。从发达国家产业组织结构演化的历史经验来看，制造行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市场集中度提升符合历史趋势。通过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升供给体系质量，要在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一方面要仍以适度集中为导向，以市场化的兼并收购为手段，让市场竞争选择行业的强者；另一方面，要重视《反垄断法》规定禁止滥用垄断势力、尤其是支配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情况，消除新进入者公平参与竞争的障碍。

4.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有成分的供给体系在部分领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提升这部分供给效率和质量，要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这就要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让民营企业机制灵活的特点在国有企业也能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让国有企业专注在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同时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

5. 推进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依托的基础设施水平，除了要加强高铁、公路、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要加强重大科学技术和新兴商业模式的基础设施。比如，电子商务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与我们线上支付的基础设施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在科技领域要加强重大科学装置、仪器、系统、网络等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努力实现信息化基础实施的互联互通，为产业的跨界融合创造条件。





建设现代化的服务经济体系

张月友

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IDEI 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虽然没有专门讨论现代化的服务经济体系建设问题，甚至作为关键词，服务业在整个报告中也仅出现了三次。但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表明推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是我国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主攻方向；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创新型国家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的战略部署也规划了我国现代化的服务经济体系框架、建设路径和主要内容。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判断和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这个新矛盾的工作主线，更决定了中国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转向服务经济社会的必然性。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多举措优化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特别是建设现代化的服务经济体系，推动服务业在更高平台上扩量增质，更好地满足人民在服务业领域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对不断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福利水平的追求。

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向服务化过渡的关键时期，服务业

发展也正处于由重视增长速度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的关键节点。建设现代化的服务经济体系既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绿色发展、转换增长动力、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必须坚持总量和结构并重，以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为方向，将推动现代服务业大发展作为突破口，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开放为动力，将打造促进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软环境作为主线，继续用信息化改造传统服务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完善服务业统计制度、构建服务业和谐劳动关系、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扩大民生服务有效供给，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不断推进我国由服务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迈进。

一、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十九大报告第一次出现带服务业关键词的短语。所谓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高人力资本含量等特点。伴随现代技术（尤其是通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服务业领域的广泛运用，我国传统服务业或多或少都已具备现代服务业特征。因此，宽泛标准的现代服务业相当于现代第三产业，只是



名称上反映了服务业的时代特征。当前，虽然我国服务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和新突破，服务业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新兴服务行业和业态层出不穷，服务贸易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但还存在很多突出问题：总体规模和层次仍然不高、有效供给能力仍然不足；结构失衡、地区发展差距较大、吸纳就业能力未能充分发挥；生产率不高、竞争力不强、国际服务贸易逆差明显；部分服务业常陷入自我循环和发展，在面临外部冲击时震荡剧烈，构成损害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风险隐患。

造成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地方政府对弱化 GDP 增速仍心存疑虑，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仍然不高，特别是对服务业行业性质的认识和落实服务业发展政策的思想仍然不统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社会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优质资产供给不足，特别是金融业发展不足。因此，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必要：（1）呼吁社会各界正确认识服务业行业性质，改变针对服务业的落后看法和偏见，纠正那种不加区别、甚至盲目将服务业统统归入非生产性部门和虚拟产业的错误认识；（2）切实将弱化 GDP 考核落到实处，将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到社会发展的战略

高度予以重视；（3）在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着力补齐地区发展不平衡短板，通过改善人力资源素质结构、适度解决初次分配的不公平性问题、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多种要素收入有序分配格局等途径缩小贫富差距；（4）鼓励和引导新兴服务业不断涌现，支持和引导制造业企业进一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格局，分离和外包服务业务，壮大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的产业基础；（5）继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特别是要大力加强金融能力建设，将其作为现代化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深化服务业统计改革

服务业统计是对服务行业的经营成果进行统计核算的行为。服务业统计发展情况影响国民经济核算的准确性、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及相关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近年来，虽然国家统计局大力推进服务业统计改革，改革力度不断加大，数据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服务业统计基础相对薄弱的状况没有根本性变化，尤其是伴随需求升级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变化，基于传统的统计方法得到的数据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各界对服务业统计的要求。前者主要体现在：不仅因服务业统计组织体系分散、调查对象配合度差、企业名录库更新维护难度大等



给服务业统计工作带来的困难一直没有有效克服，服务业统计标准、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与服务业统计任务不相适应的矛盾状况也没有得到大的改善。后者主要表现为：不仅消费服务业统计无法真实反映需求升级后的我国消费市场变化，新兴服务业的漏统问题也较为严重。

针对服务业统计现状和要求，深化服务业统计改革，必须抓住以下几个关键阶段和环节：（1）统一口径和标准，科学制定我国服务业类别和指标，与国际接轨；（2）继续注重发挥服务业统计部际联席会议平台作用，大力推进部门服务业统计工作；（3）按照现行的企业联网直报制度，加强企业统计队伍建设（或向社会购买统计服务），做好名录库更新维护工作；（4）拓展统计调查项目，调研、设计、制定和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加大对基层的业务指导、培训和经费保障，加强经常性常规统计；（5）加强对各类新兴服务业的统计监测和数据收集、测算工作；（6）加大对统计调查资料的开发和运用，健全服务消费统计体系，进一步按行业门类编制和发布服务业发展情况，分解细化“其他服务业”项目，改善和增加服务业统计供给。

三、加快发展消费性服务业

消费性服务业也称生活性服务业或民生服务业，它属于最

终需求性服务业。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民收入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消费方式正由生存型、传统型、物质型向发展型、现代型、服务型转变。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大都要直接体现为消费性服务业供给的丰富性和高质性。而且，消费性服务业还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杠杆之一，对于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促进社会就业和降低性别歧视、增加劳动者闲暇、提高老龄化社会劳动参与率、保证物质财富增长、消灭城乡差别的影响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消费性服务业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两方面：（1）消费性服务业劳动关系相对不稳定，服务产品供给质量和水平不高，消费者满意度不高；（2）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服务业急需补短板。

四、提高蓝领地位，提升服务质量

进入新时代，伴随经济结构日益朝着服务化方向调整，中国农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就业已经饱和，而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消费性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性行业。然而，我国消费性服务业每年新增劳动力多是中途辍学的年轻人和中、高考的“淘汰生”。他们受教育程度偏低，不具备高技能，与资方的劳动关系松散、不规范，甚至常被误认为天生“素质”较低，所获得的薪酬、劳动条件和职业保障较差。另外，由于消费性



服务业大多具有服务生产和消费同时性，与制造业蓝领工作只需对事不同，消费性服务业蓝领工作常常既要対事又要对人，他们的工作经常要经受“服务订单”、管理人员和顾客的三重压力，任务重、风险高，有时甚至要独自承受不被服务对象和大众所理解和尊重的苦楚。消费性服务业就业的这种尴尬处境导致优秀的年轻人通常只愿成为该行业的临时/过渡性蓝领工人。即使是长期性服务业蓝领工人，他们对自己的职业也普遍缺乏认同感、自豪感，自主性提升对顾客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积极性不高。为改变这一现状：（1）必须在全社会营造一种职业平等、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切实提高蓝领工人的薪酬和社会地位；（2）依法保障服务业蓝领工人的休息休假、安全卫生等基本权益，健全服务业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制，构建消费性服务业和谐劳动关系；（3）以提升服务质量为核心，发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服务。

五、解决教育养老医疗和住房等民生服务难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其中涉及教育、养老、医疗和住房等民生服务业的主要任务和举措有：（1）优先发展教

育事业，特别是要继续推进教育公平，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3）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4）完善社保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5）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6）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六、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

服务业作为关键词，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出现在十九大报告的“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和“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短语中，合起来就是改革开放，就是“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以开放促改革”。服务业的改革开放问题主要涉及生产性服务业。

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指那些依靠高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部门。它是现代服务业中最积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核心是高级生产性服务，如金融服务、



商务服务、信息技术与通信服务、教育培训服务、物流服务、旅游服务、外贸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方式，推动创新驱动国家目标的早日实现。近些年来，我国虽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但由于管制垄断和竞争不足等问题较为严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仍然存在供给不充分、创新活力不足和发展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and 战略，仍然要归结为“对内对外开放”几个字。具体来说：（1）加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服务业市场体系建设；（2）以法制化的方式维护服务业的市场秩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3）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取消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准入限制；（4）进一步对服务业放松管制，简政放权，推广一站式审批、一个窗口办事；（5）打破各种地区市场分割和壁垒，推进服务业企业并购和资产重组；（6）加强对生产性服务业管制监管，明确生产性服务业管制者的责任和义务，提升管制政策的法治化水平；（7）政府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具体手段应当更加市场化，改变充当裁判员角色的“扶强创优”做法；（8）鼓励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积极开展国际服务贸易，同时，

鼓励有实力的服务业企业实施逆向外包战略。

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是由政府和非营利社会组织提供给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纯公共服务。近十余年来，我国各级各类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但仍然存在规模不足、质量不高、发展不平衡等短板。突出表现为，公共服务产出水平低和严重的资源非均衡配置问题。造成公共服务产出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型缓慢。造成严重的资源非均衡配置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公共服务职能升级滞后、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和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导致基层政府保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城乡之间，特别是对农村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供给不足。

因此，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方向和主要任务如下：加快推进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鼓励发展志愿和慈善服务，推进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推进对贫困人口及家庭的精准识别和大力帮扶；继续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确保新增市民特别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供给和



均等化共享；进一步加强城镇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并轨；进一步改革税制，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在提供各类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取消税收返还，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科学制定转移支付标准。

最后，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均等化的内涵既指机会均等，也指结果均等，而《“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将促进机会均等作为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这是客观认识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承认区域和城乡差异的权宜之举。但必须承认，相比机会均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结果均等更为重要。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民生和就业 的几个关键问题

沈凯玲

澳洲国立大学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觉得这个判断内涵深刻，美好生活与民生、就业政策关系密切。美好生活不仅包括收入高，还包括身体健康、子女成才、老有所养等。这些都是要个人与政府花钱的，而且很多时候等问题严重了，花钱也未必解决。

从这个角度看，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在政策层面即使未雨绸缪，但至少对利弊做到心中有数也很有必要。以下是我觉得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思考。

(1) 经济学中通常认为生产的主要要素包括资本（机器设备，土地）和人，这两者通过一定的技术相互配合实现生产。人，作为社会生产与家庭生产不可或缺的要素，与资本、技术在属性上有很大不同。人的生产需要家庭、婚姻（至少绝大多



数，数量受到上一代人的婚姻与非市场时间的制约)，人的生产需要长时间的教育培养才能够成熟（周期长，成本高），人有生命周期（人会老，其体力、精神都会衰退）。哪怕在短期内，人可以工作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每个人一天的绝对时间都是 24 小时，不会因为资本的投入而有大的变化）。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鼓励多频短期休假（一张一弛，有节奏的休息，改善工作时的体力、精神状态），延迟退休，缩短正规教育时长、提高教育系统的时间利用效率，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低效率的办事流程、减少文山会海、以及通过评估调整现有工作制度的时间有效性，都是更充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存量，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可行之策。

爱惜、节约使用当前的人力资本，不仅是社会生产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经济发展后劳动者需求的趋势。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措施都有利弊，成本收益测算必不可少。世界上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人与资本的最优匹配方式可能也不同。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也在提高，相对而言人们对有限的时间的珍惜程度也就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

新时代提高各项工作的时间利用效率的原因。这类措施对于提高劳动力有效供给短期内见效快，长期有益。

(2) 制造业与服务业对劳动力的要求不同。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需要的劳动力的“规格（知识结构、技能组合）”比较统一。这是因为传统制造业的技术依赖于大型机器设备，需要很多人在相同的时间、协同努力。与之相对应的教育也必然是标准化、结构化的，人的差异性的优势则体现较少。劳动力的服务更多的是体现在标准化的物化产品中，职业资格证书、工作年限等等是制造业对劳动力投入标准化要求的反映。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我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是制造业大国。当然，随着增材制造、智能制造等新技术的应用，劳动者的个性化也可以在制造业中产生潜在价值。但至少现在，制造业主要需要的还是标准化的劳动者。

另一方面，服务业因其服务对象就是广大人群，对劳动者能力、个性天然有多样性的需求，这也适应了部分人群劳动供给的特点与其内心动力。此外，服务业在劳动力需求上有更强的弹性，其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安排等可以根据劳动力供需结构与数量灵活定制，这都与制造业形成互补，为充分利用全部潜在劳动力资源提供了可能。但不同于制造业可以



相对低成本的以时间与产品产量来评估劳动者的付出，服务业要评估劳动者付出的努力的成本则可能更高(因为其劳动的多维性，难以简单线性量化)，这方面虽然有一些新技术，比如抓屏，但总体而言仍然依赖于劳动者的内在动机。这也就决定了服务业中劳动者与企业的利益需要更紧密的联系(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甚至劳动者同时也是企业的所有者。这些特点也决定了服务业中劳动者收益的波动性与其在制造业中有所不同。因此，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工业化国家的社保制度设计有必要适当调整，以包容、面对服务业就业的特点。当然，由于服务业就业的灵活多变、观测难度大，其对社保制度的防滥用措施的要求也更高，对劳动者诚信的要求也更高。

此外，服务业中的核心竞争力是对服务对象的深刻理解。这就要求服务提供者在兴趣爱好、知识结构、认知能力、生活阅历等等与服务对象相匹配。相应的，服务业要求的劳动者群体必然是多样性的、个性鲜明的、互补性强的。任何大众化的、标准化的教育体系是难以适应对劳动者群体的如此要求的(即，需要各种异质化的教育提供)。适应服务业要求的劳动者群体必然需要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积累、培养其人力资本(比如旅游、游学、甚至不断尝试各种兴趣爱好等等)，这同样要求劳

动者群体始终有意识的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保持联系，而不总是在“工作”中。休养生息对于服务业就业者尤其重要。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随着收入增加而会持续增加，但这种对服务业的需求确实对价格相对敏感，也与家庭内部生产有更强的替代性，而且很大一部分服务业是不可直接参与国际贸易的。因此，服务业的效率提升很大程度上不直接作用于改善贸易平衡。服务业更多的是吸收多样性的劳动力就业，通过减轻家庭生产负担而释放更多劳动力资源给制造业，促进国民收入的更加均等，宏观经济更有韧性、对各种局面有更强的适应性。

对就业搜寻而言，由于服务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与难以测度性，服务对象与服务者之间的搜寻匹配的难度更高，因此为了更有效利用现有人力资源，需要数量更多、信用更好的中介机构或团体组合，这也就解释了如滴滴这类平台产生的内在动力。当然，这类平台也将个体对服务需求的微观上波动极大，通过在时间、空间上的汇总而实现宏观上的平稳，从而降低了服务业劳动者收入的风险。

事实上，服务业也有很大潜力为长期、可持续的改善国际贸易收支做出贡献，比如游戏、旅游、音视频、产品设计甚至



医疗、教育服务，通过满足国际消费人群多方位的需求，一国不仅可以在服务业的出口中实现经济效益，还可以建立自己多元化的形象品牌获得巨大的无形资产，甚至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吸引各国人才，变现其国内服务业优势。

(3) 在考虑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时，也应综合考虑养老退休制度。养老金的发放虽然意味着短期内的财政成本，但如果能在提供合理养老金的同时消除更多工作年龄、生育年龄段的人口对今后养老的顾虑，则有可能释放更多的消费需求，提高生育率。需要指出的是，养老退休制度不仅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调整养老金、退休金，还可以通过高效率的服务业实现老有所养。随着健康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对服务者的需求也在变化，甚至可以成为服务的提供方。这方面可以有很多灵活性，但首先需要制度的灵活性，避免不必要的负面激励，不要让提前退休成为个人收益最大化的选项。

(4) 最后，在为新时代而兴奋之余，可能还需要警惕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出现小富即安、骄奢淫逸的风气。这都会加剧我们当前面临的劳动力供给总体数量不足、总体质量急需提高、构成相对同质化的问题。应该通过提高服务业效率，让更多潜在的劳动者走出安逸的家门；应该认识到随着全球整

体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很多发达工业国家经济面临各种困难的背景下，各国的劳动力大军都不得不努力积累其人力资本。无论国内国外，未来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只会更加激烈残酷，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合理安排让劳动者在当前工作之余可以持续接受新信息、掌握新知识、形成新认识，从而培养一支长期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大军。

(5) 促进合理的人力资本回报体系，反对简单化看待收入不平等。一国对流动性强、各国争抢的成熟高端人才给予高收入是国际化、开放经济体必然需要付出的成本。另一方面，为多数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又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国内消费需求，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当前的国际情况下，通过对出口企业直接提供补贴已经面临很多困难与反弹，但一国可以通过对不可贸易的教育、医疗进行补贴，降低企业成本。这一方式虽然间接，但大多数人直接受益并感受得到。如果我们相信政府对市场的了解不如第一线的劳动者，并能够接受企业的新陈代谢是提高整体经济实力的重要方式，那么投资于劳动者的教育、医疗健康则是当前形势所需。事实上，很多人移民到国外也就是因为其对于高质量基本服务的需求。相信我国有能力、有实力、更有效率地提



供这类基本服务，这样的投资也将会使得我国更持久地保持可贸易产业的竞争力。当然，任何这样的投资必须要量力而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6) 美好生活关键在“美”。只有劳动者有对“美”的感知、认可，创造出来的产品、提供的服务才会让使用者、服务对象心情愉悦。“美”意味着为别人喜欢，它的具体特点可以是自信、勤劳、智慧、诙谐、包容、健康、优雅等等。“美好”的形象不必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环境成本，但一旦被大家接受为“美好”的国家，“美好”的企业，其收益是长期持续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必要将和谐美好的理念融合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孩子抓起。



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与创新型经济的培育

王建国

日本中京大学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到 2035 年让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宏伟愿景，指出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时期，创新将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九大报告阐明了实现这个愿景的基本途径就是，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基础上，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工匠精神，促进更多社会主体投身于创新创业，建成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除了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积极进取与不懈努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经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学习与吸收。与发达国家相比，制造业方面，我们尚不具备在高附加价值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主要核心技术依然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产生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制造企业中，能够熟练掌握生产技术的员工依然匮乏；



中国的国民经济构成中，勇于在高新技术领域创新创业并取得成功的企业依然不多。如何弘扬工匠精神以促进生产企业中的员工们熟练掌握更多的技术？如何激发人们的企业家精神，促成更多的人们投身于创新创业？我们依然可以不忘初心，继续学习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

纵观当今世界，掌握高新技术最多、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而制造业方面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是德国与日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能否对他们的长处兼收并蓄？这个问题答案的探寻，应从这些竞争优势的形成机制与条件的分析着手。

一、弘扬工匠精神促进产业转型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人们工资水平的提高与人口红利的减少，我们的资源禀赋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开始转变策略，正将其生产基地逐渐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其他国家，或者通过在其国内大幅度提升劳动生产率而推动生产基地重新回其本国国内，所以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很显然，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形态将越来越不适应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中国必需实行产业转型，从使用廉

价劳动为主的低附加价值产业转型到能够生产更多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形态。而实现这种产业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我们的企业必须累积更多的技能。而这种技能的积累与开发又与员工们的工匠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工匠精神，体现为人们对职业的敬畏和对工作的执着，他们为顾客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对质量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极度注重细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力求给客户提供无可挑剔的消费体验。

在现代企业中，自动化的机械将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分工合作的科学管理让人们的工作内容变得更为简单易行。但是，现代产业中很多产品的高附加价值，依然与它的生产者所具有的精湛技艺、以及他们那种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又为现代的工匠精神增添了重视协作、锐意创新的新特征。

德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他们制造的产品以精致、高质量、高性能著称于世。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对现代的工匠精神有着足够的重视和尊重。这两个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工匠精神、技能的培育与社会的教育体系、企业的组织形态和



激励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体系是如何注重从小开始培养学生们的工作技能与工匠精神的呢？先从孩子们价值观形成这个角度观察，在中国如果你去询问一个孩子长大以后的梦想是什么？通常多数的回答都是高大上的，想当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大领导的比例一定是最高的。而在德、日这些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却会以“平庸”居多，想当一个厨师、理发师、建筑师、医生、服装设计师或者开一个面包房等的孩子为数不少。

为什么这些发达国家的孩子抱有的梦想如此“平庸”？这和他们所处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伦理道德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把自己在尘世间的劳动作为上帝赋予的“天职（calling）”是新教（基督教）伦理中最为基本的部分，每个新教徒都把努力工作作为自己的道德义务，他们要通过由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成就来证明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从而使自己的灵魂获得拯救。

在中国的文化中，沿袭了千年以上的科举制度对我们的教育带来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出人头地的思想依然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直到今天的教育，即便是

财政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也以倾斜于“重点建设”为常态。而这一种“旧常态”的教育制度、又直接引发了以升学率为中心的应试教育的盛行。

不同的价值理念导致不同的社会教育，德国的教育体系，为了让孩子们成人后适应现代工业的理性的组织方式，特别重视职业训练和职业教育；全社会尊重技术工人，不盲目追求高学历，约60%的青年都不上大学，而是在接受了2-3年的专业化、标准化的职业教育后进入社会。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上学期间有一半时间是在工厂实习，毕业后可以直接成为技术工人。

而在大学升学率较高的日本，职业高中的比例也在百分之三十左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的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一直都有与职业训练有关的课程设置。比如从小学一到六年级课程中的“图画工作”课，其教育目标被（日本文部省）规定为“通过表现与鉴赏的活动，在激发学生感性的同时使他们体验到劳动创造的快乐、同时培养他们从事组合造型类创造活动的基础能力与丰富情操”，而中学阶段的必修课程“技术·家庭”的教育目标则是：“通过生产活动的实践性与体验性的学习活动，掌握有关材料与加工、能源转换、生物培育以及信息通讯



的基础知识，同时进一步深化学生对他们与技术、社会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培育他们正确鉴定与应用技术的能力与态度”。

再来看看日本的企业内部又是如何培养员工们的工匠精神与技能的。首先，从现代工业生产与技能的相互关系开始分析，二十世纪初叶开始，随着科学管理的进步，分工型合作已经成为公认的“高效率”生产形态，传统匠人的复杂劳动被合理地分割为“简单的标准作业”，并通过各种生产计划合理地统合起来。由于“科学的”管理体系中，复杂的匠人技能，通过科学的测定和定量的分析被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的标准作业，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似乎觉得工匠技能被科学的管理方式所替代的时代已经到来。然而，这种想法却被为日本赢得经济腾飞的日本企业管理实践所打破。

科学管理方法的主要弊端，除了漠视人性、使工人沦为机器人的附庸这个伦理性问题以外，还在于这种机械化体系内部协调性的缺乏、以及面对市场与技术变化的应变性不足；还在于倚重外部观察的作业研究本身对于人类作业行为的无法完全解析。

卡尔·尤里奇把现代制造企业中的各种作业之间或各种零

配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粗分为模块型（modular）和耦合调整型（Integral）。传统制造业的主要技术以后者居多，各工序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调整是必不可少的。科学管理的标准化“简单作业 + 生产计划”的方法，把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过于简化了、机械化了，尤其是当外部市场与可利用的生产技术发生变化的时候，为了达到最优效率，旧有的分工与计划都必须推倒重来。可是作业内容的更改，不仅需要付出更多的培训成本，还与欧美社会根深蒂固的契约主义精神相抵触。

在归属感远胜于契约精神的日本企业，分工的界限变得模糊、小规模的作业群体替代了科学管理的“一人一岗”；“现场主义”取代了欧美式的“专业化合理主义”。在他们的工作现场也有作业标准，但作业标准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日益改善的。这种作业标准的改善，不靠远离现场的工艺专家做决定，而是由亲临实践的工人们从其切身感受出发，经过内省思考而提出。日企内部的这种改善既是细致的、也是可以追踪工作现场内的变化而随时进行的，而这种细致而又敏捷的改善恰恰是“科学管理法”之力所不能及的。

日本的所谓现场主义，就是倡导要到发生问题的现场去分析原因，找到问题的关键点并寻求对策。这种现场主义之下，



员工们对于技术的熟练掌握是通过“边干边学”(OJT)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循序渐进、日积月累而获得的。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企业的工作现场就像一所职业学校,分析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方案的各类活动小组的活动报告张贴在各个作业群体在工作现场设置的壁板上。日本企业的“精益求精”机制也正是现场主义与这种“组织学习”相结合的产物,例如,在丰田的“精益化生产”方式中,除了广为人们所熟知的“零库存”(Just In Time),还有以“自働化”为起点的改善活动。“自働化”概念与一般的“自动化”有所区别:一旦自动流水线上出现问题和故障,机器和生产线就会自动停止。对于出现的问题,他们追究的不是当前问题的表层解决,而是要求通过五次“为什么?”的询问去刨根究底地找出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提出防患于未然的改善措施。这种对问题的深究和不断的学习思考,才使他们得以通过“将质量做入产品之中(即不因上一工序生产的次品流至下一工序而导致其所有后续工序的浪费)”实现对“质量与效率不可兼得”这个悖论的突破,以优质廉价赢得了世界市场。

日本企业中重视现场主义的“组织学习”还以循序换岗的形式促使员工们所掌握的熟练技术从单一到多样,从简单操作

不断升华为对变化的适应、对问题的解决和对工艺的创新。他们不但培育了员工们善于应对变化、解决问题的“知性技能”，还提高了员工们的创新能力。现代的日本企业，正因为确保了他们的员工具有这种“知性技能”和创新能力，才可以做到在快速应对技术与市场变化的同时又高效率地用同一条生产线同时生产出十几种不同产品来；才可以使他们的工艺过程不断地获得改善。

从激励机制的角度来看，日企中员工们努力学习不断创新的热情，是与日本传统的“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相辅相成的。“终身雇佣”使他们有了归属感，可以安心于磨练自己的技术，而以经历各基层工作才能得到提升的螺旋式的升迁制度又使他们很乐意去接受更多的学习，获得更多的技能。许多日本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都挂有一张“skill map”，上面标明了每一位员工所获得的各种资格与技能等级。这个“skill map”不仅被作为人事考核的依据，也能起到激励员工们努力获得更多技能的作用。

借鉴德日的经验，为了使产业转型获得成功，我们弘扬工匠精神，首先应该在全社会树立起重视工匠、尊重工匠的价值意识；同时还应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使人们从义务教育阶段



就能学到更多的生产活动中的基础技能，增强他们对生产技术的理解与应用能力，陶冶他们尊重生产和劳动的情操，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职业观；而企业管理应该重视民主意识，在保护员工们主人翁意识同时，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促进他们获得更多的“知性技能”，鼓励他们参与到各项工艺改革中，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二、激发企业家精神赶超高新产业

在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中，德国与日本无疑是遥遥领先的。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蓬勃兴起的高新产业领域，引领世界前沿的则是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日本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其“工匠型创新”的局限性。比较一下美国的硅谷模式与丰田汽车为代表的日本制造业模式，就会发现两者有显著的不同：强调工匠精神的日本，擅长于维持现行秩序下的渐进性创新，这种创新主要见于生产流程的改进之中；而强调企业家精神的美国，着重于从无到有的或带有破坏性的突破型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为产品的创新，较多地出现于技术和市场变化迅猛的新兴产业的初创期。

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开辟新事业领域所必须的精神。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他们善于想象、勇于探索、探求商机；

一旦发现商机，他们又能不惧风险、果敢创业。

一个社会中，企业家精神的枯荣与创业活动的盛衰密切相关。充满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创业活动生气勃勃，而通过创业获得成功的榜样越多，企业家精神就越会得到激励。因此，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光大，只有在它与创业活动的相互影响进入良性循环之时，才能得以实现。

美国的硅谷模式，正是将企业家精神与创业成功纳入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之中。硅谷模式的成功例子通常都是：异想天开而又一无所有的天才科技精英与腰缠万贯的所谓“天使投资家”的成功结合，开创出一种崭新的事业或者新的行业，从而获得了双赢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结合中，年轻人异想天开的知识被得到充分的估价与认可，这种认可不仅体现为获得了投资者的投资，而且还以“股票期权 (stock option)”的形式，得到肯定和保证。所谓股票期权，就是赋予创业者在一定的期限内按照某个既定的优惠价格购买一定公司股票的权利。如果企业获得成功，创业者有权在一定时期内以既定的低价购入公司的股份然后按市价售出以获得巨额的差价。

股票期权既是一种对创业构想的承认，又是一种前瞻性的



激励机制。因为只有当公司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市，并且其市值上升越多的时候，享有股票期权的人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是一种风险与机会并存的激励机制，因为公司上市的那一天就是员工得到报偿的时候。

“风险基金”或“天使投资”机制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创业门槛。同时，“天使投资”者们通常都是创新创业的成功者，他们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和丰富的创业经验，因此他们又是创业者们的事业导师。这些导师并不直接干预创业者的经营活动，而是在创业者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失时机地为他们提供咨询和帮助。

硅谷模式中另一类的创业企业，是由企业内创业（entrepreneurship）衍生（Spin-off，又称为剥离型创业）、裂变（Spin-out，又称为独立型创业）而来的。这类创新企业的母企业基本都是技术创业成功的企业，所以具有鼓励创新的文化。他们通常鼓励员工们去开掘新的事业，比如谷歌公司就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惯例：工作任务通常只需投入上班时间80%的精力就可完成，剩余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而公司内部设有催化创业的“孵化器”，对于员工提出的有价值的事业设想，给予足够的扶持、指导与服务。

硅谷还是一个创业的摇篮，那里有面向创业的各类服务公司：有提供办公场所的、有帮助实施市场调查的、也有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这些服务提高了创业者的工作效率。

创业是有风险的，高风险高收益是硅谷模式的又一个重要特点。“风险基金”或“天使投资”机制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创业者们的创业风险，通常情况下创业者们需要承担的风险是创业投入的时间与精力的浪费，而在硅谷模式里，有过创业失败经验的人反而更能得到正面的评价，因为投资者们相信：正常人都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失败意味着当事人离成功更接近了一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创业者可以毫无风险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将要建立的事业将会遇到怎样的风险。风险意识越强的创业者，越能获得投资者的信任。

借鉴硅谷的经验，要在中国激发出更多的企业家精神，引发更多的创新创业企业，就应从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创业门槛和提供更多的创业服务这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1. 投入于创新型创业企业的新技术或新思维是该企业的生命之种，如果被人轻易模仿，事业就会夭折。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因此，为了促进创新创业，从法律制度层面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尤为重要。不



仅如此，创业者也须对知识产权的制度与内容有一定的理解，对知识产权的有效性与成本具有足够的认识。

2. 硅谷模式中发达的“天使投资”与“风险基金”，对于降低创业者的投资门槛与经济风险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目前在中国，“天使投资”或“风险基金”尚不十分发达，主要因为掌握资本的个人或组织，大多数没有亲身经验过高风险高回报的创业并从中获得成功，因此他们对这类投资在认识和经验方面都有一种先天的不足。

中国的大多数创业者所遇到的第一个门槛，依然是资金匮乏。资金的制约不仅体现在已经掌握了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创业者难以找到愿意一起承担风险的资金支持，还体现在有些新技术的萌芽，因为支付不起昂贵的实验测试而夭折。

近年来，中国的各级政府在解决这类问题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做出了不少的努力，比如兴办各种创业园、孵化器、对各种技术创业项目予以资金方面的奖励等等。

然而，这种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创业促进工作，在许多方面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造成这种低效化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重蹈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覆辙。

技术创新的创业，在开拓市场方面通常都会遇到很大的不

确定性，事前无法给出一个客观而又确定的评价。为了公平起见，政府对于创业项目的评估，往往以技术方面的评估为主，从大学等科学技术权威部门请来都是技术方面的专家。对于创业项目的政策性奖励，通常不像投资决策那样重视投入的回报率。实际上，这种投入通常都是低效的，因为政府官员、技术专家和学者们并不都懂得市场。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类投入不讲回报，打了水漂也无从追责，反为权利寻租提供了不少可能的空间，这是需要警惕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动员民间资本的进入。政府支持可从直接奖励转向间接扶持，比如按一定比例出资参与对区域内创业项目投资的风投或天使基金，既可以降低主要投资主体的商业风险，又能使政府的投入与市场挂钩起来。

3. 硅谷模式中，面向创业提供服务的企业组织与团体之多，大大提高了创业者的工作效率。而在中国，这种面向创业提供服务的民间机构却是寥若晨星。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各级政府在建立服务于创业行为的平台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考虑到技术条件薄弱这个瓶颈的影响，创业者需要的通常并不只限于诸如提供办公基地，以及商业、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等等的那种“孵化器”式的服务，更需要的是技



术方面的服务与支撑。

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战后日本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依仗于它们具有很多持有独特核心技术中小企业。而这些地方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日本各地方政府建立起来的“公设试验研究机构”贡献密不可分。这些研究机构，不仅以低廉的价格为民间提供高精度的技术测试仪器，还为使用者提供指导、咨询服务。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政府提供的技术服务的支撑，日本扶持起许多具有世界一流技术的中小企业（不过，这种中小企业的市场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与硅谷模式中的高新科技企业还是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为了在中国激发起更多的企业家精神、造就更多的高科技创业，以在高新产业领域赶超欧美，政府应该做的工作就是要将自己的职能从一个居高临下的父亲角色转换到以提供服务为主的方向上来，这样才能使创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得到更为有效的促进。

三、企业家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并驾齐驱

20世纪初到现在，工业化国家出现了三种重要的生产模式，各种模式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起到了引领人们通过经济活动创造巨大经济财富的作用。这三种模式分别是：以高

效率而著称的“福特—泰罗”模式；以高质量、高效率又善于应对市场变化而赢得赞叹的“日本模式”和以高科技、高风险、高回报为特征的“硅谷模式”。每种模式的成功，都是因为这个经济模式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其他经济社会条件互相适应的关联方式。

然而，成功的经济模式往往带有惯性，要在同一地区、同一社会或同一企业实现模式转换，通常并不易于成功。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 GM 为了导入代表“日本模式”的丰田生产方式，与丰田公司合资在美国加州弗里蒙特设立了一个合资企业 NUMMI，全面采用丰田公司的方式进行生产管理，提高了两倍的生产率，但是 GM 未能将 NUMMI 的经验推广到其他既有的工厂。同样地，进入 21 世纪以后日本政府致力于在日本推广硅谷模式，从财政投入到优惠政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效果依然是不尽人意。

中国是一个刚刚步入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生产方面尚未确立起一个比较成功的模式。可这种劣势其实也可转化为优势，因为我们没有成功的包袱可背。我们可以学习最先进的模式而取得后发性优势，实行制度创新。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目前传统制造业领域中最为先进的是德国与日本的模式，而在



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占有优势的是美国的硅谷模式。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创新内容和方式的不同，为了建立起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经济体系，我们可以对这两种模式兼收并蓄，让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并驾齐驱。



推动虚实平衡，强化实体经济发展

王宇 刘志彪

南京大学商学院

十九大报告指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而实体经济既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着力点，又是打造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素之一。切实提高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是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抓手，也是解决我国当前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关键点。

一、关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泡沫经济的界定

以往很多人习惯用经济活动的形式来界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认为由于一二产业生产的是有形的物质产品，因此天然是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由于价值占比高，更是被看成实体经济的主力。而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往往提供的是非物质性的服务，尤其是金融业经常被认为是虚拟经济的主要代表。

但是，单纯按照生产方式来界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我们认为区分的关键在于经济活动的性质：能否为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提供有用的产品和服务，并最终创造社



会财富。如果经济活动能够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就应当将其划分为实体经济，但是如果仅仅是影响财富的分配而增加财富总量，那么这样的经济活动就可以认为是虚拟经济。在现实的经济中，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并非总是界限分明，很多时候存在着相互重叠甚至是相互转化的情况。以房地产业为例，用来住的房子就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而用来炒的房子尽管也是实物，但是却属于虚拟经济。

关于泡沫经济，我们认为它是指超出市场真实需求的那部分无效供给活动，因此判断泡沫的标准为供需是否平衡，与生产形式和生产性质也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都可能存在泡沫经济，前者的代表性例子是产能过剩，而后者是次贷危机。

二、实体经济发展遭遇困难的成因与表现

我国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可以总结为“实体经济过虚，虚拟经济不实，虚实分裂对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导致了虚拟经济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不仅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反而后者对前者形成了严重的挤压，虚实失衡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经济质量不高，发展动力不足。

1. 实体经济的许多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泡沫经

济的比例居高不下。一方面以钢铁、水泥和煤炭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严重闲置,另一方面产能过剩现象也逐步蔓延到风电和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超额供给导致恶性市场竞争,因此实体经济部门的盈利率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伴随着要素成本的持续上升,许多实体企业亏损加剧,为了避免大规模的企业破产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等问题,产能过剩产业只能不断依靠银行输血来勉强维持,形成了一大批的僵尸企业。这一结果的本质就是社会资本未被用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与服务,不仅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反而形成了大量低回报甚至是负回报的资产,制造了许多低质量的无效供给,实体经济内部出现了泡沫化的趋势。大量社会资源被锁定在低效率行业,不仅遏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在实体经济内部持续积累风险,一旦泡沫破灭就会导致经济危机。

2. 制造业只长“个子”,不长“脑子”,实体经济难以从“汗水经济”向“头脑经济”转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充分利用了第一波全球化的发展机遇,从低端切入全球价值链,通过持续的大规模投资,迅速地实现了生产能力的扩张,经济常态从商品短缺转变为商品过剩。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制造业规模上全球领先,但是在利润率上却排名靠后。伴随着资源和



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只注重“体量”发展、不重视“内功修炼”的模式也让制造业发展面临瓶颈，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以及国内消费升级的双重压力下，很多企业由于缺乏核心专利和创新能力，无法转型进入高端消费市场，只能在低端市场中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企业在内源性创新难以突破的同时，在获取外源性创新上也存在障碍。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的缺失，一方面造成大量的科研活动并不关注市场需求，创新活动变成了智力游戏；另一方面企业的真实需求难以反馈到科研院所，大量的专利和成果难以走出实验室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3. 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形成体外循环，泡沫的持续积累和扩大蕴含着潜在的金融危机。实体经济的低回报率导致资金涌入虚拟经济，社会资源没有在虚拟部门和实体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和交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部门形成了体外循环，事实上形成了大量吸收货币资金的黑洞。政府的货币供应难以真正转化为现实的流动性，无法形成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最终对消费者需求和内需的扩大形成抑制作用，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大量资本沉淀在虚拟经济内部循环中，就意味着包括研发等在内的生产活动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这种资金抑

制又会进一步使企业难以实现自我造血功能。虚拟经济中泡沫部分的持续扩大，本质上是由于当前的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缺乏导致社会资本只能通过相对单一的渠道追逐稀缺的优质资产，因此资产泡沫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钩发展，会进一步导致全社会负债率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并且由于大量企业事实上丧失了有效地偿债能力，以及政府负债中土地抵押的过高比率，这样的债务结构很容易诱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4. 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割裂，新动能未能有效拉动旧部门。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面临着双重任务和考验，在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这既是国内市场不均衡发展及消费者需求多样性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不能完全抛开现有的传统产业来重起炉灶，而要立足于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来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在这一轮的互联网信息革命的浪潮中，我们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企业。但是，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经济形式并没有和传统产业形成良好的互动与融合，新旧产业之间的绝缘式



发展，一方面让传统产业丧失了利用新技术为杠杆实现升级的机遇，另一方面也让新兴产业难以迅速克服市场和资源瓶颈来发展壮大。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事实上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市场机遇，新兴产业的发展如果能通过技术扩散，实现新旧产业的联动与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革命，应该成为联系新旧产业的技术纽带，否则也很容易造成新兴产业的泡沫经济和脱实向虚。

三、振兴实体经济的思路与举措

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发展失衡，以及实体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因此，振兴实体经济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在引导经济发展脱虚向实的同时，推动以虚促实和新旧产业融合。具体来说，我们提出以下几点举措建议：

1. 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挤出实体经济中的多余水分。政府在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的过程中，短期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遏制产能过剩的持续恶化，但是从长期来看更应该让市场机制来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让市场竞争来实现优胜劣汰，因此政府应该更多地采用环

保政策和竞争政策等市场化手段来化解低质和无效的生产能力。具体来说：（1）坚决纠正不合理的财政补贴方式与政府兜底的融资模式，不允许在增量部分继续出现无效供给，要让微观主体承担市场竞争的后果；（2）针对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政府要坚决停止财政输血，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同时可以采用债转股和专项技术补贴等方式帮助部分资质较好的企业实现技术升级；（3）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鼓励行业中的优势企业对亏损企业进行收购兼并，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行业利润，为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提供足够的利润空间。

2.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要成为创新活动的主体：（1）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他们在市场开拓上锐意进取、在产品开发上敢于尝试以及在组织管理上勇于革新；（2）弘扬精益求精和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让那些具有很高创新能力的技术工人既能收获切实的物质回报，也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3）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全面保障知识创造者的权益，严厉打击任何形式的侵权行为，真正做到创新者有回报，侵权者受惩罚；（4）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重视并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一批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的劳动者队伍。在努力提高企业



内源性创新能力的同时，政府还应当持续优化外源性创新的效果，一方面要发挥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依托大院大所和重大科技项目，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原创新成果的重大突破，同时以大规模技术改造等形式提高基础设施网络的质量，降低企业创新活动的成本；另一方面以科研考核体制改革为契机，以股权合作为纽带，以混合所有制的新型研发机构为载体，推动高校院所、地方平台和社会资本的多方融合发展。

3. 在全面开放的格局下，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在新一轮的全球化变革中，我们要依托“一带一路”的建设，逐步摆脱在原有产品内分工框架下，中国企业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困境，重新构建以我为主的新型全球价值链。为此：（1）将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生产能力向部分资源和劳动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在与当地经济共享繁荣的同时，加速实现我国产业组织形态的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优化；（2）利用我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样化的需求种类，采用逆向发包以及研发总部等形式，虹吸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向国内市场的集聚，逐步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和规划者，将更多的核心生产环节纳入到中国的产业体系中，最终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3）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通过合作、

入股和并购的方式，获取高端的生产能力，在研发、设计和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积累竞争优势。

4. 加快培育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国当前以间接金融为主的融资体系在加剧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同时，也蕴含了极高的债务风险。融资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被极大削弱。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以股权融资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实现虚实经济良性互动的关键：（1）鼓励高质量企业上市融资，加速优质信贷的证券化速度，盘活资金存量，通过大幅度供给优质资产的方式来化解“资产荒”造成的虚拟经济泡沫，同时还能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入实体经济领域，为研发活动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激励企业持续提升创新能力；（2）规范资本市场制度和加强上市企业监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将劣质金融资产逐出市场，在提高资本市场总体质量的同时强化投资者信心；（3）规范政府自身融资平台的建设，针对已经形成的基建资产项目，要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降低债务规模，对于新建项目则可以采用 PPP 等方式来引入多种资本，降低债务风险；（4）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具备高风险和高回报特点的新经济中去，使中



小型企业的创新活动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不断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5. 以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作为抓手，推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传统产业并不等价于夕阳产业，经过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之后，传统产业完全可以重获新生并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以共享单车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就是典型代表。与此同时，新兴产业通过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迅速获得市场需求和优质的生产资源，加快自身的成长速度和质量。新旧产业的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要优先选择扶持那些具有交叉性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新兴企业和传统企业在技术研发和市场开发上相互合作，组成企业联盟来推广具有新旧融合性质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更好地推动新旧产业的融合发展：（1）新的经济形式允许先行先试，支持企业在采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减少政策阻碍，敢于制度创新；（2）通过建设综合性的科技服务和专利交易平台，推动原创性科技成果的流通与转让，加快新技术与应用场景的结合，充分发挥集成式创新在新旧产业融合中的催化剂作用。



科学认识新时代“两个毫不动摇”

特征及其要求

陈东

安徽工业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于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党的十五大确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并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



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看望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强调“三个没有变”，既表明了党的一贯立场，及时回应了社会重大关切，更为我国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指出了光明前景。

一、新时代需要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1.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国民经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三大改造”而实现的，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的历史任务，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对传统的公有制经济进行

改革，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从功能上来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困难，但经过调整改革后重新焕发出活力，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了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牢牢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成为我国壮大综合实力、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的重大力量。非公有制经济则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起来，目前产值已超过半壁江山。在缴纳税收、贡献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提供就业岗位等方面均发挥着主要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2.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现实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



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基本经济制度需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加以确立。所有制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其发展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过于落后或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都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让不同的所有制之间能形成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也是当下最现实的选择。

3.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适应新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中国经济发展来不得半点的闪失和曲折，必须要有一批坚定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企业“定海神针”。与众多欠发达国家和危机频发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拥有一支公有制经济“主力军”，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为保障国家安全、贯彻发展理念、

承担社会责任，熨平经济波动、缓解社会矛盾奠定了基本制度条件。如国家电网在农村推进的“户户通电”工程，中石化炼油板块在2008年国际油价与国内成品油价格严重倒挂情况下承担起的1144亿元巨额亏损，中国铁路总公司在中西部地区的铁路投资，这些都是其他所有制企业无力也不愿去担负的。同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打造出一支非公经济的“生力军”，充当市场体系培育的“毛细血管”和生产发展的“催化剂”，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二、新时代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路径

1. 加强高质量制度的供给力度。历史经验表明，我国每一次经济建设的重大进步，都离不开对旧有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大胆改革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因此，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把着力点放在改革与市场作用发挥不相适应的



政府职能上，重塑政府职能，加强高质量的制度供给，而不是加强在具体政策上的指导。目前，无论公有制经济还是对非公有制经济都存在不公平竞争的现象。公有制经济虽然占有的社会资源较多，但也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等，企业家精神发挥不足。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具有体制机制灵活、社会负担轻等优点，但也存在着诸如要素获取难、平等准入难等突出问题。因此，政府的重要职责就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重点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对不同的所有制经济提供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制度平台，消除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让不同所有制经济能在市场经济规则下轻装上阵，不仅要充分激活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也要让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强调：“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



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

“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经过多年发展，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已居国内一流，并可与世界一流企业比肩。2017年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占据115家，仅次于美国的132家，其中大部分是公有制企业，不乏处于完全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同时，公有制企业通过兼顾区域经济、自然环境、社会进步协调发展，逐步树立起负责任的社会形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需要进一步考虑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讲话和十九大报告，当前应重点从四个方面加以改革创新：（1）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融入到公司治理各个环节，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2）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3）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和长效激励约束机制。（4）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化竞争能力。对于公有制企业来说，如何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和创新，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也是下一步需要探讨的地方。

3. 多层面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作出许多新的重大论述，为我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过去，在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文件中，都用“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来表述，党的十九大第一次使用“民营企业”的概念，既表明党对民营企业认识的逐步深化，又对民营企业的社会贡献给予充分肯定。截止目前，我国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 2498 万户，个体工商户 6154 万户，缴纳了 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 60%以上的 GDP，贡献了 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了 80%以上的就业岗位，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应从四个方面重点加以突破：（1）打破行政性垄断，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使民营企业发展特别是在各种生产要素获取和进入垄断领域等方面，得到一视同仁和平等对待。（2）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破除一部分民营企业家中弥



漫着的“小富即安，大富难安”情绪，为安心专心用心谋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3)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营造尊重企业家、尊重纳税人、尊重创新创业者的良好环境，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4)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一方面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在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时守住底线，不以权谋私，一方面激励广大民营企业家做到洁身自好，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为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新贡献。

4.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股份制基础上提出并逐步推行的重要改革方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也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更好地适应现代经济体系



发展的要求。要把“两个毫不动摇”有机融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全过程，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相互融合与竞争中实现共同发展。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在两个方面加以重视，（1）要注重公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有效监督。重视发展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但不是单向地出售国企股权，进行变相的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要将公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置于严格有效监督之下，而不是暗箱操作，这其中上海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的经验值得借鉴。（2）非公有制经济要摒除疑虑，积极主动地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把握改革带来的产业准入的机遇，把握住市场出清带来的各类重组低成本扩张机遇，把握住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行动带来轻装上阵机遇，把握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机遇，融合发展，在新一轮洗牌中变得更优更强，实现质的飞跃。

三、需要澄清的两点认识

1. 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的模糊认识。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GDP年均增速不仅高于建国后前30年的速度，而且明显超出世界经济同期增速，甚至高

于日本、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的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即使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我国仍然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特色、成功、创新，关键在于放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枷锁使其得以发展壮大。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其实，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两个毫不动摇”的结果而非原因。首先，改革开放近40年来，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中国经济进步的突出特征，而并不是非公有制经济“单兵突进”。其次，即使是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并非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成功。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是走私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但除了少数发达国家外，真正成功的寥寥无几，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放开私有化更多的是导致经济倒退和社会动荡。而发达国家的成功，根本原因是来自于历史上的率先起步和外部资源的输入，而非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40年后进入新时代，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一大独特优势和重要特色就在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2. 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零和博弈”的错误认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体现在统一的一面。“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国民共进”，破除所谓的“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的争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步伐的区别，更多的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乏力，非公有制企业家发展预期和信心受到影响，为避免经济发展波动过大，稳定就业和经济发展预期，公有制经济承担了较多的投资任务。如果说这时候的“国进民退”是对民间投资的挤压，毋宁说是对民间投资的带动，当我国经济率先进入向好发展势头，民间投资的热情会再次高涨。纵观改革开放全过程，公有制经济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外资经济之间也形成一定的力量制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宏观环境和战略缓冲期，有些公有制经济过早退出的领域，如日用化工品产业，基本为跨国企业占领就是明证。再如，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社会上也存在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此消彼长、你进我退的“零和博弈”担忧，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意图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前提是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目的则是实现“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只强调某一方面的单兵突进，会妨害多种所有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协调局面。忽视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落入私有化的陷阱；忽视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会重蹈单一公有制的覆辙。





国家总体安全观视角下的金融安全

陈志龙

南京大学长三角中心特聘研究员、教授，财经专栏作家

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在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报告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新的拓展，对指导党在新时期的伟大实践和伟大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主流，国家安全中军事因素分量相对下降，经济金融因素的重要性上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中突出强调国家安全问题，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全体

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举足轻重的世界重要金融大国，经济金融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作为大国经济的核心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特别是经历了 2015 年以来的资本市场、汇率市场异常波动的考验，决策层深刻认识到金融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在经济金融领域构建基于国家总体安全的全面的、战略性的金融安全防护协同体系已是迫在眉睫。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金融化是两大重要特征。要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和金融化两大潮流都是裹挟着巨大的乘数效应而来，它将国家和个人利益的盈亏不断放大，使得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变得更加复杂和迅速。金融因其高杠杆属性而具有特殊的放大器作用，一国金融政策如果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往往瞬间血流成河。高杠杆效应下，损益都会被放大，“如不及时止血，你的下一步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次贷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强调对金融危机的“在线修复”就是这个道理，当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不允许市场原教旨主义无休止争吵。

国家治理与现代金融相互交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安全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金融是财富管理的工具，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手段，更是现代化国



家治理的关键。中国已具备世界重要金融市场的规模，中国金融体系是一个巨量的复合型系统，是一个包括了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保险信托期货市场在内的数百亿规模的市场。金融安全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核，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必须能够充分运用金融工具，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经济丛林中，必须牢牢把握对金融的控制权，保持金融体系正常运行，避免和防范危机发生。在面对市场突发性安全事件和重大外部冲击时，必须有全盘的、战略性的、迅速的反危机措施和管制手段，能确保本国金融体系安全、金融主权不受侵害。

金融竞争是当代国家发展和竞争中所面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大国经济永恒的博弈。现代金融战是一场超限战，它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枯拉朽迅速击溃一个国家，其风险可能大于他把所有航母战斗群开到你的近海。军事打击只能摧毁建筑，造成人员伤亡；而金融战以其隐蔽性和残酷性，对一国防务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从当年攻击卢布与苏联解体、从攻击泰铢到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都是并未远去的历史教训。利用现代金融战掠夺全球财富、践踏他国主权、遏制他国发展是新兴全球霸权惯用的手法。微观意义上，金融是财富管理的工

具，但在宏观层面，它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必须充分运用金融工具，牢牢把握对金融的控制权。

今年4月，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时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现代国家治理水平和能力与现代金融体系相互交融。金融安全和控制权是在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过去几年来，总书记多次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过去二十多年间，多起局部区域性金融危机或者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所有的危机都是市场失灵和监管失败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者是一对密不可分的连体儿。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金融危机外溢性突显，国际金融风险点仍然不少。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有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外部冲击。毋庸讳言，中国金融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尚不成熟，金融存在



难以回避的脆弱性，维护金融安全的责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总书记强调，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一定要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维护金融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总书记一次次从战略和全局角度高度审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关于金融安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阐述对于做好金融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们面临着复杂的国际资本流动和剧烈的金融市场波动，基于国家整体安全的宏观审慎金融开放就尤为必要。19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回答记者问时指出，汇率浮动更加依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人民币更多地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尽管过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所以今后还会继续向前推进。”至于扩大人民币波幅，周小川强调，这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当前的浮动区间已很少能限制到汇率，汇率变化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当然，有时候扩大一下汇率浮动区间，也是释放一个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汇率主要由

市场决定。但大波幅并不是当前最关注的重点。”

过去几年间，多个国家都为了一场超级信贷繁荣付出了较为沉重的学费。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诱发金融风险的资产泡沫既有可能出现在资本市场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上，还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衍生品。2009年以来，主要经济体的危机应对策略主要是货币放水，信贷狂潮和货币洪峰交织，导致经济复苏过程异常复杂。长时期的信贷繁荣从来都不是一个好事，长期的信贷繁荣终将导致借方与贷方更容易受到金融震荡的冲击，金融市场并不总是大而不倒，持续繁荣背景下的市场往往十分脆弱，有时一个或多个偶发性事件都会引起恐慌。当一场严重的恐慌爆发之际，整体经济难免都会受到重创。所以总书记提出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十九大期间，周小川也指出了当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几个重要风险点。从全球范围来讲，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风险，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所导致的风险。对于经济转轨国家，特别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讲，现实的金融风险就是所谓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健康的风险。“如果经济中顺周期因素太多，使周期波动被巨大地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



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在当今全球化竞争中，金融不只是金钱，它更是一种实力和权力，一种可与海权、陆权、制空权相提并重的战略权力。金融资源是一种战略资源，金融权力是一种战略权力，金融安全是关系到国家总体安全的战略安全。一个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而是可以主动构建预警体系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都推出过金融稳定指标（FSI）等，这些基于历史和专业化研究的金融统计指标，对判断和防范金融风险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十九大召开前夕，一向重视技术分析的周小川在与媒体吹风时说“改革需要顶层设计，要考虑到各种困难和潜在危险。”并明确表示“有些改革没有时间窗口，可能稍缓一些。”结合他“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幅并不是当前最关注的重点”的谈话，再结合一年多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的问题，应该很容易理解这段话的深刻内涵。

2015 年股灾之后启动 8.11 汇改，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双双触顶回落。到今年 1 月底，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近 14%，外汇储备从触手可及的 4 万亿美元跌破 3 万亿美元。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持续下行给经济金融运行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

和压力。负反馈机制的放大效应显现，资金外流加速，股市债市齐跌，金融风险持续加大。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恐慌性的排队换汇场面。一段时间，各种市场信号较为混乱，形势非常严峻。面对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异常波动，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绪。历史性的定调出在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12月14日的讲话中，谈到稳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时特别指出：“要通过改革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这件事是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可急功近利，不要操之过急，能干多少干多少，时机好就干得快一些，时机不好就干得慢一点，一切以我国发展的根本利益和经济安全为依据。”总书记的这段话言简意赅，高屋建瓴，体现了中央对金融改革、特别是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重视和关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在宏观审慎框架下，在金融系统较为健康的环境下进行，不能鲁莽冒进急于求成。现在看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一些不成熟的鲁莽冒进行为得到了及时扭转和矫正，有效防范了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

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全面做好金融工作基础上，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科学防范风险，强化安全能力建设，



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金融业的改革开放需要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但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不能照抄照搬，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对自身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脆弱性要有正确的评估和清醒的认知，在国内产业转型尚未成功、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金融资产定价机制不健全、金融监管体制不成熟、资产泡沫依然严重的环境下，仓促盲目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放任本币单边下跌，对外汇储备缩水坐视不管，将酿成大概率的风险事件。

2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警示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外汇储备是战略储备、政治储备，也是国家安全储备。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稳定的市场环境，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可急功近利，不要操之过急，这项改革关系到总体国家安全，条件不具备时不能轻易拆掉“防火墙”、填上“护城河”。这项改革用总书记的话说“能干多少干多少，时机好就干得快一些，时机不好就干得慢一点，一切以我国发展的根本利益和经济安全为依据。”

总书记去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央行和外管局采取了积极措施，出台了一系列稳定投资者信心的实质

性动作，加大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境内外主体交易行为的监管，在保证正常合理的国际收支同时，严查境外投资的真实性，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收支行为，使外汇供需进一步趋于稳定和平衡。同时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对话，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自 2017 年 1 月下跌触底后呈持续稳步增长态势，今年 2 月，外汇储备在连续缩水 16 个月后，首次回升至 3 万亿美元以上，外管局及时向公众披露相关信息，给社会各界以信心。截至 9 月底实现了连续 8 个月回升，为 2014 年 6 月以来最长连续增长时期。与 2017 年初相比，9 月末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了 980 亿美元，升幅为 3.3%，而上年同期下降了 1640 亿美元。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管理，防止外汇储备的坍塌性流失，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外汇储备的稳步回升，如定海神针，稳定公众信心，对经济金融全局的稳定居功至伟，也对下一步全局性改革提供了良好支撑和保障。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崛起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中国的崛起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战略资源，而金融资源当然是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当前，复杂的内外环境下，宏观经济管理和金融稳定有多重目标，需要稳定的货币政策以应付经济下行和通胀压力；需要稳定的币值和汇率



政策平滑贸易和再平衡；在流动性总体宽裕背景下，需要通过降杠杆降低债务率，以防止债务危机和资产过度泡沫化。总体来看，我国金融形势是良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但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因素综合影响下，我国金融发展面临不少风险和挑 战，经济下行周期中，不良资产持续攀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资产泡沫风险、影子银行风险、监管体系不成熟等等，我们要积极正视、正确应对这些风险和挑 战。近来，从黑天鹅到灰犀牛再到明斯基时刻，这些特殊的危机语言也越来越频繁地见诸财经高官的公开讲话，说明这一届的财经内阁（是否合适？）头脑越来越清醒，他们不回避风险和挑 战，越来越敢于正视累积的经济金融风险，及时做好危机应对。

无论是二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十年前的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都暴露出主要经济体在系统性风险监测与评估、政治行动意愿和危机管理框架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加强金融稳定评估和早期预警体系建设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学习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有助于我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清醒评估当前金融风险的现状，关注薄弱环节，完善预警监管体系建设，在坚持宏观审慎和国家总体安全下，稳步推进金融开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个底线，为决胜全

面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提供强大、健康、安全的金融支持。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Yangtze IDEI



论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战略意识与策略

丁胡送、陈东

安徽工业大学

自由贸易港是自由贸易区的一种，是设在国家与地区境内、海关关卡之外的港口区，此区域内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船只等交通运输工具自由往来，便于境外货物的进出、装卸、分选加工、重新包装、储存与过境中转，以及专门进口原材料进行外贸加工再出口等，享有免征全部或大部分关税等优惠待遇。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就已提出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建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推动我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主动顺应全球化经济治理新格局、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重要方法，将实现我国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促进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及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途径之一，必将对今后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探索自由贸易港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战略意义：

1. 平抑“逆全球化”波动大国担当的需要。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爆发后，经过八年多的调整，全球经济依然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机制不振、各类区域性的贸易投资协定碎片化，美欧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朝着去全球化方向发展，“逆全球化”潮流不断涌现。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二十国集团新增加实施145项贸易限制措施，平均每月12起，同比大幅提升。但也要清醒认识到，“逆全球化”趋势并不是否定全球化的优点，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得益于开放的经济模式，贸易便利化、对外投资、吸引外资和产能合作等措施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演讲所提到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世界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正在进入西方收缩经济全球化步伐的调整时期，这也是经济全球化模式的转变时期，当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将逐渐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主要动力。建设自由贸易港，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平抑经济逆全球化波动，推动世界经济开放发展和强劲复苏的需要，更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对中国的期待，是大国的责任担当。

2. 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准公共产品的需要。只有惠及他人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传统的国际运行机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全球化的规则明显倾向于发达国家，普惠性不足，在带来世界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冲突、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是当前世界的呼唤。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融入世界的程度越来越深，创建自贸区、倡导“一带一路”，成立亚投行、丝路基金，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确立全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同时，也向世界推出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制度设计。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以及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需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重塑，以良好的制度设计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对外开放，通过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关国际协调力和动员力的提升，不断与世界一道共创经济开放与发展的红利。因此，当前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正当其时，能帮助我国先行试验国际经贸新规则、新标准，积累新形势下参与双边、多边、区域合作的经验，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规则谈判提供参考，从

而为中国参与新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撑。

3. 打造新时代我国经济新增长点的需要。在全球贸易越来越集中到争夺价值链核心环节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模式,不断提升在贸易分工中的获益程度。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等。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仅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需要进一步利用开放的手段促进发展,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解决利用外资增速趋缓、进出口额增长放慢等问题。自由贸易港区内政府监管模式、企业生产模式都将有重大突破,企业由许可制变成备案制和豁免验证等,将有利于推动我国在更高层面实现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的自由高效流动,将更加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经验,加速提升发展质量,有利于构筑原料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链,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国内品牌“走出去”竞争力,自由贸易港通常被视为开放程度最高的自贸试验区,



同时通过引入国际品牌，倒逼国内企业转型升级、降成本、惠消费，将会成为全球对外开放和贸易枢纽中心，也将会成长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4.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升级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升级的过程，国家 2013 年在上海成立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后形成“1+3+7”的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到一个新高度。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在进行改革先行先试中为推动中国整体改革、建设全面开放型经济积累了全面的经验，具备向更深层次开放发展的基础。作为自贸试验区的升级版，建设自由贸易港区，将实现港区内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将国际化服务提高到国际最高水平，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一批重点港口发展成为国际一流枢纽大港。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是在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基础上的创新与突破，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从全球视角优化资源配置和整合的重大探索。结合“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我国如能再次把握十年左右的战略机遇期，对标世界先进经验，以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战略抓手，大力发展离岸金融与离岸贸易，打造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桥头堡，引

引领整合金融市场、信息服务、服务贸易、研发资源与前沿科技，形成从设计、生产到服务的系统集成，提升产业引领和价值链管理能力，则完全可以带动全国实现由贸易与制造大国向资本与产业强国的转变。

建设自由贸易港，代表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瞄准世界上最高标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货物、人才、资金流动的快速、便捷。在货物流动方面，行政审批流程应尽量简化，多证合一，快速通关，基础设施完备，能够有效联通海陆空，使港区企业便捷地连通世界市场。在人才流动方面，为各类高层次人才提供出入境便利、政策优惠，以及完善的服务业和宜居的生活环境，吸引人才流入。在金融流动方面，能够提供较为宽松的货币兑换机制及较为完善的融资租赁体系等，便于开展跨境业务结算、吸引外资，为港口商贸活动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

以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标准裁量，目前我国层级最高的经济区是保税区与自由贸易区。虽然从规模来看，有些地区已经处于世界前列，如全球集装箱吞吐量前五大港口中国大陆独占三个：上海、深圳、宁波-舟山，但在货物贸易便利程度、人员流通自由度和金融发达水平三个方面同国际上成功的自



由贸易港还存在较大差距。下一步在创建过程中要采用以下策略：

1. 加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自由贸易港是我国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风险测试区、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改革试验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先行区。这决定了它既是“特区”，又是“试验区”。因此，政府在管理体制机制规范上可在国家授权范围内，进一步与国际通用方式接轨，在保证风险控制、安全有保障的条件下，增强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加快职能转变，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要把“放手”作为最大的“抓手”，探索实现一线无条件准入、登记式备案、区内免证免审等，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区域内各项管制措施。要把“放心”作为最大的“信心”。采用合格假定、非侵入式监控等理念，引入市场机制，实施第三方采信乃至多方采信，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干扰。要以“精准布控”替代“全面防控”。在“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监管模型下，进一步探索实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风险管理制度，注重国内相关部门和国际港口间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精准风险布控体系。

2. 加强部门服务协同整合。上海自贸区等 11 家自贸区已

为我国自由贸易港创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供借鉴，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海关、物流、检验检疫、边防、海事等口岸管理部门和查验单位，以及规划、建设等相关部门协同服务上，仍然需要时日磨合。在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要以服务和推动自由贸易港区建设水平提高作为出发点，加快整合力度，不断创新功能，打造高效便捷、科学监管、安全规范、资源共享、步伐整齐的服务型部门，持续优化服务环境，推动政务服务高效和精准。要以业务平台为基础加速部门功能整合。如建设港口运输与物流平台、国际物流服务平台、航运服务与交易平台、大宗商品交易服务平台、江海陆联运网络平台、口岸通关一体化平台等，在这些平台上整合各部门的功能。部门协同整合还需要适应港区功能不断拓展的需要，在保税加工、保税仓储、货物中转、商品展示、离岸金融和商务服务等综合功能拓展过程中实施动态调整。

3. 对人才、金融流动便利性重点突破。在自由贸易港建设上，我国在货物便利化上改革步伐较快，但在人才和金融流动便利化上则因属改革难点而步伐较慢。金融改革的困难，主要是服务业与制造业有本质的区别。一个制造业的特区，其工业产值受区域的大小限制，不可能对一个较大范围造成无限冲击。



可是一个金融特区，其存款却可以是天文数字。制造业需要建工厂，一般占地颇广；制造业特区，其产值有天然限制，但是金融业却占地甚少，不受区域大小限制。一座摩天大楼内的服务业，其产值甚至可以超过一个小国的总产值，可以对母国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但自由贸易港在金融便利性上不能因噎废食，要注重在管理中应用风险管理理论和技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依托信息化监管手段，确定负面清单和重点监管对象，精准高效地守住底线，提升风险防控水平。在人才自由流动上，可大胆创新，对于自由港内企业聘用的外籍人才，将以发放中国绿卡为目标，在港内企业工作的外地人才当地落户也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优惠措施。

4. 注重借鉴已有先进经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可避免我国自由贸易港发展少走弯路。不同的自由贸易港有着不同风格和特点。香港、新加坡的整体型自由贸易港，德国汉堡、韩国釜山自由贸易港区，阿联酋迪拜工贸结合型自贸区，以及荷兰鹿特丹港为物流型自贸区都有其各自鲜明的特色，很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复制。如香港自由贸易港建设得益于其自由港经济政策体系，该体系包括完全不干预政策、直接干预政策及临时性干预政策等部分，有效保障了区域内贸易自由、金融自由、

人员进出自由、投资自由以及企业经营自由，这就需要在政策创新上要注重体系建设。再比如新加坡自由贸易港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据统计，新加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位居全球第二。先进的基础设施使得新加坡自由贸易港能够保持高效的物流水平，许多国际物流公司也因此在新加坡自由贸易港设立全球或地区总部。因此，我国自由港建设也要注重与相关国家合作推动码头建设、物流园区建设、大力吸引外资企业设立办事机构、开展大型国际合作论坛、推动铁海联运、铁路联运、江海联运等深度合作。总之，我国的自由贸易港建设应充分借鉴全球已有经验，各地不能冒进，不可一蹴而就，要苦练内功，由沿海、沿江向内地依次推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现代乡村

姜德波 彭程

南京审计大学经贸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令人振奋。这为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对我国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长期困扰的“三农”问题

历史上，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建国之前，我党探索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农村和农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很多牺牲；建国初期，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业、农村和农民为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与城市相比，农村发展滞后、农业基础不稳、农民收入较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负担沉重的问题日益突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速转型阶段，城市与乡村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自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4年聚焦农村、农业和农民，体现了“三农”问

题在我国“重中之重”的地位，也凸现出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近些年来，中央出台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促进了粮食生产连获丰收、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村民生不断改善。但是迄今为止，“三农”问题仍然是一个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落现象

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战略。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却面临着衰落的危险。与城市化快速发展不相适应，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问题逐步凸显，不容忽视。

1. 农村人口结构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了城市。从城乡结构看，2016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比2015年末增加218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8973万人，比2015年末减少1373万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7.35%。相比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城镇人口增加12320万人，乡村人口减少8140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7.40个百分点。其中，这些大量流动的人口集中在青壮年，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提高收入水平，选择到城市打拼。然而，由于大量



劳动年龄人口进城打工，我国乡村整体处于人口净流出状态，更突出的问题在于，乡村中的人口结构出现问题，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留守在乡村的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儿童，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2. 农村产业发展问题。由于农业生产风险大、收益低，加之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不具劳动能力的老人、孩子留守家中，导致了大量农村土地闲置，耕地撂荒现象严重，造成了农村土地资源严重浪费。耕地资源是有限的，土地是农民生活最基本的保障，大面积土地不合理的使用造成了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失衡，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土地与农业息息相关，农业作为民生之本，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只有发展好了农业，工业才能进步。

3. 农民子女教育问题。自上世纪末，各地县级以上政府为了加强城镇化建设，降低乡镇政府行政开支，减轻乡镇政府财政负担和农民负担，开始实施撤乡并镇和精简乡镇机构的政策，将小乡并入大镇、弱乡并入强镇。然而，这一举措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后果。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例，撤乡并镇后，许多原有的中小学校设施遭到废弃和破坏。不仅如此，一方面，年龄较小、难以独立生活的农村孩子不得不去离家较远的乡镇寄宿

制学校读书，不仅要缴纳住宿费，有的甚至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些孩子本可以上公办学校，然而，家门口的公办学校被撤并后，他们只能选择路近、但学费比较昂贵的民办学校，农村教育因此受到影响。

4. 乡村社会治理问题。在乡村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人口结构问题突出，青壮年劳动力缺乏，留守农村的老、弱、病、残、幼面临着许多生产、生活，甚至是生存的难题。除此之外，农村群众在经济发展、社会安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扶弱济贫等方面诉求日益增多，但整个乡村社会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5.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与城市化进程格格不入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农村居民生产、生活以及工业垃圾对农村环境造成污染，由于农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大量增加，加之农民环境意识淡薄，垃圾沿河、沿路等随处乱堆乱放的现象较为明显，一些畜禽养殖户没有相关配套污染处理设施，也成为农村重要污染源；另一方面，农民为提高农作物产量而盲目滥用、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不仅造成资源浪费，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而且导致环境污染。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任重道远

为避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衰落现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

1.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想建设现代化农业，应将发展生态农业与调整农业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因地制宜选择农业主导产业，大力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通过优化生态农业布局结构，推动生态农业规模化经营，将生态变为生产力，开创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新局面。

2. 重视乡村教育和文化建设。受社会环境影响，乡村教育资源紧缺，教育质量相对较低，村民受教育水平有限，乡村教育必须得到高度重视。政府对于贫困地区学生的义务教育应落实到位，不能盲目撤并乡村学校，避免出现因家庭条件而中途休学、退学的情形，学校可以有侧重地培养新型农业化人才。

我国传统文化很多来自于乡村，乡村文化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民族心理和文化遗产中有着独特的内涵。然而，

由于人们的不重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逐步消失，大部分乡村失去了属于自身的乡村文化。因此，我国应以村为单位重构乡村文化，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乡村文化，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自信。

3. 加强乡村社会治理建设。乡村治理既有与城市治理相同之处，也有与城市治理不同之处。“熟人社会”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指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在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鉴于熟人社会相对稳定的结构与规模，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开展乡村社会治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而降低乡村治理成本。

4.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利、电力、教育、卫生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互协调。各级政府应统筹使用财政资金，合理安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基础设施，加快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改进农业的生产条件，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



5. 加强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建设美丽中国，不仅要建设美丽城市，而且要建设美丽乡村。城市和乡村共存于一个生态系统之中，是一个生态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涉及城市和乡村。保护农村环境同保护城市环境一样重要，必须将城市与农村的环境治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规划与布局，坚决杜绝城市污染、工业污染向农村蔓延，坚决改变环境保护重城市轻农村的工作思维。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做到发展与保护并行，建设与美丽并重。既要让乡村保留田园风光的自然之美、民风淳朴之美，还要让其融入现代元素。要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成为城镇居民的美丽乡愁。



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意义和策略

林学军

暨南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十九大报告中，是我党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新亮点，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是一个伟大创举。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形象地描述了资本主义推动下的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生动画卷，他们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他们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这些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



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彩论述说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国际垄断组织的形成，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推动，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一个不可分隔的整体，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全球化也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必然激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快速扩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在全球激化，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更加突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而且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破坏性也越来越大；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经常巧取豪夺，损害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扩大全球贫富差距，引发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大动荡。当今，经济危机频发，军事冲突连绵不断。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7 年 9 月 15 日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受地区冲突和气候变化影响，全球面临食物不足困境的人口总

数到 2016 年已增至 8.15 亿，在西方国家穷奢极侈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却在忍饥挨饿，世界变得极不太平。

经济全球化预示着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的大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并向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大批产业工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让全球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面目。2008 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更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穷途末路。为免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危害，铲除剥削、压榨的根源，就必须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综上所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党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英明决策。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让世界一起走上富裕、繁荣的新时代。

如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



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如何进行创新，形成新优势，我认为：

1.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我党经济全球化的指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当前，美英等国正掀起一股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他们重拾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以贸易战、货币战等形式打击竞争对手，损害他国利益，维护其不公平的统治地位。中国应当树立全球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坚持开放的国策，不断扩大开放的范围，提高开放的层次，加强与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让经济全球化惠及全世界人民。

2. 坚持互利、共赢的理念。西方所谓的全球化，表面上他们利用比较优势，实际上是利用其垄断优势，剥削、压榨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他们低价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劳动力，高价向发展中国家销售制成品，攫取高额利润。因此，西方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损人利己的全球化。中国特色的经济全球化，应当是互利共赢的全球化，让世界人民共同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中国的智慧、中国的倡议、中国的呼声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和响应。

3. 加强沟通宣传，让中国的声音传遍全球。当今，中国是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硬实力比较强大。但是，中国的软实力相对比较弱，有些西方国家渲染中国威胁论，大肆抹黑抵毁中国形象。因此：（1）利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以及各种新闻媒体，宣传中国的主张，打造中国大国形象；（2）主动参与全球事务，提出中国方案、中国规则，增加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发言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3）与各国政府发展良好关系，开展友好协商，增进相互理解；（4）加强与各国人民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交流，发展旅游产业，增加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培养各国人民间的友好情谊。

4. 以“一带一路”为战略平台，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地区），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80%左右的国家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阶段，有41个经济体属于中高等收入以上的国家，占比63%，只有8%属于低收入国家，经济合作的前景广阔。要做好“一带一路”：（1）制订长远的发展战略，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世界经济秩序为目标，认清国际环境，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扎扎实实地为沿线各国、各地区人民谋福利；（2）抓住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打通道路、桥梁，建好一路，带动一片；（3）优先发展边境地区，扩大沿边开放与经济合作，



以边境的发展带动周围国家、地区的发展；（4）以大企业带动小企业，以大工程带动小项目，以商品贸易带动服务贸易，稳步扩大经济合作的规模，提高经济合作的层次；（5）以工业园、经贸区的平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的条件，安全的保障；（6）以“一带一路”的贸易和投资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确立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

十九大报告为我国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吹响了号角，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战略目标。经过下一个五年，中国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中国梦也是世界之梦，全球之梦！



实体经济振兴：以资本市场发展带动

产业结构调整

查婷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提出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这一提法与十三五规划提出的“通过振兴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来重塑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政策方针相呼应，一方面强调了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旨在缓解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变“脱实向虚”为“强实抑虚”；另一方面也与十八大提出的“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一脉相承，表明了金融体制改革是振兴实体经济的有效举措之一，明确了以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为核心，以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为抓手的改革方向。

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历史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金融体制的市场化进程，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逻辑随着金融基本功能的变化也产生了重大转变，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 1978-1994 年，金融业以银行为主体，金融的主要功能在于吸纳存款，以支持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通过规模扩张方式带动经济高速增长。这一阶段，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城镇居民储蓄率不断提高，银行资金主要来自于各项存款，截止到 1993 年存款总数达到 8.51 万亿元，占银行资金来源比例高达 80.43%，其中城镇居民储蓄是最主要存款来源，占各项存款总数的 47.55%，在银行现金收入中，1994 年城镇存款收入占比首次超过 50%，达到 51.69%。（2）资源配置依靠行政手段强制完成，政策倾向决定了资金的去向，银行贷款主要用于工业企业贷款、商业企业贷款以及固定资产贷款这三项，其中工业企业贷款逐年增长，截止 2014 年（与阶段期限不符？）占各项贷款总额比例达到 18.18%，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第二阶段为 1994-2004 年，以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1994 年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元年，也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功能转变的重要分水岭。过去依赖管制利率的资产定价方式和银行为主导的社会资本集聚模式，导致资本自由流动能力较差、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基于此，1996 年我国开始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变政府定价为市场定价，以合理高效的方式将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地方。同时，金融体系逐步转变为以银行、合作社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等多主体并存的格局。但这一阶段银行业仍然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截止 2004 年，我国国有银行资产在整个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占比仍高达 55.45%。

第三阶段为 2004 年至今，2004 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投资审批制落下帷幕，企业成为投资主体，《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明了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同年我国银行业开始实施股份制改革，这些都为我国深化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奠定了基础，其起点和目标、原则和导向，都是为了



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近年来，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不断丰富，金融业更是实现了高速发展。但我们仍应意识到，一方面，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发展尚不成熟，加之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仍显欠缺，因此依然存在着行政干预的影子；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存在证券化比例较低、股票和债券市场结构失衡、市场运行效率较低以及风险较高、上市公司治理的专业化程度不足、投资者结构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因此，现阶段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本质上表现为，借助资本市场资源整合与配置的功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进而实现振兴实体经济的目标。

二、资本市场调整产业结构的现状与矛盾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资本市场逐渐成为社会资本集聚、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平台，但计划经济时代利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政策惯性依旧存在，国有企业在现行的以银行为主导的资本市场中更容易受到社会资金的青睐，加之过去的土地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都对传统制造业形成了“保护伞”，出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低端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僵尸企业频现等产业结构问题，资本市场调整产业结构仍面临较大困难，

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金融业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直接融资比例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位置，使得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从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直接融资比例看，两者都有所提升。社会融资规模由 2002 年的 2.01 万亿元增长至 2016 年的 17.8 万亿元，直接融资比例（主要包括企业债券净融资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由 2002 年的 4.95% 提高至 2016 年的 23.82%，但这一比例的上升，主要来源于企业债券融资额的大幅上升，增长贡献率高达 81.15%，而股票市场的融资额相对较低，贡献率仅为 18.85%。对比我国与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发现，我国与美国居民及非营利性机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占总金融资产比重差距较大，美国自 2004 年之后平均达到 44%，而我国该比重平均仅有 11%，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资本集聚和资本增值是资本形成的两个主要环节，其能力的高低决定了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并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率。我国直接融资在规模和资产增值能力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使资本市场不但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活力”，反而抑制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2. 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单一，阻碍了资金向实体企业流



动，证券化程度不高引起的“资产荒”，使我国长期处于“高储蓄率，低投资率”的境地。尽管近年来资本市场得到了较快发展，但间接融资仍然占据了较大份额，其中仅仅五家国有银行的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比重就达到了43.79%，储蓄向投资转化实际上仍由国有商业银行主导。自2000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平均仅为50%，同期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占GDP比重平均高达72.02%，而美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则高达125%，无论是与我国储蓄率相比，还是与美国同期投资率相比，我国的投资比率都严重偏低。资产价格和银行利率的居高不下，是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我国2000年以来的存款利率平均达到2.19%，而同期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存款利率则长期低于0.5%，最低时甚至出现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另一方面，截至2016年我国一年期贷款利率为4.35%，而美国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仅为3.51%。银行作为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主要渠道，存款利率偏高使得居民对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难以得到释放，贷款利率偏高则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3. 受到资本形成方式和资本配置效率的制约，社会资源错

配现象严重，结构性不平衡是当前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1）第二产业中，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业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则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第三产业中，由于我国低端服务业占比过高，人口和资源在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下降(李扬，张平，2016)，使得产业创新能力难以激发。（2）对国有经济的依赖与对银行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国有企业因其背后无形的政府担保，为其获得银行贷款提供了便利，而与国有企业结盟也壮大了银行的资产实力，这无疑阻碍了作为 GDP 主要贡献者的民营经济的发展。（3）通过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虽然从实体经济中而来，却不能回到实体经济中去，2016 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来源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金为 14.29 万亿元，而运用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金仅为 7.89 万亿元，相比之下，来源于金融机构部门的资金为 30.77 万亿元，而运用于金融机构部门的资金则达到了 31.66 万亿元。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经济的“脱实向虚”。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的上述问题与矛盾，导致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是金融无法有效



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原因。

三、以资本市场发展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实体经济振兴

以资本市场发展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强调了资本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的重要性，资本市场与传统方式相结合、相补充的资本形成方式已经成为了新时代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动力；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意味着实体经济需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以提升国际竞争力，资本市场的完善为资金有效募集并迅速投入实体经济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去杠杆”降低社会经济的泡沫化风险，两者相辅相成，在平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同时可以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体的政策措施，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 拓宽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以证券化手段提升直接融资比例。截止到 2016 年，我国所有中小企业当中，超过 90% 的企业仍然依赖间接融资生存，仅有不到 10% 的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方式筹集资金，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在宏观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更为艰难，因此以证券化手段提升直接融资比例，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中小企业发展注入活力。同

时，利用 PE、VE 等方式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将更多中小企业纳入资本市场中，真正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达到振兴实体经济的目的。

2. 通过完善资本市场进入退出机制，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一方面通过加快完善注册制相关法律法规，有效降低政府对金融市场准入的过度干预，从根本上杜绝寻租风险，真正发挥注册制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利用“新三板”制度的“宽进严出”，对资本市场退出机制进行探索性尝试，在解决审批监管问题的同时，更可以为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奠定基础。

3. 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完善 PPP 等投融资模式，减少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存量，增加国有资本（包括财政投资、政府债务和国有企业的资金）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力，更好的发挥国有资本优势。另一方面针对经济效益较低、社会需求和发展空间较大的行业，可以采取政府补贴收益和证券化等方式，改善经济效益，优化投资的行业结构。

4. 抑制虚拟经济泡沫，防范金融市场风险，通过提供优质资产促使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资本市场是建立于实体经济



之上的，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资本只能在资本市场内“空转”，造成虚拟经济泡沫，带来金融市场危机，因此抑制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泡沫化增长，转而通过金融创新提供优质资产，同时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让实体经济企业能够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率，成为促进“脱虚向实”的良方。



发挥城市群带动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

凌永辉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表述，一方面是对十八大确立的“四化”同步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思想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指明了下一阶段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的突破方向，即发挥城市群建设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当前新型城镇化推进缓慢的原因

经济新常态以来，伴随着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思想孕育而生，以期转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然而，过去五年来，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并不顺利，发展较为缓慢，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1.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大幅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我国 2016 年的城



镇化率已经达到 57.4%，根据发达国家经验，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中后期阶段。然而，同期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为 41.2%，两者之间的差距高达 16.2 个百分点。若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看，我国城镇化水平仅处于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的起步阶段，距离发达国家 80% 左右的城镇化率相去甚远。分地区来看，东部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东中西地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落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6 年，东部地区城镇人口比重已达到 65.9%，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仅分别为 52.8% 和 50.2%。以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也反映出了这种地区差异，比如 2014 年，东中西地区非农人口占比分别为 52.9%、32.2% 和 33.1%。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同一地区内部，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也极其明显，比如江苏省苏南地区的城镇化率就远远高于苏北地区。

2. 土地城镇化仍快于人口城镇化。长期以来，在唯 GDP 论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下，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的现象屡见不鲜，造成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极度偏低。2000-2011 年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幅高达 76.4%，而城镇人口仅增长了 50.4%，两者相差 26 个百分点。2012 年以来，这种不协调



的趋势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增长率由 2012 年的 4.5% 上升到 2015 年的 4.7%，而城镇人口年增长率则由 3.1% 下降至 2.9%。直接反映城镇化特征的城市人口密度数据显示，2015 年已出现了轻微的负增长，而 2012 年的这一数字为 3.5%。可见，大量的通过“人为造城”来提升土地城镇化率的现象，忽视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规律，其粗放而低效的土地利用方式，带来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3. 城镇化仍有沦为房地产化的风险。从各地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实践来看，行政手段的选择偏好仍然强于市场手段。比如多地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中，频频通过“并区”、“撤县设区”等，进行大规模地征地拆迁、新城开发，利用房地产开发来维持土地财政。但问题是，在目前的土地行政性供给制度框架下，土地资源分配被严重扭曲，城镇化外衣之下的“圈地”助推了房地产泡沫。另一方面，在缺乏企业培育和产业支撑的三四线城市，许多所谓的产业新城看起来是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但实质上却是以城镇化为名进行房地产开发，这样的“被城镇化”导致了大量房地产库存积压，造成了中国经济的严重结构性失衡。

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构想，为何会遭遇如此之难的挑战？究



其原因，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人的城镇化，即促进人口集聚，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是关键，但这一关键性条件却受制于当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首先，城乡分割的二元化户籍管理制度，严格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帕累托最优配置。2012年，全国农民工已多达2.62亿，但却由于户籍限制，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一代农民工将返回农村，大规模的“人口回流”，不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其次，“钟摆式”人口迁徙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对于土地的紧密依赖，反映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在现行制度安排下，一方面，大大地强化了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农民不愿意放弃对土地的依赖；另一方面，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产权关系不明晰，导致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补偿，进一步增加了其永久性流入城市的困难。最后，在现有财税体系下，地方政府基本上以“土地财政”来动员城镇化建设资金，但这一模式断然不可持续，无法从根本上为新型城镇化奠定坚实的财政基础。这—是因为现在政府实施强制征地的经济社会成本（如征地冲突事件、补偿标准上升等）急剧增加，二是因为后备土地资源存量不断减少导致用地边际成本持续上升，三

是因为土地财政背后还酝酿着庞大的债务危机。

二、以城市群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突破口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找到关键的突破口。这一突破口必须能够促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的联动改革，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劳动力、土地和资金需求的紧密协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显然就是这样的关键突破口。城市群作为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载体，通过各城市之间形成定位准确、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城市群落，其覆盖面广、纵深度高的梯度格局，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支撑，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因此，可以通过城市群内的要素集聚功能与配置功能的协同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这当中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1. 产业集群带动人口集聚的问题。一般而言，城市群初步具备了现代化产业体系下的产业集群，不仅具有更加高级的生产制造工艺，而且在创新设计、品牌营销、流通管理等各个环节，融入消费者定制偏好，从而引致更多的终端需求；同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将产生大量的中间需



求，反过来也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模增加和等级提升。如果城乡之间二元化的户籍分割严重，无论在生产方面还是在消费方面，仅仅依靠现有的城市人口，不可能支撑现代化产业集群所要求的劳动供给和商品消费。因此，城市群建设和发展要求产业集群必须带动人口集聚，也即，必须有足够的农村转移人口真正融合为城市人口，这必然将倒逼二元化城乡户籍加快向一元化全国户籍过渡。

2. 要素集聚中的优化配置问题。要素和发展能量向城市群高度集聚，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在城市群交汇，演化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一体化发展的城镇格局。这种格局的最大优点就是内部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一方面，教育、劳动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能够实现统筹协调和多元共享，其正外部性有利于降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成本；另一方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非简单的平均化，而是促进机会均等，而城市群多层次、强辐射的地理空间体系，意味着不管是高端人才还是普通农民工，都能在其中发挥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安身立命的机会。因此，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公共服务统筹协调也是城市群发展的内在要求。但问题是，在现行的分税制下，城市群共建



共享、统筹协调的建设资金从何而来？这就要求必须加快进行土地和财税制度改革。其中，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级差土地收益的市场规律，不仅能够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而且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在摆脱“土地财政”后形成稳定持续的支柱税种和主体税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要素集聚和配置功能要实现协同，还要求城市群的组织架构须从过去那种行政化、命令性的“垂直式”自上而下结构，转化为以市场自组织机制协调为主的“扁平化”多中心网络结构。一般认为，“各自为政”的行政利益边界是阻碍城市群协同发展的主要体制机制问题。这种分割不仅仅存在于相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而且也常常发生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不可否认，纵向垂直式结构在树立上级政府权威、集中决策权、决策执行力等方面占有独到的优势，但同时也极易导致委托-代理问题，产生道德风险，极其不利于资源要素形成集聚和优化配置。但是，如果政府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那么即使存在行政区划和等级，也并不会妨碍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实际上，世界级城市群演化的一般规律已经证明，只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能增强城市群“质量型”发展的内生动力，而政府更多的是发挥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环



境完善等方面的作用。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纵向层面上政府要充分简政放权，实现信息和知识在上下级政府间的充分有效传递，增强服务型政府的执行力；另一方面，横向层面上要打破地方政府部门间的显性、隐性界限，在以市场自组织机制协调为主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和知识的水平流动。

三、利用城市群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若干建议

毫不夸张地说，新型城镇化将是我国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当前阶段，应该充分利用城市群建设的有利契机，积极应对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此本文建议：

1. 加快建立和完善全民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剥离与户籍挂钩的利益分配功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格局中，户籍制度全面放开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步子可以迈得大一点、快一点。尤其要注重发挥城市群内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经济集聚能力，让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不再基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差异，而是基于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需求。

2. 全面落实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尽快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探索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互换机制。由于历史原

因，大量农村土地确权的难度非常之大，尤其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带的土地权属极为复杂，这就要求各地农发局、林业局、土地局和房产局等多个政府部门进行协调，切实为农民提供确权登记服务。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修改《土地管理法》，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三权”分置制度，促进农村“三块地”（即农用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在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格局下实现自由流转，并且试点放开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互换的跨区域“占补平衡”的限制。

3. 主动改革财税体制机制，考虑在城市群内实施全面的房产税，积极研究针对所有财产及其保有、获得、转让等各个环节应该征收的合适税率，从而拓宽税基、稳定税收。同时，也应该相应地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县域增值税分成比例，推行消费税共享政策等。另外，针对城市群内由于行政壁垒可能产生的税收政策边界问题，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赋予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主体的地方政府足够的制度创新优先权；另一方面，也需要地方政府之间建立常态化的议事协调机制，商议统一的税收管理政策。

4. 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考核体制，构建涵盖经济总量增长、人均增长、生态环境保护等多元化的综合考核机制，并



且针对不同地区的城市群或者城市群内部不同层级的城市（镇），对指标考核赋予相应的权重。其中，权重合理设定的总体准则是，经济愈是发达的地区，总量增长的权重应该更高，而经济愈是欠发达的地区，人均增长、生态环境保护等指标应该更高。这样一来，才能保证新型城镇化沿着集约、高效、质量型的道路推进。

5. 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基本原则，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中，一方面，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包括城市经济集聚规律、级差土地收益规律等等，合理地利用这些规律，大幅降低城镇化建设成本；另一方面，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标准是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通过建立和完善负面清单制度来“放手”，把工作的“抓手”放到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上来。

构建江淮生态经济区的系统治理体系

彭本红 黄倩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与环境治理研究院

摘要：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面临挑战与机遇，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增长不可持续、群众不够富裕，不符合新时代高质量生态经济发展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城镇建设和人口密度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也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系统治理体系包括：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以及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等，打造宁静、和谐、美丽的生态经济区，开启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还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江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对



全省发展格局进行重构，搭建新的战略载体，实施重点功能区战略，把全省分为几个大的功能区，即“1+3”的功能区：所谓“1”，就是在江苏沿江两岸八市打造扬子江城市群；所谓“3”，分别是沿海经济带、淮海经济区以及江淮生态经济区，力图以新的发展布局带动江苏发展优势重塑。其中江淮生态经济区是江苏最有生态价值、生态优势、生态竞争力的地区，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建立系统治理体系势在必行。

一、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江淮生态经济区包括淮安、宿迁以及里下河地区的高邮、宝应、兴化、建湖、阜宁等县或市，是江苏水网最密集的区域，也是第一产业较发达区域。江淮生态经济区在推动经济发展现代化、生态化、绿色化的同时面临许多现实困境。经济发展落后，生态脆弱，环境问题突出，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都制约江淮生态经济区的发展。

1. 区域经济发展落后。江淮生态经济区中有6个江苏省扶贫地区，其中苏北占全省低收入人口总量的94.1%，省经济薄弱村苏北有771个，占总量的93.9%，成为建设江淮生态经济区的重要绊脚石。江淮区域农业较多，“三农”问题、城乡结构不合理、农民教育等问题仍然存在，影响了苏北现代化发展

进程。

2. 区域生态功能脆弱。江淮区域经济发展、城镇结构、乡村建设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以往“跟随式经济”以牺牲生态资源、环境来提高 GDP，为建设江淮生态经济区留下众多隐患。物种资源陷入贫乏困境，主要河流底栖动物物种丰富和较丰富断面比例较 2015 年下降 8.4 个百分点，贫乏和极贫乏断面比例上升 5.4 个百分点。当前面临的“断头浜”与“河道淤塞”问题普遍，如骆马湖周边非法采砂船，新沂河因早期工业排污超过标准而受到威胁等。

3. 区域环境问题突出。区域内部分地区环境问题突出，以淮安为例，废水排放量达 2.553 亿吨，工业废水占 24.9%，生活废水占 75.1%。全市二氧化硫总排放量 4.14 万吨，碳氧化物排放总量 5.66 万吨。土地污染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有农业生产污染与重金属化工企业排放污染，其中铜的单项污染指数最高，其次为砷和镍。江淮区域农村居多，农民生态意识薄弱，大量的生活垃圾随意丢弃以及畜牧养殖没有相关污染处理措施使得土壤污染严重，乡村环境有待整治。

4. 区域资源利用率低。江淮土地资源、水资源、湿地资源丰富，然而土地资源开发能力弱，土地粗放使用，造成人地矛



盾突出。江淮区域还有丰富的湿地资源，着手保护湿地之余仍然会有湿地资源被围垦、污染和过度利用等现象。江苏省湿地保护规划中提出到 2020 年自然湿地保护率达 50%，才有可能扭转现今湿地生态功能退化的趋势。

二、高质量生态经济区的基本要求

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应该遵循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高质量发展方式，确保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三位一体”，强化环境治理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区域内自然保护地体系。

1. 拥有较强的生态承受力。生态承受力是一定的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资源所能满足人类活动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主要取决于人口与生产力的布局、土地利用优化方式以及产业结构与布局。合理的产业布局、人口分布、生产力结构会促进区域的生态经济沿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而过度的开发与使用生态资源，会导致区域的经济发展与规模受到环境的制约。江淮生态经济区域内水面面积达到 5585 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量的近 1/3；湿地面积达到 5652 平方公里，占全省长江以北区域的 1/2。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需要区内行政单位本

地的发展能力与生态承受能力相匹配。

2. 落实城镇开发控制线。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红线，促进城市走集约发展道路。生态保护红线是在红线内从制度、体制和机制方面做好监管和责任督查。永久基本农田的确立防止农田“非农业化”，调动各方保护耕地积极性。城镇开发边界控制线是为了合理确定城镇开发规模，节约土地，推动城镇集约化发展。江淮生态经济区需将森林、草地、湿地、湖泊与城乡用地严格分开，合理规定城乡用地、生态用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永久建设基本农田，要将最优质的耕地划为永久农田，同时要控制好城镇开发边界。

3. 强化排污标准与责任。为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区内各级政府持续实施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防治行动；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健全环保信用评价，强制性披露信息，对不符合国家标准，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行为实施严惩重罚制度；开展国土绿化，湿地保护，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范围。在建设江淮生态经济时，政府应当建立排污标准，实施排污费征收制度，提高污染处理标准，明确政府、企业的责任。

4. 实施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



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实施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以保护优先，建立环境治理控制指标体系；加快生态补偿，从法律的角度确定生态补偿的原则、程序、机构、检验与监督。江淮生态经济区要建立法律化生态补偿机制，补偿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标准合理化、监管有效化，实施更全面的保障措施和更科学的制度设计。

5. 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坚持山水林湖田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江淮生态经济区应对自然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督管理，完善功能区配套基础设施，率先构建以省级公园和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江淮生态经济区应借鉴国内外经验，设置专门的机构负责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控，以承担区域生态安全功能为主导，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生态公园。

三、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的系统治理体系

建设江淮生态经济区要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坚持“统筹山水林湖田草系统治理”的基本方略，建立多方联动、多方参与的系统治理体系。

1.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江淮生态经济区要大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创造出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应突出

创新驱动、生态富民、绿色发展原则，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绿色产业体系，以及集约、协调、可持续空间开发格局。区内化工产业的比重相对较少，占到 37%左右，利于构建绿色生态产业体系，把握“河水大走廊”的发展优势，建设“生态走廊”、“绿色走廊”、“清水走廊”，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

2. 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创新体系。江淮经济生态区要将产业提升与生态保护相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发展，坚持共享发展，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城乡布局的调整。首先要提高产业进入门槛，对环境有危害的产业严禁进入，对环境有益又能提高经济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引进，比如宿迁深入推进“511”工程，推动园区提档升级，引领各项目进入产业园区集聚发展；其次要大力发展以“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经济，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优化产业路径与模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竞争力；再次要发展绿色金融，加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的新技术产业体系。比如盐城的新华产业园研究中低温脱硝催化剂，解决现有脱硝效率不达标而导致氨逃逸超标等二次污染问题。新生产线运行，对包括焦化、水泥、玻璃、工业锅



炉等九大行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扩大了市场容量。

3. 构建清洁低碳的高效能源体系。江淮生态经济区要推进清洁能源生产，资源全面节约与循环利用，降低能耗与物耗。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系统，解决产能过剩、能源短板、节能改造、控制旧能源规模等问题，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能源体系。要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对于区域内的企业生产资源的利用以及排污后再利用情况进行监督，如淮安的盐化工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宿迁的激光产业等。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倡导低碳生活生产方式。

4. 实现循环资源的生产生活系统。江淮生态经济区要推进资源全面节约与循环利用，降低物耗与能耗，实现生产系统与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工业废水再利用，淘汰低效能企业，发展绿色新兴产业，提高质量和效益。除淮安和宿迁市区外，苏北京杭运河沿线和环洪泽湖、高邮湖、骆马湖地区全部为省级限制开发区域，主体功能定位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任务是增强农产品和生态品生产能力，

5. 构建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江淮生态经济区要构建系统治理体系，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建立刚性的环境评价和硬约束机制，

各市县应将政策落到实处。企业要以市场导向为中心，推动产品绿色清洁创新。公众要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社会组织要发挥社会性作用，引导公众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己任。只有通过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相互配合，才能创造生态文明的和谐家园。

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突出创新驱动、生态富民、绿色发展。新的战略需要新的思维、新的理念、新的路径和新的举措。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政府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企业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公众要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在全社会构建系统化的治理体系，打造生态江淮、宜居苏北、美丽江苏。





推进绿色发展

——新时期国家发展的绿色路径

苏晓东

南京东源磐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

短短的一段话，从政策、金融、供给侧、需求侧等方面指明了今后国家走绿色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一、绿色发展需要政府更多作为

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在于政府管控与市场经济的紧密结

合，中国人善于打“组合拳”。这种模式对于绿色发展尤为重要。人性是趋利避害的，总想以较少的投入产生较高的收益，所以企业在“功利主义”思维下，更多追求经济利益，较少考虑环保节能。这时候，“为善”的道德约束是失效的，需要靠政府之手来惩戒“为恶”。也就是说，政府在节能环保领域不但要“有所作为”，更需“大有作为”。在政府主动作为上，中国自上而下的强势政府具有天然的优势。我们不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气候公约所影响，反而要趁机大力推进绿色发展，既为了中国的青山绿水梦，也为全世界做出表率 and 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后，绿色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中国节能环保数据表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强力作为，确实对改善大气污染和降低能源消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数据为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来，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比重从2014年的9.9%上升到了2016年的24.9%，说明政府重拳治理空气污染成效显著。从能耗总量上来看，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34.8亿吨标准煤，到2016年末能源消费总量达到43.6亿吨标准煤，总量还在上升。但单位GDP能耗呈



逐年下降趋势，如图 1 所示，十二五期间，单位 GDP 能耗逐年加速下降，下降率从 2011 年的-2.0%到 2015 年的-5.6%，2016 年为-5.0%，2017 年这一数字预计为-3.4%，下降速度开始放缓，当然这不能说明能耗开始反弹，原因很复杂。



图 1 2011 年-2015 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

哲学家告诉我们，未来决定现在。中国政府承诺，在 2020 年前后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高峰，将 203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 2005 年的水平，力争 2050 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削减到 1990 年一半的水平。就全球来看，这个目标定得还是非常高的。要充分理解现实并完全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需要从现在做起，基于绿色发展战略，加快绿色行动步伐，推动清洁生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加大清洁能源的利用，政府在全社会倡导绿色消费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模

式，唯质不唯量。

二、节能环保目标的实现需要靠前瞻性、严格的法律法规来保证

绿色发展，法律先行。德国的一部《可再生能源法案》，使得德国在短短的 20 年时间里，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达到了 35%，为德国 2022 年退核提供了充分的政策空间，并且造就了德国在新能源装备、节能环保产业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政府综合利用政策法案以及投资税抵免和生产税抵免等一揽子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能源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政府根据经济政策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政策，并且充分利用财税金融政策，促进日本可再生能源的飞跃式发展，对日本摆脱核电依赖、实现可再生能源战略，减轻对石油、天然气等进口能源的依赖，从而实现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近十年来也颁布、修改了与节能环保相关的多部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法》等等。毋庸置疑，这些法律法规对于促进中国近年来的绿色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在过去“以罚代法”的执行下，违法违规企业宁愿缴纳罚款也不愿节能环保，这损坏了法律威严，扭曲了法律意志，弱化了政



策效果。

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针下，国家加大了对节能环保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环保部的公开通报数据显示，仅今年1至8月，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共721件，罚款数额高达9亿元；查封扣押案件超过1万件；限产停产案件近6000件；移送行政拘留5600起；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1800多起。去年底，江苏省启动“263”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合重手治污治霾，减少煤炭消费总量、减少落后化工产能，治理污染，提升环境和生态保护力度。

在应用法律手段的同时，价格调节手段也将成为一个重要手段，比如，自2016年起，江苏根据环保信用等级，在全国率先对部分高污染企业试行差别电价政策，对环保信用等级为红色的高污染企业，用电价格在现行基础上每度加价5分钱，环保信用等级为黑色的每度加价1毛钱。而且，环保和节能高压执法将常态化运行，而不再是以往的“运动式”做法。

三、充分运用绿色金融在节能减排中的杠杆作用

绿色发展一方面需要依靠严格的法律措施和强有力的行政执行来保证外，另一方面，需要发展壮大绿色产业来抑制污

染、降低能耗。通过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增加绿色金融投资，激励全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中，从而增加“绿色供给”。央行 2016 年已经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并通过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央行再贷款支持发展绿色金融、发展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产品等一系列金融创新举措，来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并且，我国是全球仅有的三个建立了绿色信贷指标体系的经济体之一。

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正引领全球发展，据银监会披露，截至 2016 年 6 月末，21 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余额达到 7.26 万亿，占各项贷款的 9.0%。纵观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近几年，多家银行积极投入其中，甚至将其列为战略业务。绿色金融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蓝海市场。众多金融机构开始将资金投向污水处理、土壤和空气治理、新能源、节能改造等相关项目。并且这些项目多为公共事业和政府主导的项目，资产质量相对优于其他资产，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都不错。

绿色金融业务不仅包括信贷，发债、信托、基金、融资租赁等也大有可为。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数据显示，绿色债券市场以令人瞩目的增长速度蓬勃发展，从 2007 年发行第一支绿色债券到 2016 年中期达到 1180 亿美元。



绿色投资还可以带来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声誉效应反过来可以激励更多绿色投资。实际表明，一些绿色投资者，包括绿色债券发行人，在追求商业回报的同时，也收获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四、着力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新兴产业

绿色经济以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为支撑，以发展绿色新兴产业为导向，促进技术创新，创造就业机会。

1. 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主要是对六大高耗能行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资源生产效率，控制污染物排放，降低能源消耗。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主要靠节能环保约束性政策的倒逼，通过提高节能环保标准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

2. 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研究表明，环保投资对 GDP 的投资乘数约为 1.4，“十三五”节能环保市场投资有望达 17 万亿，则增加 GDP 为 23.8 万亿元。国家不但要在关键技术和装备的研发上要加大投资，更需要在资本市场上予以支持，要“扶绿”，比如可以支持节能环保公司优先上市融资。

3.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中国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据环保部数据，2016 年，全国仅工业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就达到 19.1 亿吨，其中 11.8

亿吨用于回收、堆肥、能源转化或生产建筑材料、筑路等。由于中国超过一半的工业活动是在各类工业园和经济开发区进行，所以应大力发展园区内、区域内的循环经济，把一些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转变为另一些企业可以利用的生产原料，从而达到循环产业链的闭合。

4. 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近十年来，新能源领域发展最为迅猛的莫过于光伏产业。中国的光伏产业自 2004 年启动，基于出口导向，迅速崛起，直至 2011 年遭遇欧盟“双反”而暴跌。但随后在，拜优厚的光伏上网电价补贴政策所赐，光伏产业迅速调转方向面向国内市场，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从 2011 年的 220 万千瓦飞速增加到当前的 1.17 亿千瓦（截止 2017 年 8 月），短短 6 年时间增长了 53 倍！过去的经验表明，正确的政策激励，对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虽说补贴一个产业终究非长久之计，但政府在调整、改变政策时需要审慎，要以“扶上马送一程”的态度来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五、将绿色消费作为消费升级的一个新方向

2016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旨在从需求侧来拉动绿色经济。意见指出，将全面推进公共机构带头绿色消费，全面推行绿色办公，完善绿色采购



制度。绿色学校、绿色社区意味着这是政府在继公共机构节能、建筑节能、高校节能之后的另外两个新兴市场。可以预见，未来 3-5 年，全国各地将会有大量的职业学校、中小学、社区等向社会购买节能服务。

绿色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消费理念和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世界经济论坛（WEF）曾做过一次调查，在全球范围内，84%的年轻人相信，关爱社会和环境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在中国，这一比例更高，90%的中国年轻人持同样的观点。在可能的情况下，61%的年轻人愿意寻找和购买环境友好的产品。

绿色消费首当其冲的将是电动汽车。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市场，2016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突破 50 万辆，累计销售超过 100 万辆，占全球的 50%。近日，工信部已提出，将研究制订燃油车退出时间表，这无疑将加速新能源汽车的上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绿色消费意味着健全绿色市场体系，增加绿色产品供给。中国自 2004 年起实施的能效标识制度，对于推动家电领域节能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发挥了巨大作用。全球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将绿色品牌建设作为一个重要战

略，传统企业如沃尔玛、麦当劳、美的、万科等都在积极行动以加强环境保护，比如沃尔玛在中国采用新技术改造现有门店，打造绿色能效商场，并且通过“绿色供应链”来要求供应商遵循其绿色标准，提倡“绿色就是金钱”。互联网公司如谷歌、阿里等都积极拥抱绿色，比如阿里通过支付宝的“蚂蚁森林”和菜鸟绿色包裹来实施其 O2O 的绿色战略。

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践证明，投资环保是有利可图的一件事。今天一个企业的战略中如果不把环保和能耗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那么这个企业一定没在做正确的事。正如《从绿到金》一书中所说，“聪明的企业走在绿色浪潮的前列，降低了财务和运营两方面的风险。他们的环保战略使企业在运营、盈利和发展成长上拥有更多的自由。”





中国新发展与全球新机遇

——以重构 GVC 助力经济全球化

王修志

广西师范大学

前进抑或倒退？值面临经济全球化方向性抉择之际，十九大报告提出“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坚定态度和目标追求。报告指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历史进程中，中国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一个更加包容开放，更富创新活力的中国，可望为处于困境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注入新红利，为全球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新机遇。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高度与新问题

战后，美欧等工业化先行国家积极推动构建多边贸易体制，努力推动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经济全球化重回轨道。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全球 500 强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全

布局生产体系，形成由价值活动串联而成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以 GVC 为载体，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提速，并在世纪之交的前后约 10 年间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需要指出的是，战后经济全球化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美欧先行及其跨国公司的强力驱动外，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元素尤其应该被关注。得益于 1978 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战略，特别是以 1994 年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为标志，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关联。在 GVC 体系中，中国为全球经济贡献了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世界各国各地区分享到源自中国的市场红利和人口红利。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成就的典型样本，同时更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源和贡献者。

遗憾的是，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及此后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当前，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 GVC 主要面临三大挑战：（1）其驱动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效应减弱，2008—2016 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约为 3%，世界 GDP 年均增长率约 2%，两项指标均不及危机之前同期水平的一半；（2）结构失衡现象成为全球共性问题，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表现得更突出，影响也更严重；（3）逆



全球化倾向暗流涌动，其中英、美、法、德等国尤为明显，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却站到了逆全球化的潮头。本轮经济危机前后的事实对比表明，GVC 已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认知，决不能停留于金融危机影响视角，更应该看到美欧主导的、GVC 驱动的经济全球化内生的机制性弊端。

二、重构 GVC 成为全球共识

GVC 的逻辑本质，是以创新技术、市场需求、制度供给为支撑，以价值为纽带，企业、国家、区域利益高度融合的全球性分工体系。回顾战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难发现：（1）正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50 年代的电气、化学、汽车工业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为全球产业链条延伸提供了技术条件；（2）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等为代表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制度安排，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金融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3）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背景下，南美、东南亚、东亚新兴经济体日益开放的市场和快速增长的经济总量，为 GVC 扩张提供了充足而丰裕的市场土壤。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困局，折射出的正是现行 GVC 体系日益

递减的技术红利、市场红利和制度红利。客观看，这一结果与技术创新规律相关，是全球技术创新周期的必然反映。按熊彼特、康德拉季耶夫、朱格拉等学者的技术周期理论观点，当前正好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第四次科技革命交替期，传统技术的动力效应接近释放完毕，创新技术的动力效应尚未大规模形成。在此时期，由于经济增速减缓、资源和要素过度开发，全球经济增长的市场需求支撑也必然减弱。更深层次的症结，则在于现行 GVC 体系的目标导向、治理模式呈现欧美中心主义单极特征，各方之间难以形成高效的竞合关系，多边贸易体制障碍迟迟难以突破，全球金融协调机制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APEC、G20 等相继将 GVC 发展列入战略性议题。2013 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以“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与贸易”为主题，专门探讨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2014 年 APEC 领导人北京会议将“促进 APEC 全球价值链合作”列为重点议题，达成《APEC 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蓝图》。2015 年 G20 安塔利亚峰会提出“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通过全球价值链推动经济全球化”。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提出“重构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强劲增长，提升价值链效率，实现全球经济创新、协调、



包容发展”的倡议并达成共识。2017年5月，由中国和印尼两国共同倡议的“APEC全球价值链合作伙伴平台”获得了第23届APEC贸易部长会（越南）21个经济体的一致认可，并作为会议的成果之一写入“共同行动”。在实践层面，以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德国的“工业4.0战略”、英国的“高价值制造”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战略等为标志，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启动GVC重构进程。应该说，金融危机后，GVC重构已经成为关系到经济全球化命运的战略性命题，其要义在于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技术—制度—市场为基石，重塑产业链条价值逻辑，真正实现GVC共建、共治、共享。

三、推动GVC重构，中国新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红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开启新时代，通过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实现“决胜全面小康—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步走宏伟蓝图。“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也必将更好地造福世界。在此进程中，中国将从制度建设、技术创新、市场升级等三个维度全方位推动GVC重构，并依托新型GVC驱动全球经济新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注入制度红

利、创新红利和市场红利。

1.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为 GVC 提供更高水准的制度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了 GVC 模式下各参与方同生共荣的实践特征,凝聚了包容共享、开放和谐的中国智慧。中国历来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都应平等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国际金融体制的参与者、支持者和推动者。特别是近五年来,中国依托自贸区改革,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积极探索并构建起一整套贸易、投资管理的新制度,为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提供了中国样本。与此同时,中国借助各类国际平台,主张并推动亚太自贸区、亚欧自贸区建设,在世贸组织框架内推进与相关成员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也主张各国应共建金融市场风险防控体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改革,强化国际金融领域的制度协调。“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中国正用实际行动将一项项制度设想落实。展望未来,融入中国智慧的全球化制度体系将更加公平公正高效。

2.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 GVC 重构提供强有力的新技术动能。创新发展是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创新型国家战略指导下，创新人才建设、创新环境建设得到切实推进，中国的技术创新实力已有明显提升。以“新四大发明”为标志的技术创新成果，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已经走向国门，开始影响世界。应该看到，中国的创新型国家战略，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周期几乎完全同步，这与上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完全不同。中国的人才优势、资金优势、市场优势，必将为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提供强大动力。此外，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为原则，中国未来将面向全球推进协同创新，以实现全球创新资源协作，为人类技术进步贡献中国方案。

3. 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动力源，为重构GVC提供市场需求保障，为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人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则构成经济增长的需求基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指引。从全面小康到初步现代化，再到现代化强国，中国十几亿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将持续提升，对应的则是中国市场需求的不断转型升级。从GVC运行的微观机制看，坚实的市场需求才

能确保增值价值最终实现。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规模庞大、品质优良的市场需求，即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红利。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面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矛盾突出的当今世界，面对仍然低迷的世界经济，中国坚定奉行开放国策，致力于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把自己发展好，就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贡献，也只有把自己发展好，才能够更好地助推全球发展，我们应该对此保持清醒的逻辑认知。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 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巫强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这一目标和任务的提出，是基于党中央对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现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内涵之一。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体现了我国产业要摆脱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获取价值分配比例较低困境的迫切要求，而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后在空间组织和地理布局上的必然体现。前者是产业发展的定位体现，后者是产业发展的空间体现。两者关联紧密，都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在实体经济发展中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体现。

一、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存在现实困境

新世纪以来，在党中央的部署下，我国紧紧抓住加入 WTO 的战略机遇，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主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充分发挥中低技能劳动力的禀赋优势，以此作为比较优势的核心，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和组装环节。更准确地说，在这种产品内分工的格局下，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其本质就是“世界加工厂”或“世界组装车间”。这种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途径，支撑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

但不可否认的是，按照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配规律，生产、制造和组装环节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价值比例获取比例低，属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现实中，承接国际外包订单的中国制造企业缺乏定价权，只能被动接受国外发包方的技术、管理、物流等多方面的严格要求，挣得并不丰厚的“辛苦钱”、“血汗钱”。另外，从事生产组装等低端环节持续消耗我国的自然资源要素，产生巨量碳排放，甚至在部分行业中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所以，我国产业必须要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攀升，从简单生产、制造和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获取更高比例的



价值分配。然而，一系列国内外因素组成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现实困境。

1. 西方跨国公司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可能“狙击”我国产业沿着其价值链迈向中高端。现有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大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主导，他们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根据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谁能参与该全球价值链，以及怎么参与。当我国制造业企业要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内向中高端环节攀升时，很可能威胁西方跨国公司对该价值链的主导地位。西方跨国公司就会采取减少国际发包订单、搜寻培育其他供应商、设置技术专利壁垒等策略行为，扼杀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升级意图，切断我国制造业在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迈向中高端的进程。

2. 现阶段我国实体经济运行的“脱实向虚”特征制约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脱实向虚”是我国实体经济当前面对的严峻形势，企业经营一年的利润比不上一线城市的一套住宅价格，上市公司要依靠卖掉持有的房产才能扭转财务亏损。社会资源纷纷离开实体经济，涌入虚拟经济，试图直接以资金为媒介实现价值增值。这不仅导致金融体系的风险不断累积，而且导致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缺乏足够的资金支

持。制造业只能陷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低价值、低利润状态，并导致资金加速流出，这就构成“制造业低端低利润率→资金流出→脱实向虚加剧→……”这一恶性循环。

3. 当前我国国内中高端需求的“外流”使得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失去坚实的需求基础。按照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一国产业发展离不开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支撑，挑剔的顾客构成企业改善产品设计、提高产品质量、塑造企业品牌的强大压力，挑剔的顾客就体现为国内中高端需求。但当前随着海淘等跨境电商的发展、国外旅游购物的普遍化，国内中高端需求不断外流。据统计，2016年跨境电商整体交易规模高达6.3万亿元人民币，比2015年增长23.5%，2017年估计达到7.5万亿元人民币。这其中相当部分是国内中高端需求的外流。这些外流的中高端需求以日常消费品为主，海淘产品种类主要包括服装、化妆品、母婴用品、配饰配件，发达国家这类日常消费品款式更多元、质量更可靠，所以美、英、日、韩、澳是海淘最主要的目标地。未来，随着中国国内消费升级，中高端需求将进一步壮大，对产品安全、质量、款式与规格等方面的要求更高。如果国内中高端需求都流向国外，由于缺乏来自挑剔顾客的需求压力，国内中高端需求规模萎缩，我国本土



产业显然难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二、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面对切实挑战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按照产业专业分工要求，组建的目标一致、互惠互融、彼此衔接的先进制造业网络，并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据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高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过程就是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过程，我国只有涌现出一大批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企业时，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才能真正形成。随着我国制造业规模的壮大，京津冀、珠三角与长三角等区域已经形成若干制造业集群。但当前我国制造业集群规模不强，产业层次不高，内部结构无序。总体而言，我国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还面临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挑战。

1. 我国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体制环境存在缺陷。GDP 导向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既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体制支撑，也是导致国内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的体制根源。在制造业集群的培育过程中，各地区之间竞争激烈而协调不足，彼此都想在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领域抢占“起步优势”，都想当“老大”，纷纷出台优惠的地方产业政策，鼓励本地先进制造业发展，吸引外部先进制造业投资。这种地区本位主义的结果就是

在先进制造业中形成新一轮的国内市场分割和过度竞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就丧失了统一的庞大国内市场，集群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超过合作，替代超过互补，同质化超过异质化。

2. 我国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带动不足。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需要由一批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龙头企业在临近空间范围内集聚形成，这些龙头企业应该是世界级的龙头企业，在先进制造业所涵盖的各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不仅要求其产出、资产等总体规模指标要在全世界细分行业中排名前列，而且要求其利润、技术、品牌等绩效指标要居于全世界同行业的领先水平。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本土企业不多，在先进制造业领域中，世界级的本土企业更不多。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相对薄弱，对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带动作用有限，进一步使得我国制造业集群较为分散，整体发展水平不高。

3. 我国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需要的工匠精神不强。除了世界级的龙头企业外，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还需要大量的中小规模企业共同参与，为龙头企业做配套，做供应商。这些支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中小规模企业需要在其细分



的产品种类，或狭小的产业门类中做精做深，能满足龙头企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持续升级需求，能支撑后者的升级进程。这类中小规模企业不需要巨量的研发投入，也不需要众多的研发人员，而需要在其特定领域中持之以恒的钻研、改进、优化和提升；他们不会取得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创新成果，而是取得微小的、渐进的创新成果。这种中小规模企业的品质就是工匠精神的体现，但由于受到第一代创业企业家逐渐老去，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小规模企业专注执着的工匠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他们纷纷转型并导致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供应商队伍规模缩小，集群生态体系更加脆弱，难以支撑后者成为世界级集群。

三、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对策措施

1. 积极推动培育“链主式”本土企业，加速构建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家价值链。我国本土企业通过加入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获得了成长的机会，但要充分意识到沿着后者的全球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会遭遇后者的“狙击”，甚至被后者所俘获。我国本土企业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主动构建自身主导的国家价值链，成长为“链主式”企业；从

服务于国内市场出发，逐步拓展到海外市场，最终成长为全新的全球价值链。这样才能真正摆脱西方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束缚和制约，实现新全球价值链对旧全球价值链的替代。这是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长远之策，在中短期内，我国本土企业应该先从国内条件成熟的部分做起，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按照市场规律，积极开展产业并购和投资活动，建立以我为主、面向国内的价值网络体系。这一进程必然伴随着先进制造业集群逐步形成，并成长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我国本土企业成长为“链主式”企业，还需要与我国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紧密结合起来。我国在政策层面上，也需要围绕国家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部署，积极促进本土企业在相应空间内成长为“链主式”企业。例如，近期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公布《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指南》，长江经济带将利用现有产业基础，依托区内 11 个省市的超 100 个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和产业园区，打造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这五大城市群产业发展圈，培育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这 5 大世界级制造业集群。这从规划层面上提出世界级制造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对于本土企业在长江经济带，



构筑以我为主的国家价值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本土企业不仅要在长江经济带，而且要在京津冀、一带一路上实现国家价值链的构筑，甚至还要跨区域、跨国界布局价值创造环节，完善其主导的价值链。

2. 充分完善区域产业创新体系构建，积极发挥创新驱动发展的正面效应。无论是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还是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区域产业创新体系都是一个必须跨越的门槛。区域产业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既能直接支撑我国产业创新活动，实现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又是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必然内涵之一。区域产业创新体系是以特定地区为范围，以产业创新为目标，由当地的企业、政府、大学、科研院所和各类创新中介服务机构共同组成，彼此之间存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的生态系统。企业是产业创新活动的核心主体，遵循市场化导向，以开放的方式引导全社会创新资源的投入，负责组织或实施具体的产业创新活动，获取产业创新活动的超额利润，并承担这一过程中的风险。地方政府是产业创新活动的规划引导者和规则维护者，贯彻实施“中国制造 2025”等国家产业发展的重大规划，结合当地产业基础，为产业创新活动提供优越的外部环境。邻近地方政府之间还需要协调跨行

政边界的产业创新活动,实现创新资源在区域内的有效流动与合作。大学和科研院所是产业创新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其应用型的研发成果可以通过企业转化为商业用途,但其中的研究型大学可能更多承担的是基础科学领域的探索。各种创新中介服务机构也是区域产业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专利服务和咨询机构、技术交易市场、工程技术中心、创业就业服务机构等。他们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扮演着引导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润滑剂”角色。

显然,产业基础好的地区必须逐步构建并充分完善区域产业创新体系,我国才可能在这些地区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不仅使得这些地区产业率先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而且使得这些地区有可能培育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从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角度分析,我国区域产业创新体系应当主要由“链主式”企业主导,服务于“链主式”企业率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这对于构建我国本土企业主导的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具有直接的积极意义,因为这类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必然是技术的领先者。同时,产业创新的意义不仅在于掌握最前沿的领先技术,还在于以新产品、新模式服务于新品牌的培育。这就极大地有助于构建我国本土企业主导的大买家驱



动型全球价值链。

3. 大力完善金融市场，真正落实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市场的完善也能够同时助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和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种同时助推作用之所以能够实现，其理论支撑是完善的金融市场能在本土“链主式”企业的快速成长过程中扮演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也表明，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美国华尔街在美国制造业崛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这一判断的现实证据。国内金融市场完善程度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难度和成本。潜在的“链主式”企业能被有效的金融场所准确识别，完善的金融市场会在前者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以天使轮/A轮/B轮、上市融资、发行债券、银行信贷等不同方式向其配置金融资源，为其从幼稚阶段逐步走向快速成长阶段、成熟阶段，乃至重新开始生命周期循环。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过程中，一方面，完善的金融市场会加速“链主式”企业的壮大，为其构建自身主导的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资源支撑，在先进制造业集群成长为世界级的过程中发挥好“带头大哥”的作用；另一方面，完善的金融市场还会直接服务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一系

列支撑企业和相关企业，促进其与“链主式”企业共同壮大。

当前真正使得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使得资金在虚拟经济中空转，关键抓手可能在于创造更加开放、公平、透明的金融市场竞争环境。在加强金融监管、严格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逐步减少对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甚至在金融行业的监管中尝试引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金融体系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还需要进一步放开金融行业的准入限制，更多采取市场化手段鼓励兼并收购，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促进经营性租赁、可转债、不良资产处置与资产证券化等金融业务发展，同时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反垄断监管。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张光远

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沿海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十九大报告对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次做了清晰的说明和积极的肯定，为新时代我国民营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民营企业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新的发展阶段。

一、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民营经济、民间投资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出台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制度。民营经济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起来，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起到了重要力量。截至2017年10月份，我国登记注册的民

营企业2498万户，个体工商户6154万户，每天新增登记市场主体4.9万户，新增企业1.6万户，企业活跃度保持在70%左右。民营企业用近40%的资源创造了我国60%以上的GDP，缴纳了50%以上的税收，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实践证明，凡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那里的就业就比较充分，那里的市场发育程度就比较成熟，那里的经济就充满生机活力，人民生活就比较富裕，社会就和谐稳定。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营经济、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对于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增强经济发展活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营经济、民间投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为推动民营经济、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李克强总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民营经济、民间投资发展问题。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大力促进民间投资、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的政策措施。但不容忽视的是，近两年来，我国的民营经济和民间投资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相对于2014年之前的民间投资增速接近20%甚至20%以上的速度而言，这两



年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降,最低时增速下降到2%左右,远远低于国有投资和全社会平均投资增速,对此应加以高度重视。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有密切关系,宏观经济增速及其政策换挡,作为GDP有效组成部分和拉动经济增长重要马车之一的投资,当然也要增速换挡。但不可否认,民营经济也遇到了一些较大的发展困难,如进入难、做大难、做强难抬高了民间投资的门槛,压缩了民间投资的领域;融资成本高、要素成本高、税费成本高、流通成本高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二、影响民营企业精神发挥的几个担忧

相对这些客观环境来说,民营企业家群体内心的担忧是最值得警惕的,也是影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总的看来,当前民营企业家的担忧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1. 对各类产权和人身安全保护方面的担忧。两个“毫不动摇”解决了民间资本投资和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极其重要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但现实中仍然有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比如,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现象仍有发生。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侵权易发多发。有的地方



法院只要涉及民营企业的诉讼案件，都会抢着管辖，背后原因不言自明。部分民营企业不仅对财产安全担忧，甚至对人身安全感到担心，特别是大型民企业的企业家表现更为明显，怕发展大了会“树大招风”，宁愿发展慢一点“知足常乐”。一些民营企业仍然有“预期不明”“心有余悸”的感觉。

2. 对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的担忧。近年来，中央下发了很多旨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如“非公36条”、“新非公36条”，以及近两年下发的推动民间投资、发挥企业家精神的文件。中央政府促进民间资本投资政策的态度极为坚决，但有些政策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有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宣传、解释、服务不到位，只是简单的把政策内容“挂网站”“发文件”了事，满足于当“传声筒”。有些地方政府贯彻落实中央政府优惠政策时缺乏实施细则和操作方法，申请优惠政策的手续繁琐、门槛高、中介服务收费高。还有些地方政府的权力不是交给市场，而是交给有官方背景的行业协会商会组织，政府在给民营企业减负，行业协会商会在给企业增负，极大地降低了政策的效果。

3. 对不同所有制地位实际不平等的担忧。不同所有制企业在政策待遇上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在执行过程也难以获得一



视同仁待遇。如，公立医院享受5000元/床的补贴，民营医院如果登记为企业法人，不仅无法享受床位补贴，还要缴纳25%的所得税。近年来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牵头的PPP项目，本意是想激活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投资热情，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但最后名不符实，变成了政府与国企业的合作，民营企业只能当国有企业的下家。绝大部分地方政府更为偏爱国有企业，在PPP项目招标过程中会通过设置各种不必要的条件来避免民企竞标；不少国有企业在竞标过程中采取的手段并不完全符合规定程序。民营企业最需要的不是各种各样的“优惠型”政策，而是与国企公平竞争的“公平型”政策。

4. 对政策连续性和官员不作为的担忧。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其中确有地方政府和官员存在着的问题不容忽视。异质性理论说明，不同地方的主政官员都表现出带自身特色的执政理念和行为方式，这种个性化的执政方式如果能和地方实际情况有效结合，在差异化的发展过程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只要一些基本的政策保持连续性即可。但事实上，各地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新官不理旧账”和官员不作为的现象。有调研评估报告数据显示，遇到过这种“新官不理旧账”的企业全国比例超过10%。对一些地方政府不讲诚信，企业

敢怒不敢言。另外，近年来官员不作为的现象也一定程度存在，很多企业都有感受，政府的门容易进了，脸不难看了，但事变得更难办了，民营企业发展不仅要发挥企业家精神，政府的服务精神也应该同步被激发出来。

三、民营经济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政策“获得感”

党的十九大对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上述担忧，也起到了答疑解惑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 给民营经济发展吃了“定心丸”。主要涉及“产权”规定。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就产权问题而言，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产权”问题关系到民营企业发展的根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加入了对非公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改革和保护的相关论述，表明了党中央对待民营企业的根本态度，在根基上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强心剂和源动力，给了民营企业一颗“定心丸”。

2. 给民营经济发展赋予了“平等身”。主要涉及准入身份。行业壁垒、领域垄断，一直是民营经济关注的话题。习近平同



志在报告中指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于市场准入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赋予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相同的市场待遇，使得民营经济获得了“平等身”，必将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积极投入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发挥民营经济的优势，更加主动积极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 给民营经济发展开辟了“正常路”。主要涉及政商关系。政商关系一直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政商关系出现了一些时代性和历史性的问题，尤其是民营企业。如何建构一种健康的政商关系，关系到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构建健康的政商关系，既是对民营企业

的规定，也是对民营企业的保护。只有在“亲”“清”的政商关系中，民营企业才能健康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积极高效有效地展开。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Yangtze IDEI



以自贸区制度创新促进“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张建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条件下提出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国家发展战略，已经并将继续对于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 and 世界开放型经济产生重大作用。

一、“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新平台、共同发展新动力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2015年3月，这个设想成为实施方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简称“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国的国际责任担当。正如倡议提出的：“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和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自倡议发布和实施以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

在我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合作重点，积极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以 2016 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我国总体货物进出口比上年下降 0.9% 的情况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



长 0.5%，达到 9693 亿美元。沿线国家对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 2905 家，占全国的 10.4%，大幅增长了 34.1%；直接投资金额 71 亿美元，占全国的 5.6%。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 145 亿美元，占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8.5%。在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方面，对沿线国家完成营业额 760 亿美元，增长 9.7%，占我国全部的 47.7%。

二、自贸区是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举措

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自贸区”）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区域发展和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举措。自贸区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试验田、示范区、新引擎和新高地。

自 2013 年第一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建立以来，截至目前已有 11 个自贸区正在建设。每个自贸区都已成为连接区域经济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枢纽，从而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由于所有自贸区都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并且都要对接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所以自贸区在沿线国家的制度创新实践对于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都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各个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推动自贸区在投资、贸易、金融以及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形成了非常多的改革创新成果。2014 年底和 2016 年底，国务院分别向全国推广了两批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成果，商务部向全国推广了 8 个“最佳实践案例”，这些成果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自贸区在对接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上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上海自贸区为例，成立 4 年来取得的成绩如下：（1）扩大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走出去和引进来项目累计 3000 多个，贸易增速保持在 22% 以上；（2）建立专门促进机制，设立“一带一路”进口商品国别馆，扩大沿线国家优质商品进口；（3）开展科技创新合作，包括建立跨国孵化器、搭建跨境项目交流平台、实施科技创新资源共建共享；（4）搭建企业走出去服务平台，包括在已有的综合性平台上增设服务“一带一路”专栏和设立“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措施企业服务中心专业平台。

三、自由贸易港建设将进一步提高自贸区的开放度和自由 度

自由贸易港已有数百年历史，它的建立对一国的经济发展、



特别是外向型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我国在自贸区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又一个新举措，也是自贸区制度创新的又一个新要求，必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产生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1. 通过赋予自贸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能够克服因法律法规之间不配套、决策权配置不合理受到的发展制约，进一步提高自贸区的开放度和自由度，有助于把货物进出、国际贸易、航运物流、税制安排和金融服务等相关领域改革结合起来，最大便利地与沿线国家开展国际经贸业务。

2. “一带一路”有 65 个国家，国情差异极大，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有助于自贸区根据沿线每个国家的国情，灵活地探索或采取多层次的、甚至一对一的投资贸易或者经贸合作规则，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及人员往来。在复杂国情条件下达成的通用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规则，也能够借鉴到与非沿线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投资贸易谈判中。

3. 通过赋予自贸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有助于自贸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有助于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有助于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和服务网络，加快培育经贸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Yangtze IDEI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提出背景、现实意义与落实措施

张立冬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为解决好新时期“三农”问题，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指出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一关于土地承包关系的最新表述，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制度延续和具体深化，对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提出背景

为了准确理解“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必须充分了解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经营期限的历史演变。

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起点，通过对不同时期政策文件的表述进行梳理，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是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确立。1979年开始，我国进行了以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将土地按照农户家庭规模和劳动力数量承包给农户，激发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产出和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增长。截至1984年，我国基本完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这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正式确立。（2）第二阶段是土地承包期限从15年到30年的延长。1984年1月我国发布的《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临近第一轮土地承包期末，1993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3）第三阶段是土地承包关系从“长期稳定”变为“长久不变”。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同年修订的《农业法》再次重申“依法保障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提法最早见于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随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

二、“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现实意义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对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因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与长久不变既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也会对农业投资、土地流转及其所带来的资源配置和交易收益产生积极的影响。

1. 有利于促进农业投资。农业投资周期长、回报慢，地权的不稳定会对农业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流入土地的经营权期限往往限定在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内（在2023~2027年期间陆续到期）。相对较短的期限使其对能否在经营期限内收回投资成本存在担忧，导致其不敢轻易加大对农业的投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稳定了投资预期，消除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担忧。

2. 有利于保障农民的权益。一方面，地权的稳定性与土地产出率密切相关，而土地产出率又与农民收入正相关。尤其是

对于中西部农村居民而言，土地还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与期限的延长充分保障了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另一方面，这一政策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可以让农民放心大胆的长期流转土地，既为其提供了长期获得土地流转租金的财产收益机会，也有利于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3. 有利于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是“两权分离”，即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从“两权分离”转变为“三权分置”，核心是将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其中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归流入土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一方面，让想保留土地承包权的农户能够放心流转土地经营权，在稳定获得土地流转财产收入的同时，使土地要素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经营权的分置既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收益，同时也为发挥土地经营权的抵押等权能提供了制度基础。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框架下，土地经营权是从农户享有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中进一步派生出来的，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为当前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提供了制度基础。

4. 有利于实现农村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 and 根本性任务。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经济和物质基础，是实现农民生活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可靠保证。要实现产业兴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等路径措施固然重要，但更为基础性的则是保持土地地权稳定。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为激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活力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以及有机衔接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实现生活富裕提供了制度保障。

5. 有利于消除社会各界对土地制度的思想分歧。自 2008 年中央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表述从“长期稳定”变为“长久不变”后，社会各界对“长久不变”的提法在思想认识上存在明显的分歧。部分人将“长久不变”等同于“永久不变”，意味着土地承包关系的永佃化；部分人认为“长久不变”意味着

土地承包“长期化”，承包期限应超过30年但不超过70年等等。“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一方面及时回应了广大农民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关切，充分体现了“长久不变”的精神，消除了社会各界对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政策留下了时间窗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贵州省代表团审议时说，“确定30年时间，是同我们实现强国目标的时间点相契合的。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再研究新的土地政策。我们党的土地政策是长期稳定的。”

三、“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落实措施

贯彻落实“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要从立法体现、确权颁证、严格保护等多方面共同发力。

1. 加快相关法律修改予以体现。我国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的延长，在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予以确认；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明确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并指出“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随后



2002年修订的《农业法》和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又都分别对上述提法再次重申。虽然在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提法调整为“长久不变”，但是这一提法并未在随后的立法中予以体现，如2012年修订《农业法》时并未将原来“长期稳定”的表述修改为“长久不变”。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迫切需要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等法律上予以体现。

2. 加快推进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开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一方面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让农户吃了“定心丸”；另一方面化解了大量土地承包纠纷，有力促进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是落实“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重要举措，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证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顺利推进的基础性工作。由于其涉及范围广、技术环节多、标准要求高，在推进过程中面临多因素挑战，下一步要加快推进力度确保在2018年底基本完成。

3. 依法严格保护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落

实既要在法律上予以体现,更要对农户土地承包权依法严格保护。要依法维护好农户使用、流转承包地的各项权益,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要积极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户的合法权益,加大对非法征用、占用土地,违法调整农户承包地,违法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行为的查处和惩罚力度。

4. 维护好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引导性退出农户的合法权益。为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化,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部分发达地区开始探索通过制定激励政策引导农户有偿自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少数此类地区,首先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通过法律保护防止出现农民“被退地”现象;其次在补偿标准和期限上要做好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对接,做到不违背、不损害农民利益;最后有条件的地区要探索颁发土地经营权证,从而为今后部分存在土地承包权退出的地区提供制度支撑。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论

宋文阁

江苏省国资委政策法规处

十九大报告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章节中，明确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报告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联系起来，为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政策指导。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新思想、新矛盾、新征程等一系列论述，对深化国企改革与发展必然带来重大影响并引起深刻变化。在新时代下，国有企业要承担历史使命的先锋队，解决不平衡不充分新矛盾的突击队，实践习近平国企治理新思想的先行军，做强做优做大与争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主力军。

一、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目标

我国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面对实力雄厚、规模庞大、技术先进的核心竞争力明显优势的西方大型跨国企业，并且大都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高端。纵观我国国有企业，尤其

是与美国企业相比，在规模、盈利能力、价值创造、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布局上，都有不小的差距。在新时代下，迫切需要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其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到底是什么？从大目标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动力，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路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其具体目标是什么？一个侧面是从国有经济角度，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实现保值增值，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现实迫切需要引入非公资本，发挥非公资本“鲶鱼”效应，提升国有经济活力。另一个侧面是从民营经济角度，可以有效打破垄断领域，积极引入国有企业、国有资本，通过资本融合，这类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更高，创新能力更强，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生力军。

但不能孤立的来看，应当把两个侧面的目标统一起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的此消彼长、零和博弈，而是将不同所有制经济扬长避短、良性互动、互利共赢。

新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具体目标是建立培育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世界一流中国企业。其中中国企业应定义为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为路径且以混合资本形态融合的企业。

二、新时代提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

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上的“皇冠明珠”。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新的、被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应当在新时代应明显提速，大力推进，也应当是新时代国企改革“重头戏”。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根基”。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可见，基本经济制度的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基本经济制度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根基，若离开了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根基，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坚决反对两种极端声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现实中也有两种截然对立

的否定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观点或声音。一种认为，搞混合所有制经济稀释和削弱国有经济，是动摇国本，搞所谓全盘私有化；另一种则认为，搞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吞并打压民营经济，搞新的公私合营运动，试图恢复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等等。

新时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会全盘私有化，不会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也不会削弱公有制为主体基本经济制度，仍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仍将发挥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及抗风险能力。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新的所有制结构将更加合理完善。

（三）如何看待积极发展与稳妥推动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两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使用了“稳妥推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个是积极发展，一个是稳妥推动。理论界、经济界及国有资产监管者等就认为，国家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方针方向变了，从积极发展改成了稳妥推动。尤其是在2017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作为重要突破口，出现了联通混改的样本案例。十九大报告又再一次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无论什么样的描述，都不是对立关系和替代关系，都需要准确理解。新时代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应当在突破口的基础上，明显提速，大力推进。

（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点难点。重点是把握“两个层次，一个多元”。第一个层次是，垄断领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是这个是从整个全社会层面来讲的。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问題已经基本解决，但垄断性领域仍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第二个层次是，微观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微观企业把单一的产权格局改变为多元产权关系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必须实行产权多元化，尤其是当前要大力推进异质产权多元化。在微观企业层面，也就是推行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融合，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讲，难点就是有非公资本牵头来融合国有资本，让民企有一定的话语权、控制权、主动权，突破“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没有话语权，没有控制权，也就失去了混合的意义。

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是“混”与“和”的有机统一，不仅要资本的物理变化，更重要的要发生资本的化学变化。“混”是资本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股权结构的科学化；“合”就是资本的整合融合耦合，做到法人治理合、战略管理方向合、集团管控合、利润管理合、企业文化合等。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标准，主要看股权结构是否科学合理安排、法人治理结构能否有效运转、决策权与管控权的合用运用，最终要看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成长性和盈利性是否符合管理预期，以及企业价值是否做到最大化，归根到底能否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中国企业。

三、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对策

公司如果能达到营业收入 1000 亿美元，在全球任何一个行业，这都是巨头公司，在全球具有核心竞争力、影响力。只有 9 个国家拥有千亿美元公司，全部在欧美和东亚。全球 6 强的美中日德英法，其后是瑞士荷兰韩国。全球共有 53 家千亿美元公司，美国 22 家，中国 13 家，日本 5 家，德国 4 家，法国 3 家，英国和荷兰 2 家，瑞士和韩国各 1 家。西方发达国家的千亿美元公司，主要集中在能源、汽车和 ICT 领域。中国 13 家企业，除台湾的鸿海精密外 12 家全部为国有企业，具体



银行 4 家、保险 2 家、中石油中石化 2 家等，另外 1 家中国建筑。

(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与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积极研判经济全球化及逆全球化，提高驾驭世界经济杂多变能力。要坚定市场化改革方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界定政府市场边界，做到市场机制有效，宏观调控有度，做到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辩证统一。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联动。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在战略性重组、结构调整进一步凸显。重点做好降低金融杠杆，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升国有资本整体回报率，提升价值创造力及核心竞争力。提速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发挥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积极性，促进国企民企协同发展，提高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

围绕制造强国，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

动能。重塑和发展具有国际标准、国际竞争力的传统产业，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积极培育若干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尤其是 ICT、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一批世界级的新产业群、世界级的一流企业。

（三）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国有企业主力军和先行军作用。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各国经济要素有序自然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共同创建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发挥国有企业主力军和先行军作用，积极要求民营企业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发挥生力军作用。中国企业通过提供中国方案，与沿线国家一道，不断充实一带一路的合作方式和内



容，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和区域合作规划，让沿线各国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共享成果，共创美好未来！如中国铁建已在境外拓展到 116 个国家和地区，在建合同额高达 900 亿美元；如中石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了 91 个油气投资项目；国机集团在积极沿线国家布局项目，已达 773 个。中央企业的境外资产规模超过 6 万亿元，分布在全球 185 个国家和地区，业务已由工程承包能源资源开发拓展到高铁、核电、电信电网建设等领域，有力提升了国有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四）对标美国企业及其产业，短板企业及新产业有重大突破。通过对标美国 22 家企业，寻找中国企业差距。一是能源产业。西方有 BP 石油、壳牌石油、道达尔、艾克森美孚等。中国企业需要加大培育力度，破解能源困局。能否在电网和可燃冰开采方面有重大突破或走在世界的前列？二是汽车产业。尤其是日本德国两个国家，汽车产业是其产业命脉。我国的汽车工业，尽管市场很大，尤其是民族品牌企业仍然偏弱。能否在电动汽车方面有重大超越？三 ICT 产业。在这个产业中，中国企业仅有台湾的鸿海精密 1 家，而 ICT 技术则是美国强大的根基。以华为及 BAT 为民营企业，则通过与国有资本混合，能

否迎头赶上？四是大健康大医疗产业。美国在这个领域有 6 家，而中国则没有，在这个产业领域这是中国企业的短板。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增添新动力，能不能在大健康大医疗领域涌现一大批混合所有制企业？或者在这个产业领域有重大突破。到 2035 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千亿美元规模的世界一流企业可达 22 家，达 2050 年则全面超过美国企业，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坚信，只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领导不动摇，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贯彻执行。国有企业发展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一定会实现，国有企业的强、优、大的愿景一定能实现，国有企业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一定能作出更大贡献。



建立养老个体信息标准化体系 牵住新时代中国养老的牛鼻子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徐宁

内容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的重大民生课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挑战。本文认为，在新的历史方位下，面对新时代中国养老领域的新形势，大力发展养老产业，使之与养老事业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养老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手段。然而，养老群体支付能力不足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目前养老产业盈利能力差、发展裹足不前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激活社会资本，打通养老主体的多种支付渠道，建立养老支付金融体系，以增加养老产业的有效需求。支付金融体系建立的前提是形成标准化风险收益评估体系，养老个体信息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则是应首要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群众在养老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中国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的重大民生课题，是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挑战。解决好新时代中国养老问题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时代中国养老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

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养老领域也存在着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养老生活的需要同养老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总量矛盾：养老群体人数多、增长快，而供给总量不足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3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也位于前列。据预测，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占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从养老床位数的供给端来看，民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底全国各类养老床位数不到700万张。根据有关机构预测，五年之后，即第一个一百年来临时，中国养老机构床位数需求量应为800万张以上，还有较大差距。另外，目前我国每千名老人（60岁）



拥有床位数量仅 30 张左右,相对于发达国家老人人均 50 张床位而言明显偏低。

2. 结构矛盾: 养老方式多元化、需求多层次, 但供给单一、失衡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养老需求也从过去对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需求提升为包括情感、娱乐、尊重、价值体现等更丰富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 社会所提供的养老方式应当随之呈现出多品种、多层次、高质量的特性。然而, 在养老供给结构中, 政策往往侧重于机构和床位数的总量建设, 对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其他养老模式重视不足。另外, 养老供给产品也缺乏多样性, 许多机构仅能提供满足基本需求的简单食宿功能, 缺乏医疗、康复、保健、文体娱乐等高层次产品, 满足不了老年人全方位多层次的养老需要。总体上看, 养老产业的发展滞后于养老事业。

3. 支付矛盾: 未富先老客观现状导致需求侧支付能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人口优势及其所带来人口红利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不过, 老龄化在我国经济发展还未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便提前到来, 相对于西方国家近百年的老龄化进程, 我国只用了 18 年就完成, 并且速度在加快。在经济发展程度

并不很高的时候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并成为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将成为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一大重要挑战，并导致中国老年人大多不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另外，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庭的独生子女们同时面临养老与养家的双重压力，经济能力捉襟见肘。此外，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特别是企业年金和自购养老金融产品发展不足更加制约了养老需求侧的支付能力。

二、新时代大力发展养老产业的重要意义和关键问题

在新的历史方位下，面对中国养老问题的新形势，大力发展养老产业，使之与养老事业有机结合、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解决新时代中国养老问题的重要手段。

首先，养老产业是新时代中国养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养老体系，应当包括具有公共性、保障性、全面性的养老事业和市场性、专业性、服务性的养老产业，形成全面、多层次、互为补充的特色养老体系。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可以从总量上弥补养老业发展不足的问题，缓解新时代中国养老领域的总量矛盾。

此外，发展养老产业是解决新时代中国养老结构性矛盾的重要途径。新时代中国的养老领域呈现出需求多元化多层次与



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特征，养老事业的定位和作用为解决面上的全民养老问题，其关注的是基本需求层面，仅靠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养老事业难以兼顾人民对养老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而养老产业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养老资源，它依靠市场机制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养老产品和养老服务，以此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更多元化的养老需求。所以说，**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可以有效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养老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但是，养老产业的发展也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作为一个产业，其基本发展逻辑是市场逻辑，产业主体所追求的目标是利润，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参数是市场容量、需求特性与支付能力。中国养老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我国未来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速快，人口结构的剧烈转变驱动养老产业快速扩容。据测算，到2020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容量将达到7.7万亿，2030年将达到22万亿多。这其中，由于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养老的多样性需求使得各个现有行业领域均出现发展养老产业需求，比如地产、旅游、保健、文体、娱乐等等。未来中国养老产业从规模和结构上均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不过，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

来临以及“未富先老”的社会现状，使得养老产业的市场并不成熟，导致许多养老性企业盈利性差，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比如，目前进入养老产业的重要群体是地产商，养老机构的盈利性跟商业地产相比有天壤之别，许多地产商重“地产”轻“养老”，被社会诟病为“挂羊头卖狗肉”。从行业的整体发展来看，从业人员待遇低、整体素质不高、关联配套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使得养老产业发展举步维艰。因此形成了养老产业投资回报期长、回报率低等状况，这些成为阻碍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的重要障碍，最终导致与养老需求不相适应的养老产业供给不足的现状。

形成如上养老产业现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因素是养老群体的支付能力不足。其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有养老需求的老年人支付意愿不强，更愿意将钱给下一代并依托他们养老；更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养老支付体系尚不健全，个体的支付方式单一，养老金、养老保险、商业保险等养老金融体系没有建立也是导致养老支付能力不足的重要因素。因此，解决养老群体的支付能力，打通支付环节就成为解决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的关键。



三、解决思路与政策建议

要解决如此大规模养老群体的支付能力问题，仅靠国家财政力量与基本养老保险是行不通的，必须大力发展养老金融，特别是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金融产品。金融手段介入的前提与核心是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匹配，从这个意义上说，**搭建一套完备、科学的养老个体信息标准化体系是整个环节的牛鼻子。**其逻辑关联如下：

个体信息标准化体系建立——支付标准、风险评估标准体系建立——保险等社会资金可进入养老支付——解决养老业支付能力不足问题——增加养老产业有效需求——养老产业利润提高、产业得到发展——养老产业有效供给增加——养老产业实现发展——新时代养老体系更加健全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实施建议：

第一，建议统筹民政部、人社部、保监会等部委联合成立中国养老个体信息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会建立的目的在于全国统筹、标准统一，这样可以实现全国养老金融体系的标准化和全覆盖。

第二，建立个人养老标准账户。个人养老标准账户应在养老个体信息标准化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制定相应规划和标准，

形成与个人身份严格匹配的养老账户。同时以联网化手段管理和运行，以信息化作为养老金融化的基础。个人养老标准账户应记录个人身份信息、身体状况、信用记录等信息，为长期照护养老模式和个人养老金融体系的建立打好基础。

第三，完善养老金融体系，引入多元化养老支付渠道。我国三大养老保障支柱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占绝对比重，而企业年金和居民自购养老金融产品发展严重滞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因此，要大力发展后两种养老支付体系，特别是居民自购养老金融产品，如相关的商业保险、养老保险等产品。在建立一套完备、科学的养老个体信息标准化体系的前提下，充分发掘市场力量，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养老支付渠道的多元化，解决养老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进而大力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

第四，要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政府与市场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要注重发挥市场在养老行业的决定性作用。这其中，政府应减少行政干预，如降低准入门槛、减少审批流程等等，同时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力度，严惩违法与搅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另外，政府还应着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让涉入养老领域的企业能充分发挥其所长和企业家精神，在养老产业里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马野青

南京大学商学院

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形势的精准判断，提出我国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谋求开放创新、互惠包容的发展前景，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针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为此，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上述论断对我国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具有根本的指导作用。对这一治国方略，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贯彻。

1. 内外并举，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和国内经贸体制

改革，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降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极大促进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快速增长，也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机遇。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经济增速下降、需求疲软的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制造业回流、限制企业对外投资，并借助各种贸易壁垒，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另一方面，以追求所谓公平贸易为目标，积极推动以其自身为主导的诸边、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使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一些国际条约的权威受到侵蚀。对此，我国充分发挥了大国担当，切实履行在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条约中的责任，并承办了G20领导人峰会、“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等国际会议，呼吁创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全球化领导责任。在国内方面，我国自2013年起陆续创设了上海自贸区等11个自贸试验区，作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决策，发布了“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以及“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文件，不断完善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降低外贸、外资



发展的交易成本。今后，从国际方面，我们需要积极推动世贸组织正在进行的第九轮多边贸易谈判，争取早日达成协议，维护世贸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权威；积极推动 G20、金砖组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建立完善其作用机制；积极推动我国参与的 RCEP 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及与有关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投资协定谈判早日达成协议。国内方面，在自贸区探索试验的基础上，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实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营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健全资本流动管理制度，提高人民币国际结算地位，降低我国及经济合作伙伴的交易成本。

2、稳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东西向均衡的开放发展。借助“一带一路”，我国可以向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让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在 90 年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主要凭借自己的比较优势，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向其进行产品输出，对外开放表现为向东方海洋发达国家的开放。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们则运用自己的资本、技术和先进产能优势，向西向和南向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缓解沿线国家资金、基础设施的短缺，开展产能合作，促进沿线国家的经

经济社会发展。而我国可以通过走出去，输出过剩的有竞争力的产能，获取国内短缺的资源与能源，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在国内层面，我国原先的开放由东部沿海、沿江地区起步，在促进全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二元结构”，借助“一带一路”可以把中西部地区纳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实现国内东西部对外开放的平衡。“一带一路”倡议已取得一系列实质性重大成果，今后我们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合作机制，促进其稳步发展。特别是沿线一些国家政治、军事、恐怖主义等风险较大，我国目前前往投资的多以大型国有企业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为主。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带一路”1.0。下面需健全信息通报、风险防范机制，通过税收、保险等相关政策，鼓励实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前往投资创业，开创“一带一路”的2.0阶段。

3. 创新参与国际分工模式，从被动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向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转变。我国原先参与国际分工主要是利用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提供的全球化机遇，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低层次的同类差异化产品出口，或被动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这带来分工层次低、获益少、抑制自主创新、加剧贸易



摩擦、一旦全球需求下降会导致低端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贸易投资的一体化，通过生产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开展生产要素合作，实行研发、生产、服务的全球化。我国借助前一阶段的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应利用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创造全球化机遇，吸引国外先进要素，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乃至全球创新链。而在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应在所处环节从事技术创新，提高所处环节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并逐渐向价值链的两头延伸。

4. 创新外贸外资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为保持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适应经济形势变化，实施产业结构、外贸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传统产业中我国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低端产品、低端环节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对留在国内的中高端产品辅以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加强贸易方式创新，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外贸综合服务，拓展外贸规模，降低交易成本；对利用外资，在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的同时，加强产业配套和人力资本等高级要素培育，营造吸引外资从事研发创新的环境。

不断改进管理体制，完善监管与服务体系，给企业走出去从事正常的国际投资创造宽松的环境。

5. 加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微观主体的培育。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要素整合。哪一个国家拥有的跨国公司越多，其整合全球生产要素的能力越强，反之其生产要素只能被国外跨国公司所整合，因此，一国要提高自己的国际分工地位，必须大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这是我国的薄弱环节。我国应不断健全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并实施有力的产业组织政策，鼓励企业的国内外兼并重组，不断壮大企业规模。

